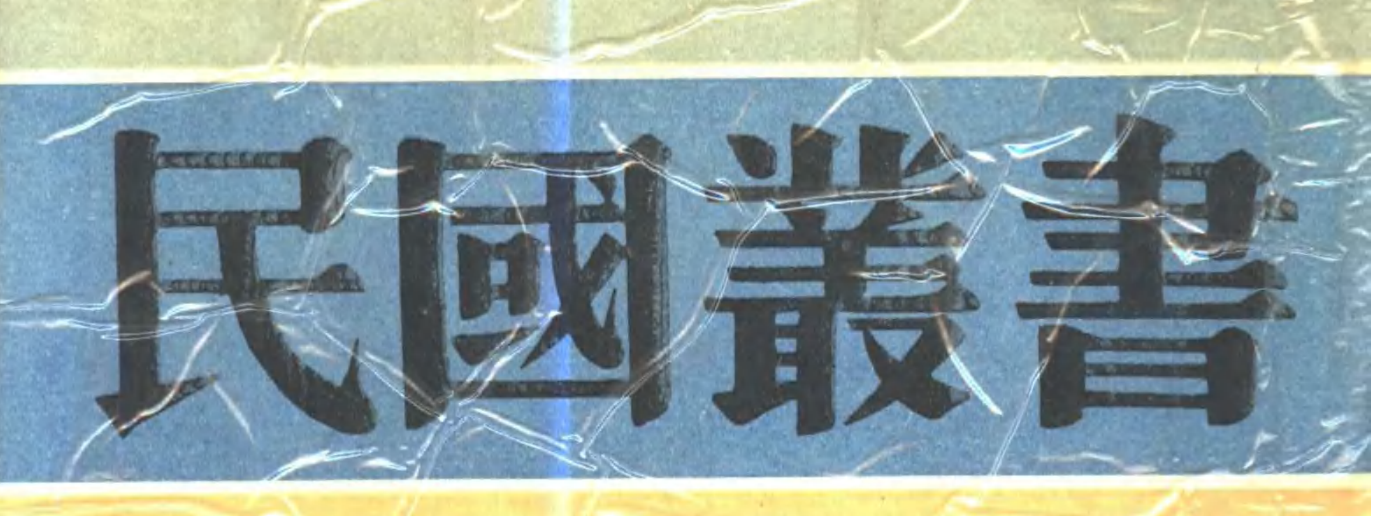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三編

·12·

民國叢書

第三編

·12·

社會科學總論類

中國問題

胡適等著

中國問題的分析

王造時著

上海書店

中國問題的分析

王造時著

本書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

序文

中國自古爲文化之邦，那是一個事實，用不着我們去吹噓，同時我們這種文明，經過兩千多年根本上沒有多大變化，也是一個事實，用不着我們去辯護。朝代的名字儘管換着：唐也好，宋也好，元明也無不好，做皇帝的人物儘管變着：太祖也好，太宗也好，高祖高宗也無不好。政治戲臺上雖然三個打進，四個打出，忽而花臉，忽而小丑，忽而鬚生，忽而旦角，但是我們中國社會的根本，經過兩千多年總沒有多大變動。不錯，我們雖曾被外族征服過好幾次，但外族終被我們的文化所融化。我們中國雖經歷無數治、亂、盛、衰、的循環，但我們的基礎條件，從沒有遭過顚滅。一百年前的農民生活和兩千年前的農民生活，並沒有根本的差別。紀元後一千九百年的手工業制度，和紀元前九十年的手工業制度，也不見得有重大的變異。我們中國以前的社會的確像一池死水一樣，天天總是在平靜的狀態裏面；縱或有時因爲狂風暴雨，或被吹

皺池面，或被打成水渦，但是深厚的池水，大體上並不受什麼波動；並且風過雨止，全池仍然是平靜如初。

在這樣平靜的狀態底下，我們中國過了兩千多年的時光。我們的制度，我們的思想，我們的社會價值，我們的風俗習慣，都凝成了堅固的模型。我們自己以爲到了盡善盡美，無以復佳的境界，再不必有所改變。我想，若是我們的門永遠能夠像以前那樣關着，若是環境能允許我們那樣停滯不變的安穩過下去，我以爲若干年代以後的中國社會，與若干年代以前的中國社會，情形大約不會根本兩樣。

不料中國到了十九世紀的中葉，局勢忽然大變。西洋來的槍礮，不但打破了我們的門戶；西洋來的商品，不但賺了我們的金銀；他們還帶來全個西洋文化，向我們灌注。若是中西兩個文化的接觸，來得比較和緩，那麼我們中國尚可逐漸適應新的環境，保持一種相當的平衡狀態，而不至於崩潰得不可收拾。然而西方列强的野心，老實不客氣，恃其超越的軍力以臨我們，絕不使我們有自由選擇，循序適應的餘地。西方文明如排山倒海的衝來，我們固有的全個文明如逢洪水一般，只有崩潰下去。

全個社會於是失卻了基礎。固有的思想，制度，文物，皆被傾出固有的地位以外，而發生絕大的紛亂。

因此，我覺得中國的大紛亂，根本上是由於中西的接觸。換一句話說，中國之所以成問題，中國之所以有問題，中國問題之所在，就在這一點。我們若是要去解決中國問題，那麼非根本捉住這點不可。

根據中西接觸爲出發點，我去分析中國問題，我看在中國與西洋沒有接觸以前中國的社會是靜的社會，各種組成中國社會的思想，制度，及勢力，都是幾千年傳統下來的東西，在社會上各有各的地位，成爲一種系統，得着平衡的狀態。因此，全個社會，都在靜的狀況底下安寧過活。我們這種靜的社會本來是自供自給，不願與人家往來。但是我們不開門，西洋列強偏要打進來，與我們發生關係。兩相接觸之下，若是中國文明較優於西洋文明，那麼我們的社會不但不會根本動搖，並且我們的文明有向外傳播的希望。在歷史上，我們中國人並不是沒有和其他民族發生過接觸。現在回人、蒙古人、以及滿人的祖先，都與我們中國人有過許多交涉，結果他們終被

我們所同化。

退一步，再假定中國文明與西洋文明能夠互相頡頏，那麼兩者接觸之下，彼此都有切磋的地方，同時彼此都有不拔的基礎。這方面的文明又何能根本推翻他方的文明？在此種假定的條件之下，我們中國社會雖多多少少要受西洋文明的影響，但是還可保持相當的平衡狀態，不至鬧得天翻地覆，造成一個極大混亂。

然而，不幸，我們的文明在此生存競爭，優勝劣敗的現代生活裏面，的確不如西洋文明那樣的健康。我們在玄學的或文學的眼光看來，或者不願說這種沒有志氣的話，或者甚至可以跟着泰戈爾詩人大罵西洋文明的卑陋不堪，贊美我們東方文明的高妙。但是在現代情形之下，事實告訴我們，中國文明實在敵不過西洋文明。所以兩者相碰，我們不能不歸於失敗。我們起初與西洋人接觸的時候，我們還以爲他們與匈奴突厥同類，看他們不起，要他們的使臣磕頭，說他們的使臣是來朝貢的。誰知他們一次一次的把我們挫敗，我們才知道他們的利害。起初我們還只接受他們的物質文明，到後來連他們的精神文明，亦無法拒絕。這種西洋文明的怒潮，隨着帝

國主義的侵略，如狂風駭浪的打來，把我們全個中國社會的基礎搖動。我們固有的思想，制度，及勢力，漸漸被搖出原有的位置，由靜的狀態，而趨於動的狀態。全個社會於是完全失卻了向日的平衡。因爲這種關係，所以我在這本書第一章至第四章內把沒有與西洋接觸以前靜的中國社會各方面加以分析。第五章是講轉變的樞紐。第六章至第十章是分析與西洋接觸以後的中國社會動的情形。靜是原來中國社會的狀況，動是中國社會的變化。動出於靜，由靜而動。我們若不明瞭前者，便不能明瞭後者。我們若不明瞭中國以前的社會，便不能明瞭中國今日的社會。因爲靜是動的背景，動是靜的反應。兩者同是中國問題的兩方面。

上面這一大段話，解釋了我寫這本書的根本觀點。

因爲我注重事實的解釋，因爲我要提高讀者的興趣，並且因爲我的目的在使讀者明瞭中國的全局，所以用大刀闊斧的寫法，不用什麼考據引證的功夫。這是不能不預先聲明的。

雖然這本書裏面的文章，是從民國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中間前前後後，一篇一

篇寫成在新月月刊東方雜誌人文雜誌及自由言論等刊物發表了的，但現在收集起來整理成書，自始至終，還不失爲一貫的道理。除了因爲環境關係有所删減外，大體還保成了原形。

本書本來是中國問題的上册，還有一册名爲中國問題的解決，提出我對於解決中國問題的意見，將來總有機會與讀者見面。

最後我要向許多中外的作家道歉，因爲有時候我借用了他們的材料，現在不能一一提名出來，向他們表示謝意。

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七日。

目錄

中國問題的分析

第一章　中國問題的物質背景

(一) 地理

讓我們先打開中國地圖來看。我們東南有黃海，東海，南海，以及那浩大無涯的太平洋。在汽船沒有通行以前，海禁未開的時代，這種天然的界限，便使我們不但與西洋各國隔絕，並且與日本也少往來。迤向西南，我們便有那高高不可攀的喜馬拉雅山脈，把我們與印度分開。正西方面，乃是世界屋脊帕米爾高原所在。我們若是想由此路，以通歐洲，不要說以前感受困難，就是現在也很難通行。至於北方，不但那大塊不毛的戈壁沙漠把我們包圍着，並且即讓我們走遠一點，以前也是一片沒有人

煙的西北利亞平原。我們中國還以爲與外界隔絕不周到，自己又築了一條萬里長城，從西北以至於東北。我們中國社會以前處在這種四圍閉塞，交通不便的情形底下，並且在西北所遇到的又是些文化較低的部落民族，於是我們的祖先自然而然發生兩種觀念，經數千年以至於與西洋各國發生關係，牢不可破，給了我們中國的歷史以很大的影響。

第一種地勢所給我們的影響，便是天下主義。我們的祖先，因爲地勢隔絕的關係，不知有其他國家或民族的存在。東夷，西戎，南蠻，北狄雖然常常與我們搗亂，但他們並不在我們的眼裏。我們以爲中國便是天下，天下只有中國，一談到中國，便包括全世界；一談到天下，心目中只有中國。我們在一切古籍裏，隨處都可找出這樣的例證。在沒有與西洋接觸以前的中國人的腦筋裏面，對於中國與天下，不見得有什麼分別。並且因爲我們素來與外界很少發生接觸的緣故，很少受過其他國家的侵略，國際關係上沒有什麼競爭與衝突。我們以前在歷史上所遇見的，都是些部落民族，他們並無所謂國家的組織。我們的祖先既然沒有外國的對敵，自然不覺得有國家

組織的需要。因此，我們中國以前只有天下觀念，沒有國家觀念。

第二種地勢所給我們的影響便是保守主義。我們的祖先，既誤認中國爲天下，不知有西洋文明的存在，而附近所看見的又是些尚未開化或半開化的部落民族，自然容易發生一種自滿的心理，以爲中國文化是最高無上的。有了這種自滿的心理，當然很容易認爲中國一切的制度文物已到了無以復佳的境界，我們只要保守，毋須改進。中國社會之所以變成殭態，經兩千多年沒有多大進步者，未始不是受了這種保守主義的影響。當西洋各國初派使臣來要求通商的時候，我們還以爲他們是來進貢稱藩的，非要他們叩頭不可；後來屢戰屢敗，才知道這些『西洋鬼子』的厲害，我們自己實在有改革之必要。

若是我們拿歐洲的歷史地圖來比較，由希臘以至於羅馬，再由羅馬以至於現在。各國地勢的犬牙交錯，交通頻繁，無一不是促進他們的國家自覺。我們單拿希臘來講。希臘雖然面海，但地中海沒有太平洋那麼浩大，不能使她與埃及文明及巴比崙文明隔絕；東通小亞細亞，與波斯各國接觸，沒有帕米爾高原站在中間；北則連貫

大陸；西則與意大利半島遙對。島嶼林立，種族複雜，競爭很烈。雖當時希臘的政治組織，限於所謂城市國家，然惟其因爲是城市國家，才同時有許多具體而微的國家的存在。相互之間，競爭極烈；競爭激烈，便發生了與中國兩種剛剛相反的結果。第一是愛國心。各個小國對峙之下，自然產生一種自覺。雅典的人自然愛雅典，司巴達的人自然愛司巴達。不但如是，雅典和司巴達爲各自爭生存及勝利起見，對於政治組織，不能不求完備；對於其他一切，不能不求進步。因此第二個結果便是進取的觀念。社會常在動的狀態。愈動愈進化；愈進化愈發展。所以我們看西洋文明，有如長江大河一般：急灘之下，又有深潭，深潭之下，又有急灘，曲曲折折，變化無窮。中國文明則如池水一樣，原來是怎麼樣，現在亦是怎麼樣；原來是多少水，現在大概仍原是多少水。水總是死的，不會流動。有時池面縱被大風吹皺，但不久仍歸平靜。靜是牠的本體，變是牠的例外。因此我們的文明，雖然開發較早，卻是進步極慢。西洋文明雖然開發較遲，卻是進步極快。一靜一動；一慢一快；一重保守，一重進取。結果，後來居上，我們倒是落伍，一經接觸，我們便沒有力量反抗。

除了我們的周圍是封塞的地勢外，我們要認清我們中國不是一個島國，像英國日本一樣；亦不是一個海岸線很長的國家，如法國意大利一樣。中國乃是一個廣大的大陸國家。內地縱橫數千里，山川深阻，不便與他國通商。而黃河、長江、珠江三大河流，又自西朔東，蜿蜒中國本部，可供灌溉。土地肥沃，溫度適宜，乃一天然的農業國家。並且就氣候與物產而論，因爲中國是一個廣大的大陸國家，所以地跨寒溫熱三帶。北方的皮毛，沿海的魚鹽，中部的麥米棉蔴，江浙的絲茶，無不備具。至於礦產，如金銀銅鐵之類，在農業社會裏面亦很夠用。所以中國可說是一個完全經濟自足的農業社會。生在這種國家的人民，生活非常簡單，可以自供自給，沒有與他國通商之必要。自己固然沒有什麼工業品輸出，亦不需要什麼工業品輸入。不但對外如此，就是國內各地方的經濟關係，亦無很多相互交換的機會。各個農村，差不多經濟上可以獨立。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什麼大工業，自然沒有什麼大商業；沒有什麼大商業，自然不需要便利的交通。交通不方便，自然各方的關係不能密切；集中的組織不能形成；思想智識無由交換，全個社會只能在一種靜的狀態底下過活。換句話說，這種國

家，結果是很保守的；牠的組織決不會嚴密的。

（二）　人民

中國所包括的民族，普通說來有五：曰漢、曰滿、曰蒙、曰回、曰藏。其實還有一被人忘記了的苗族。這六族都有可以明瞭分別的界線。滿族以東三省為根據，蒙族奄有內外蒙古，回族以回教為標準；藏族以西藏為活動範圍；苗族則出沒於南嶺山脈，川、滇、黔、桂、粵、湘之山間。至於漢族，實為構成中國的主要成分，遍佈中國全部，為中國全部歷史的中心。但所謂漢族自晉代五胡侵入之後，早不是一個單純的民族。如滿洲族之東胡，鮮卑、契丹、女真；蒙古族之匈奴；回族之突厥，回紇；藏族之羌；苗族之一部分土司，都已混為漢族。故漢族實為一混合複雜之民族。可以代表現在所謂中華民族。我們一說到中國人的問題，大部分我們不能不以漢族為對象。

我們討論中國人民的問題，可分兩方面來看：一是量的問題，一是質的問題。先就量的問題而言，究竟我們中國有多少人口呢？這個問題，很難為確切的答覆，因為

我們沒有可靠的人口調查，現在關於中國人口的數目，都是出於估計，很難作科學的根據。譬如一九一〇年中國人口（東三省在內）據民政部的報告為三三一、一八八、〇〇〇；據一九二六年郵政局的調查，則為四八五、五〇九、〇〇〇。兩相比較，前後不過十六年，相差竟達一萬萬五千餘萬之巨。不過我們根據最近立法院幾位統計專家的意見，中國人口大概在四萬萬五千萬左右。（依一九三三年申報年鑑估計人口總數為四八八、三〇四、〇二五八）。

假使這個四萬萬五千萬的數目是近乎情理的話，那麽就比法國大十一倍，比不列顛大十倍，比美國大四倍，比日本大七倍，比德國大七倍，比意大利大十一倍，比西班牙大二十二倍，比比利時大六十倍；估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以量的方面看來，中國人口不可謂不多了。但這種數目與中西接觸以前的中國人口比較還是增加了呢？還是減少了呢？據各方面計算，所增並不很多，就是普通所謂四萬萬的數目，在道光十五年（即一八三五年）就有這麽一個估計。從此一點，可見中國人口增加得並不很快，與歐美人口在百年左右約增加一倍的速度比較，實在有望塵莫及之

嘆了。

中國人口增加如此遲慢，難道因爲生產率低嗎？不是。我們中國的思想，制度，政府的勢力，及經濟的背景，無一不是鼓勵生育的。儒家的『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不消說了。早婚，納妾，亦是助長生產的原因。同時在大家庭制度之下，少年夫婦沒有經濟的負累，可以無限制的生產。兼之人民缺乏智識，生活很低，能以小小的收入供給很多的人口。故中國人口的生產率，在全世界各國裏面，算是最高的。據人調查，就是在二十年來天災人禍的中國，人口的生產率，還有千分之三十至三十五，與歐美先進國的生產率比較，差不多增加一倍。

旣然中國人口的生產率高，爲什麼白人近一二百年來增加那麼快，中國人口增加又這樣慢呢？我們要知道，人口的增加，不僅是生產率高的關係，並且要看死亡率如何。若是生的多，死的亦多，那麼人口還是不會有什麼增加。若是生的少，死的更少，那麼人口還是會增加。中國人口之所以生的多，而仍不激增者，乃因爲死亡率太高的原故。反而言之，歐美先進國之所以生的少，而人口反而激增者，卽因爲死亡率很

低的原故。我們說到此地，便不能不再進一步問爲什麼中國人口的死亡率這樣呢？

中國全國每方英里的人口密度，根據一九二三年郵政局的調查，爲一〇四人；二十一省平均密度爲二三八人。若是這個估計的確，那麼比之德意志、意大利、比利時、及英格蘭等地的人口密度，表面看來並不算密；若以全國總平均每方英里一〇四人而論，更不應有人滿之患了。不過從中國面積所推算出來的密度，不能代表真正的中國人口經濟。我們中國除黃河、長江、珠江、遼河及松花江流域之外多是不毛之地，不宜於耕種。據美國農業經濟專家白克爾 O. E. Baker 一九二七年提交第二次太平洋國交討論會的論文說，全中國（西藏除外）共有二十四萬萬英畝的土地，其中有一半因爲氣候太乾燥，不適於耕種。餘下來的一半（百分之五三）因爲溫度不足而不適於種植的，亦佔百分之五。所餘的百分之四八，氣候雖然合宜，但在山陵巖壑之間，地層磽瘠，不能從事農作的，要佔其中百分之四〇。其餘，還有百分之五是沙土。所以在中國的領土中，可耕種之地僅有百分之二九。所以我們要測量中國人口的生存機會，必須第一注意中國人口所佔面積與世界人口所佔面積之比

例，第二須注意中國耕地的人口密度。

現在全世界人口總數約有一、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左右。全世界土地面積總約五七、二五五、〇〇〇方英里。中國土地面積根據英文中國年鑑爲四、二七八、三五二方英里。中國人口，我們上面已假定爲四萬萬五千萬。從此類事實來推算，中國土地面積佔全世界十三分之一，中國人口佔全世界四分之一。由此可知中國人口及土地面積，與世界比較，在各大國裏面算是最相懸殊的了。以這樣多的人口，佔這樣小的地方，其擁擠情形，可見一斑。並且全國地方，不是處處可以耕種的。據前北平經濟討論處的報告，可耕土地面積，只佔全國面積百分之一四．八。西藏、蒙古的大部分，現尙未從事於農業經營，不必去說。卽以本部及新疆東三省而論，全部農田的面積，據農商部調查，不過一、五七八、三六五、九二五畝，或三七四、四六四英方里；又按政府估計本部，東三省，及新疆面積，總計有二、四四六、三六〇方英里，或一〇、三一一、四〇〇、〇〇〇畝。故中國本部，東三省，及新疆的農田總數，只佔其土地面積百分之十六。姑以郵政局一九二三年的調查爲標

準，中國本部，東三省及新疆的人口總數為四三六、〇九四、九五三人，那麼每英方里耕地人口密度為一一六五人。這個密度為世界各國最高者之一，與比利時耕地密度差不多相等，比日本約低一倍，比英國高一倍，比意大利高三分之一，比法國高四倍，比德國高五分之三。這些國家因為人口太多，耕地密度太高的關係，不得不提倡工業，以製造品向各國換取食物，故尚能得到經濟的安全。現在我們中國向來就是一種農業社會，老早便有這麼多的人口，在社會經濟看來，其已經到了一個人滿之點，可謂毫無疑問。

既然中國老早就到了人滿之點，若是生產方法不改變，而同時人口不加多，還可勉勉强强的過去。若仍原是農業社會，而又要鼓勵生育，結果非鬧出亂子不可。我們中國上了孔老夫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的當，一方面不去改良生產方法，他方面又要添子添女。結果人口的數目，超出食料所能供給的數目；換句話說，便是超過人滿之點。其影響只有發生絕大的經濟恐慌，而造成疾病，災荒，戰爭種種可悲的現象。人民死於疾病，災荒者固多；而死於戰爭者更是不少。在我們中國過去的歷史

看來，的確有這種現象。所以有人說中國內亂的發生，差不多有一定的時期，如三十年一小亂，六十年一大亂，一百二十年一極大紛亂。甚至有人拿人口問題去解釋中國的政治歷史，說更換朝代，相互砍殺的時候，便是人口過剩的時候。砍殺一頓以後，人口因之減少了，人口的數目與食料成了一種相當的比例，於是有眞命天子者出，收拾殘局，復歸於和平相安的狀態。過了若干年後，人口的增加，又超過食料的供給，於是又要大砍殺一場。這種說法，雖不足以解釋全部中國政治歷史，但亦有相當的道理在內。

大概中國人口到了中西接觸的時候，已經超過人滿之點。卽使沒有外國勢力的侵入，亦恐怕要發生內亂。證以太平天國之亂，殺人如麻，可見一斑。何況自此以後，西方的機器文明，逐漸把我們的手工業制度根本破壞，使許多人奔入失業之途呢？

說到質的問題，我覺得更爲重要。普通總以爲人口愈多愈好，其實，質若不好，量多又有何益？從歷史上看來，中國民族原來是很優秀雄健的，不但在文化上早有成功，就在體質上，亦是昂藏七尺之軀；不過後來因爲經濟狀況之不充裕，以及崇尚文

弱，看輕體力勞働的風俗，體質一天墮頹一天，成了所謂遠東病夫。男則長衫馬褂，弱不禁風；女則纏足束腰，寸步難移。中國民族有了這種體質，精神上間接亦受影響。沒有勇敢向前的精神，遇事只想敷衍過去。沒有反抗的精神，對於强橫者只知乞哀求憐。沒有冒險的精神，遇難便退。反觀西洋人的特質，剛剛相反。南北洋的冰雪，他們要去探險。大西洋的狂風巨浪，他們要飛過去。走遍天涯，都有白人的足跡。他們受不了社會上種種的壓迫，遇到任何專制勢力，都要推翻，所以民主政治能夠發展。他們受不了自然界種種的限制，要發明機器去征服，所以科學能夠發達。白種人這種精神，雖然有其他原因，但是他們體質强健，亦是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我們若把中國人與西洋人在體質上比較，論高度，白人平均高五尺八寸（西洋尺），中國人只有五尺二寸。論重量，白人由二十歲至四十歲平均身重約一百四十磅，中國人平均還不到百十五磅。論壽命，瑞典挪威人平均約有五十歲，英美人約有四十五歲，法人與日本人約有四十四歲，德人約有三十九歲，而中國人還不到三十歲。論殘廢愚魯，雖無統計可查，但我們可斷言中國必比西洋各國爲多。中國人的確好像是五十多歲的老

頭子，白人好像是年富力强的青年。這種相反的對照，無論在什麽地方，都可看出。若是全世界都尊重我們中國人是老者，並且若是他們和我們中國的孝子慈孫一樣，來侍奉老者，那麽我們中國人還可依老賣老衣帛食肉。不幸人類社會，是生存競爭的世界。老年的中國人，與青年的西洋人去爭生存，並且用武力去爭生存，老年的中國人，自然要被打倒無疑。

（三）　農業

歐洲人還在穴居野處，茹毛飲血的時候，我們中國早已到了農業社會。我們自有歷史以來，歷代無不注重農事。皇帝每年還要親自去行栽禾禮；遇到什麽旱災蝗災，還要向天禱告。一般讀書人，除了自己的特殊地位不願犧牲外，亦把農民擡高在士農工商四個階級的第二位。就是浪漫的文學家，亦要歌頌農事的生活。我們這種農業社會，經過數千年，一直到與西洋文明發生接觸的時候，沒有什麽搖動。全國人民除了少數的手工業者及小商人以外，都與農業發生直接關係。所以中國自古以

來，是以農立國，那是毫無疑問的。我們這種以農立國的社會，有幾個特質；而且因爲那些特質，發生了幾種嚴重的影響。

第一，農業社會生活簡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便是牠的絕妙圖畫。我們若是到內地沒有受到西洋文明的顯著影響的農村去看，便知我們中國原來的社會是怎麼樣的一個情形。男則擔任耕種，早上背着農具出去，晚則牽着牛羊歸來；若沒有意外的災難發生，勉强可以解決食的問題。女則擔任紡織，烹飪之餘，紡紗織布；若沒有疾病生育等事，勉强可以解決衣的問題。這種生活，可以說是家庭自給。除了少數物品，須向別人購買外，都是自備。就是要出去買，本村開雜貨舖的『張三』，或做鐵匠的『李四』，亦可供給，不必遠跑。生活既然如此簡單，生產分工的辦法，自然不會複雜。在經濟上，每家或每個鄉村，差不多能夠獨立，不依靠外面的交換，於是與外間自然很少接觸。鄉下人十個有九個沒有到過縣城。至於婦人女子，則足跡絕少出本鄉村以外。這種社會，雖然沒有完全如老子所理想的『老死不相往來，鷄犬之聲不相聞』的境界，但其實亦差不多了。

在這樣簡單的生活底下，人與人之間，團體與團體之間，或地方與地方之間，關係決不會很密切的。既然社會關係不會密切，那麼自然不需要複雜的，固定的，及强有力的政治組織。有我們這樣籠罩一切的大家庭制度，亦就夠維持了。任憑你做皇帝的是『張三』或『李四』，任憑你朝代的名字變來變去，只要他們的生活可以照舊像輪迴一般的過去，與他們是不相干的。他們只知道奉行故事的納稅給縣官老爺，其餘一切都不知道，都不願去知道。並且也什麼叫做政治？什麼叫做君主，民主？什麼叫做政府，國家？在他們看來，都是不認識的東西。我們以前的中國，有了這樣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渾渾噩噩的人民，難道我們還希望他們有國家的觀念嗎？產生强有力的國家組織嗎？做事有公共的精神嗎？參政有能力嗎？

第二，我們知道社會經濟，由漁獵時代演化到遊牧時代，乃是因爲漁獵時代所需要的地皮，較遊牧時代多。譬如同一塊地皮，在漁獵時代只能養活百人，在遊牧時代便可養活千人。故人口增加，社會進步的結果，不能不走進一個較爲經濟的制度。但遊牧時代與農業時代比較，又不經濟，因爲農業可以利用人爲的力量去耕種，年

年都可得到相當的收穫。人類社會，因爲生齒日蕃的關係，於是又不得不由遊牧時代進化到農業時代。我們中國社會一到農業時代，便站住不動，不知道工業時代比農業時代還要經濟，還可提高社會生活，解決人口增加的問題。我們以爲農業時代已是止境，不能再進，因此經過數千年，我們的生產方法很少變動。但是在他一方面，人口一天一天的增加，結果造成了僧多米少的現象。經濟的壓迫，一天緊張一天，好的年頭，還『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凶年那就『不免於死亡』了。到了不免於死亡的時候，强悍者當然去做土匪，打家刼舍；狡黠者便乘機而起，集衆爲亂。於是政治上自然要經一個混亂時代。

第三，農業社會所形成的生活，是保守的。因爲在這種社會裏面，生活異常簡單，一方面人與人之間的接觸與競爭，比較很少；再一方面，人類所要思想的問題，亦不很複雜。並且農村自給的情形，比較不需要交通的方便；結果當然缺乏交換思想的工具。所以無論在什麽地方，我們都可觀察出來，農業社會比工業社會是趨於保守的。加以我們中國受了儒教傳統思想的影響，總是要遵古法制，不肯改良，於是什麽

都沒有多大進步。不要說別的，姑以農業本身而論，現在一般農民所用的工具，和耕種的方法，與我們百千年前祖先所用的，相差不多。時時發生旱災，可是不想方法去防止。時時發生蝗災，可是不想方法去撲殺。把一切事物都認爲天命，不願有所改變。遇到災荒，皇帝及長官只知奉行故事，禱告上天；人民只有吃樹皮，草根，凍餓待斃。至於種子的選擇，肥料的講究，機器的運用，更是談不到了。這樣的保守成性，又那能適合現代的生活？

我們反觀西洋社會，他們亦是由漁獵時代而至於遊牧時代，再進而至於農業時代。在農業時代的中古社會，他們亦曾有饑荒及各種紛亂現象。不過在十八世紀的中期，他們忽然發生了產業革命，他們於是由農業時代，進展到工業時代。工業社會的影響，剛剛與農業社會相反。

第一，工業社會生活複雜，分工亦就不能不精細。不但一家不能獨立自給，就是一地亦不能獨立自給；每個個人以及每個地方，在全個生產的系統上，只能履行一部分的生產職務。因此他們的經濟關係，在本國以內，像蛛絲網子一般，牽一處全局

都動。這種經濟，乃是以一國爲單位，可名之爲國家經濟。這種國家經濟在政治上，自然需要統一的國家，及强有力的政府去扶助牠保護牠。人民因爲政治與經濟有分不開的關係，亦不能不注重政治。於是由注重政治，而參加政治；進而認識國家的存在與需要；更進而發生國家觀念。人民到了這種地步，國家的基礎當然會鞏固的。

第二，工業社會因爲工廠制度的關係，及商業交易的方便，人口漸漸集中在城市地方。就是鄉間亦有鐵路、汽船、汽車、電報、電話爲之聯絡。個人間接觸的機會，當然隨之加多。一方面，因爲生活複雜，所遇到的問題很多，不能不用思想去解決；他方面，因爲交通方便及人口集中的原故，思想的傳佈極快。社會常在動的狀況底下，總是向前進展，不至如農業社會的保守不動。愈前進，愈進步，此所以西洋社會自工業革命以來，其進步的速率，真令人不可思議。

第三，工業社會因爲運用機器，以及分工方法，工廠制度等等，於是有大規模的生產。生產愈大，出品愈多，而社會的財富亦愈增加。工業國家可以拿製造品去交換農業國家的食料，故能以極小的地皮，維持極多數的人口。人口的數目，雖然激增，但

人民的享受，反比在農業時代爲優裕。此所以現在一般沒有到過中國的西洋人，時常看見報紙上說中國有千萬的災民，在吃樹皮，草根，甚至於人肉，覺得異常驚駭，認爲這是世間不可能，不可思議，不可相信的事。

由此比較，我們中國是以農立國，西洋先進各國是以工立國。我們的農業社會，家庭可以自給，生活非常簡單，不需要强有力的政府組織，我們自然亦不會發生什麼國家觀念。西洋的工業社會，則因爲經濟關係的複雜，不能不注重政治，更不能不有完備的國家組織。並且我們知道，農業社會趨重保守，工業國家趨重進取；農業社會的財富增加有限，工業國家的財富增加無窮。以進步的，富强的西洋國家，與保守的，貧弱的中國相碰，我們那有倖勝的道理。

(四) 工業

我們中國在沒有與西洋接觸以前，既完全是農業社會，那麼我們的工業，亦不過是農業的附屬品。我們的生活很簡單，不需要聽什麼無線電，看什麼電影，聞什麼

香水，坐什麼汽車，吃什麼山珍海味，喝什麼香檳啤酒，住什麼高堂大廈，穿什麼毛織西裝。我們只要有耕田的農具，粗陋的器皿，便足夠了。雖然少數的貴族，有時需要珍品的裝飾，然究竟對於社會一般人的生活，毫不相干。在這種簡單的生活裏面，工業當然沒有發達的希望。我們若是到內地去旅行，所看見的都是田疇阡陌：至於製造物品的工廠，絕難找到；只有在比較人多的市鎮，或可發見一二家鐵匠舖子及木匠舖子。我們要記着高入雲霄的煙洞，與備有機器的工廠，乃是中西接觸以後的事情。

我們的工業沒有現代那個機器怪物來幫助，一切的工作，只好用手。你沒有看見打鐵的嗎？在火星迸裂之下，只見兩個赤背的人，彼此拿着鐵槌，你一下，我一下的輪流打着。隱約中，你還可看見他們兩臂筋骨的膨起。若是你再到一個木匠舖子裏面去看，這些木匠們所用的工具，只有刀，斧，鋸，鑿那麼幾件簡單的東西。一塊厚的木板，需要兩個人一來一去的鋸一天到晚。這當然是手工業制度與西洋的機器文明不同的地方。

我們要問，這種手工業在什麼地方做呢？當然不是在煙洞高聳的工廠裏面；那

裏是用機器製造大批的生產，至於幾張粗笨的桌子椅子，在家庭裏面，便可製造。所以你若到一個內地的市鎮上去，還可完全看見那種家庭手工業的遺風。不管牠是鐵匠舖也好，木匠舖也好，門口總是擺着製成的物品，店裏就是作工的所在，後面即是住家的地方。假使老板『張三』是做打鐵生意的，那麼老板『張三』的全個家庭，都要與打鐵發生關係。老板的兄弟身强體壯，可以拿得起鐵槌，便與老板打個來回。老板的兒子，年齡還小，便去抽送火爐。老板婆既不能打鐵，又不能抽送火爐，自然逃不了燒飯做菜兼管拍賣貨品的責任。若是生意太多，一家人分配不來，那只好添請一兩個人來幫忙。這種辦法，當然不是大規模的工廠制度，而是家庭手工業制度。所謂家庭手工業制度，乃是製造的地方，與住家的地方，混做一起。家庭便是工廠，工廠亦是家庭。

這種家庭手工業的供給範圍，是有限的，多半限於本鄉，至多是本縣。本村本鎮需要什麼東西，差不多可以預料出來。甚且有些舖子，須先向他定造，他才承辦。若拿我們這種家庭手工業制度，與西洋現代工業比較，那簡直有天淵之別。他們的工業，

差不多都是以全國爲活動的對象。有些貨品，甚至以全世界爲市場。美國的福特汽車，大家都知道正在逐漸暢銷於五大洲。各國電影的戲園，大半都映美國的片子，至於英國的毛織物，亦大部分銷售在本國以外。兩相對照，我們才知道中西社會經濟生活的背景，是多麼大一個差異！

爲什麼如此簡單的家庭手工業制度，能滿足我們中國社會生活的需要呢？當然這是因爲我們的社會生活異常簡單，用不着複雜的工業。但爲什麼我們的社會生活那麼簡單？這又不能不說是農業社會自然的現象。關於此點，上面已經說明，不必重行討論。我們此處所要添說的，就是這種家庭手工業制度，最多只能造成市鎮經濟，決不能養成國家生活。各個農村所需要的製造品，本市鎮的小工店都可供給，又何必去遠求。於是全國以內，便分爲無數自給的小經濟單位，而各不相需的過活。所謂國家，乃不過成爲地理上一個名詞，在經濟上並沒有什麼意義。

我們自工業的進化看來，全世界的經濟歷史，可以分爲三個階段，五個時期。第一個階段是家庭經濟，其中可分爲兩個時期：（一）家庭自給時期，與（二）家庭僱工

時期。在家庭自給時期之內，本家所需要的東西，自己製造，自己受用。我們中國內地的家庭，衣服鞋襪，完全不要向外去買。田裏拾的棉花，婦女自己可以紡成棉紗，織成棉布，做成棉衣，棉鞋，棉襪。有時需要一隻木箱，自己不能製造，才去買一根木頭，雇一個木匠到家裏來做。如是便到了家庭傭工時期。

第二個階段是市鎭經濟。其中亦可分爲兩個時期：（一）手工業優勝時期，與（二）手工業附庸時期。歐洲在工業革命以前，中國在沒有與西洋接觸之先，完全是在手工業時期以內。許多小工業者，自己用兩手製造，自己定價拍賣，自己是工頭，自己又是企業者。你需要什麽東西，他可承辦製造。你若有材料請他去做，他願意，便答應；他不高興，便拒絕。這是手工業優勝時代的情形。到了後來，這些小工業家，失却了獨立的地位，被商業資本家收買去承辦各種產品，不能自己作主，這便到了手工業附庸時期。

第三個階段是國家經濟。國家經濟的生產現象，便是工廠制度。說到此地，我預先要聲明，便是此處所謂國家經濟的意義，與李士特 List 所謂國家經濟不同。李士

特所謂國家經濟，乃對英國經濟學正統派所鼓吹的世界經濟而言，主張關於必要的產品，國家應該自給，不應如正統派所說，根據地利分工的辦法，倚靠別國的出產。我此處所謂的國家經濟，倒不是指國家自給而言，乃是指國家爲經濟的單位而言。國內各處根據本地的天然財源，及人民的傾向，製造其特殊的貨品，以與他處交換，相互倚賴，不能獨立。工商業的範圍，及其組織，不限於市鎭，而遍佈於全國。各地的貨價，相差不多。各地的資本，勞工，及產品，流動極快。有鐵路、輪船、汽車、電報、電話爲之貫通一切，把全國的經濟生活打做一片。並且進一步，與外國通商，『以其所有，易其所無。』這就是我此處所謂國家經濟的意義。這種國家經濟，在工業方面所表現出來的是工廠制度；在商業方面所表現的是公司組織。

根據上面那三大階段的分法，來看我們中國在沒有與西洋接觸以前的工業，到底在那一個階段。我們可以無疑地說，城市方面，大概在市鎭經濟的階段；至於鄉下地方，尚未脫離家庭經濟的範圍。換句話說，我們顯然沒有到國家經濟的地步。在生活上，各地方彼此沒有密切的關係，那麼所謂『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乃是必

然的結果。這種國家，經濟上的背景，如此一盤散沙，互不相關，政治上當然不會有强有力的國家組織出現。

(五) 商業

工業與商業是極有關係的。工業是製造貨品的；商業是交換貨品的。沒有貨品，把什麼去交換；工業不發達，商業那能繁榮？現在西洋先進各國的商業，所以遍佈全世界，亦是因爲工業發達的緣故。假使他們沒有工業，他們憑什麼來與落後的國家通商，吸取我們的原料與金錢？我們中國既是農業社會，我們中國的工業既是居於極微弱的地位，我們的商業又有什麼用處？而且上面已經說過，我們的手工業者，自己兼管拍賣工商兩種功用，混做一起。在這種情形底下，商業又怎能發展？所以從工業上看來，中國以前商業之不振，是理所必至的。

那麼中國完全沒有商業嗎？這又不然。中國是農業社會，中國的商業既不能倚靠工業，那麼只有附屬於農業上面。原來就是在農業社會裏面，地方經濟不自足的

時候，亦需商業爲之救濟。不過農業社會所感不足的，不是什麼奇異的產品，如酒精，硫酸，石油之類，不過是些稻粱菽，麥黍稷，油鹽酒茶，布帛絲痲等等而已。我們若是到內地街上去看，賣油鹽雜貨糧食的鋪子，總居多數。農民把他剩餘的產物，挑出街來賣；所得之錢，卽拿來買些油鹽雜貨回去。農民所需要的很簡單，所以商業所販賣的貨品，亦當然很簡單。

中國商業，不但販賣的東西很少，並且活動的範圍亦是有限。在農業社會裏面，農村是分散的，不集中的。當然依賴農業存在的商業，亦不能集中起來，只好隨農村的分散而趨於分散罷了。你若不相信，你往內地去旅行，過幾十里便有一個十幾家商鋪的市鎭，當可明白。今日的上海，是中西接觸以後的產物，與其說是中國的土地，毋寧說是西洋及日本的商場。我們要曉得先施永安，不能代表我們中國原來的商業。花露水，雪花膏，決不是我們中國社會原來的需要品。

在這種簡單的商業底下，商業的管理組織，當然不需要股分公司那樣複雜的組織。市鎭上一個小小的鋪子，有數百千元的資本便夠周轉，有一位老板和一兩個

徒弟亦夠分配。在這樣小規模的營業裏面，獨力經營的制度，自然比較適宜，用不着組織什麼公司，小題大做。若是實在資本不夠，那麼合股營業的辦法，亦可解決。

還有一點應該注意。我們中國素來是奉重農主義的，對於商業很看不起，認爲凡是從事商務的人，卽是漁利人民的人，不承認他們在經濟上有什麼價值。所以士農工商，故意把商擱在最低下一個階級。這種輕商的見解，是不是農業社會裏面所應有的哲學呢，或是我們的儒家獨出心裁的思想呢，我們可以不去理他。不過無論如何，這種見解，對於抑制商業，不無影響，那是可斷言的。

我們知道商業社會是重交換，流動，轉運的；是把國內各個地方聯做一起的；是思想的媒介，進步的原素，國家組織所由養成的一種力量。中國商業既不發達，那麼社會的保守成性，與政治組織的不健全，亦不是意外的一種結果。

（六）　交通

我們以前沒有輪船、鐵路、汽車、電報、電話等等。爲什麼道理沒有？難道我們中國

人的腦筋，不夠資格發明嗎？發明指南針及火藥的中國人，很難承認。退一步來說，假定我們中國人神經沒有這麼微妙，不能發明這些利器，難道連路不會修不成？因此，其所以連道路不修，此中必還有道理。

爲什麼要交通？當然不是爲交通而交通，乃是因爲此地方的製造品，要運到別地方去賣，換句話說，必要工商業發達，然後交通乃得發達。西洋現在之所以有那些交通利器，都是與他們工商業的進步，有極大關係。若是他們沒有大批的製造品要賣出去，他們要那麼多輪船火車幹什麼？我們中國既然是一個農業社會，工商業又不發達，各個鄉村差不多可以自給，自然不需要輪船火車那些東西。需要爲發明之母，無怪乎我們不能發明交通利器，更無怪乎我們的交通不方便。

北方缺少河流，不能利用航運，所以交通的工具，便不能不用騾車，馬車，駱駝等等。南方水利很多，所以多用木船，但在陸上還不得不着重人力。我們若到內地去旅行，在路上隨處可以看見許多的挑脚，一根扁擔，兩頭載着東西，氣喘喘像牛一般的挑走。過重的東西，一人負擔不下，便用兩人或多人來抬。在漢口上海那些地方，一般

苦力不勝其苦，還要前呼後應的哼出聲來。其次要算用單輪土車，普通每個土車可以推一二百斤的東西。你在遠遠的地方，便隱隱約約聽見他的輪聲。一個土車，從鷄鳴起來直到太陽下山，至多不過走得一百里路程。以外還有乘輿等等，都是些野蠻的交通方法。

全個社會在這種交通情形底下，人民那能容易流動，思想那能容易交換，各個地方那能容易彼此往來，一切貨品又那能容易轉運。所以一切一切，只好歸於停滯，各個地方，各自爲政，不能統一起來。於是由經濟自給，言語差異，地方思想，到國家生活之不能養成，政治組織之不能完密。一切戰亂，便難收拾。

（七） 結論

總括看起來，我們的物質背景有下列各點：

（一）中國是一個遼闊的大陸國家，物產饒多，宜於農業自給的社會。並且四面封塞，與外界很少接觸。

（二）中國人口因爲自然繁殖及儒教鼓勵生育的緣故，在量的方面，早就到了人滿之點。一方面，生產方法沒有進步；他方面，人口繼續增加，結果食料缺乏，只有發生疾病，災荒，戰爭種種現象。在質的方面，因爲崇尚文弱的風俗，體質遠不如古時的雄健，同時喪失了犧牲，冒險，勇敢等等精神。與白人比較起來，無異是老大病夫。

（三）經濟上中國完全是以農立國。所謂工商業，不過是農業的附屬品。在窮鄉僻壤地方，尙沒有脫離家庭經濟的範圍；在全體看來，當然在市鎭經濟時代。各個鄉村，經濟上差不多都可自供自給，無需與其他地方交換物品，故交通不能發達。

有了上面那樣的物質背景，那麼在這些物質條件底下所產生的中國社會，當然脫不了下面幾個特點：

（一）中國社會因爲農業的背景，地勢的閉塞，結果是保守的，不進步的。

（二）中國社會因爲外面沒有國際的競爭，內面沒有嚴密國家組織的需要，所以人民缺乏國家觀念。

（三）中國社會因爲生產方法沒有進步，而生育又多，兼之崇尙文弱，看輕勞動，

所以人民是很窮困的，文弱的。

（四）中國社會因爲不需要强有力的國家組織，不需要嚴密的政治制度，所以人民對於政治漠不關心，全國只能在一盤散沙的情形底下過活。

這是我們中國在沒有與西洋發生接觸以前的物質背景及其對於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以一個保守的，窮困的，文弱的，國家觀念薄弱的，好像一盤散沙的國家，與進步的，富足的，强悍的，國家觀念極强的工業國家相遇，誰勝誰敗，自然不待我們多說了。

第二章　中國問題的社會背景

（一）家庭制度

籠罩中國社會一切的，便是家庭制度。無論那方面的社會生活，總脫不了牠的影響；一切的文物制度，大都建築在牠的模型上面。牠實在是中國社會的基礎。惟其是如此重要，所以凡是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人，沒有不注意到家庭問題。不過在過去討論這個問題的人，多是以家庭本身爲研究的對象，很少着眼在牠對於全個中國問題的影響。我們此處之所以要來討論這個問題，並不是要來舊事重提，鋪張些陳詞濫調來湊熱鬧，乃是要來說明中國問題之所以成問題，我們的家庭制度乃是其中一個極重要的背景。

我們中國的家庭制度顯然與西洋不同。西洋的家庭，只包括夫妻及沒有結婚

的子女，普通不過是四五個人而已。我們中國的家庭那就不然。縱的方面來說，兒子結了婚，並不像西方習慣一樣，去另立家庭，却是帶同他的夫人與他的父母同居。若是他又生了兒子，兒子又結了婚，兒媳還是與他的父母及祖父母同居。由是一家之中，可包括好幾代的人。在我們以前的社會，『五代同堂』並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到了現在，『三代同居』還是很普遍的現象。再由橫的方面來看，兄弟不分家，也是我們中國家庭制度的習慣。因此我們的家庭的份子，有增加到數十人之多，與西洋比較，自不得不謂之大家庭制度。

這種大家庭制度是我們中國人一切活動的中心。我們的倫理道德都是以繼續，保持，或擴大家庭爲標準。你若去做官，你的目的，並不是去爲國家服務，乃是爲『光耀門楣』。你若去做生意，你的目的，並不是去爲你個人，或你的妻子謀生活，乃是爲你全家履行職務。管理你最有力的人，不是國家所設的長官，乃是你的家長。你若犯了事情，不但罪及你自己，還要連帶你家庭。的的確確，這是籠罩中國社會一切的一個制度。

每個家庭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國家。每家有一個家長，猶之全國有一個皇帝一樣。家長的權威在一家之中是最高無上的。家庭裏面的份子，都要受他的節制。在一個小家庭裏面，若只包括『夫』、『婦』、『子』、『女』，那麼『夫』當然是家長。『夫』死以後，他的夫人便繼任爲家長。若父母雙亡，而兄弟又不願分家，那麼『兄』當然是家長。假使是一個大家庭，繼任家長的次序，便大概如下：祖父、祖母、叔祖父、叔祖母、父親、母親、叔父、叔母、哥哥、嫂嫂。若是現任的家長，因爲年紀太高，體力精神兩不夠用，不願再管家務，他便傳位於繼任的人。若是合理的繼任人，或因品行不端，或因能力不夠，不能擔負這種責任，便傳位於其次合理的繼任人。所以中國家長的繼承法，第一是根據輩次的大小，不分男女；第二是根據品性才能，能否擔起責任。

做了家長的人，權力是很大的。他是一家的主宰。家事無論大小，都要由他經管。幼輩對他，必須服從尊敬；同時他對於幼輩的行爲要負責任。若有不聽從他的，他可以懲罰；假使是他自己的兒女，更可隨便打罵。經濟方面可說是共產生活。家庭份子所賺的錢，都要歸公，由家長經管。（至於前人所傳下來的遺產，那不消說是全家公

共的財產了。）同時家庭份子需要錢用，也須向家長去要。家長可以決定子女的婚嫁，可以操縱子女的教育。總而言之，他是一家的小皇帝。

家長所賴以維持他的權威的東西，便是孔子的學說以及傳統的禮教與風俗。什麼『三綱，』什麼『五常，』什麼『孝弟，』都是支住中國家庭制度的柱石。根據這些傳統的思想，禮教及風俗，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間，都有嚴密的規定；紅白喜事都有一定的規矩。譬如拿『孝弟』兩字來說，『孝』是指子女對父母的關係，『弟』是指幼者對長者的關係。不講『孝弟，』便不能維持家庭的秩序。所以無怪孔子說，『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歟。』

有些國家有國教。中國家庭也有家教。這種家庭宗教便是『崇拜祖先。』爲什麼要崇拜祖先？一方面因爲要團結一個大家庭，非要有一種共同信仰不可；他方面因爲宗法社會最注意的是血統關係，非要『愼終追遠』不可。所以『崇拜祖先，』是中國家庭制度裏面一個必要的元素。在有錢的人家，須特別建築祠堂，以爲祭祀祖先的所在。卽使在普通人家，家內也有祭壇的設立。每年的元旦或每月的初一與

十五，都有祭祀的舉行。即在結婚的時候，新夫婦也必須在祖先的牌位前行三跪九叩禮。

『崇拜祖先』既然爲家庭裏面的宗教，那麼教主是誰呢？教主便是我們的家長。教條又是什麼呢？教條便是『不孝有三，無後爲大。』因爲無後，便要絕代，一經絕代，便沒人來繼承香火，崇拜祖先，所以無論如何，後人是非要不可的。假使一定要有後人，那麼自然要鼓勵生育，多多益善。早婚是可以助長生育的制度，故不能不實行。女子是要嫁與別人，不能繼承本家香火的，所以有重男輕女的習慣。若是第一個夫人沒有生育，或生育而沒有男孩，爲避免不孝的罪孽，便不能不去討妾，於是社會上有一夫多妻的制度。並且因爲崇拜祖先的緣故，我們中國人對於喪葬之禮，非常隆重；各種迷信如風水等等，亦隨之而起。

與上面所說的大家庭制度相連而不可分開的，便是家族制度。一個家族包括多個的家庭。他們普通都同住在一個地方。有時一個村落完全爲清一色的姓張的或姓李的所構成。他們同出於一個祖先，普通大概有一個公共的祠堂。大族甚至有

好幾個。祠堂裏面，供着歷代祖先的牌位，按着輩次的大小排着。每於『清明』和『冬至』兩個時節，族人便聚集在祠堂裏面舉行祭祀。祭祀以後，還有宴會。若是族裏面發生緊要的事情，卽在祠中開會議決。祠內置有田土屋產等等不動產，大概由族中德高望重的人經管。每年所得的利息，作爲一族的公用。各族都有一個宗譜，每隔若干年要修訂一次。這是各族血統的成文證據，在我們中國家族制度上佔一個很重要的地位。

家有家長，族也有族長。一族當中，年紀和輩次最大而又有錢有能力的人，便是當然的領袖。如果族內發生爭端，當事人家不能了結的時候，那麼便要請族長出來調解裁判。他們的辦法，大都能得當事人的服從。萬一兩造不服，要去衙門裏面打官司，官廳方面也必斟酌他們的意見。同族的人，如果行爲不端，如忤逆不孝或損害本族的名譽者，他們有權可以處罰：或罰錢，或罰設酒席陪罪，或打屁股，或至於施行死罪，縣官並不加以干涉。

上面所說不過中國家庭制度的一個大概。我們的目的不是在討論家庭問題

的本身，乃是要討論牠在全個社會的影響；所以關於牠的組織，說一個大概也就夠了。我們現在要問爲什麼我們中國有大家庭及家族制度，並且爲什麼有了以後，經過幾千年，一直到中西接觸的時候而沒有什麼變化？

原來有兩個根本的原因：一屬於物質的，一屬於精神的。所謂物質的原因便是農業社會的背景；所謂精神的原因便是儒家的學說。中國是以農立國，全個社會在與西洋沒有接觸以前，大都在鄉村自供自給的情形底下生活。一般人民，事實上可以『生於斯、長於斯、老於斯、死於斯』，不必他遷。他遷也因爲交通不方便，感覺到種種的困難，於是養成了一種『安土重遷』的風俗。既然生活上可以不他遷，並且難於他遷，那麼只好聚族而居。兼之我們中國以前的經濟，尙沒有脫離家庭經濟的範圍，家庭愈大，則互相幫助的機會愈多。何況血統的關係，是世間一種最自然的團結呢。

制度可以影響思想，思想也可以影響制度，這是一般社會科學家所公認的。宗法社會可以產生宗法社會的思想，宗法社會的思想同時也可以鞏固宗法社會的制度。我們中國的儒教學說固然是宗法社會的產兒，同時我們知道牠對於中國宗法

社會的維持，有極大的貢獻。其所謂『三綱』即是『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夫爲婦綱。』其所謂『五常』即是『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按其大體，莫不以擁護大家庭制度爲目的。這種宗法社會的思想，到後來竟演成完密的禮教。凡冠、婚、喪、祭、應對、進退，都有嚴密的規定，繼續範圍了中國人心兩千多年，一直到中西接觸的時候，才生變化。

中國家庭制度自然有牠的好處，若沒有牠的好處，也不至有這樣長的壽命。不過這裏我們所注重的是中國問題的由來，那麼我們對於在過去不發生問題的好處，自然可以不說。我們要說的當然是牠引起中國問題的壞處。

究其不良的影響，可分政治，經濟，公德三方面來說。在政治方面，因爲中國家庭制度產生了異常濃厚牢不可破的家庭觀念，那麼間接便阻礙了國家觀念的發展。我們中國人的生活，差不多完全受家庭的支配。你的事業功名，甚至於結婚生孩子，都是爲着家庭。你的生活費用，都是由家庭供給。你所賺的錢。都要交給家庭公用。你在外面與人發生爭端，都要由家庭出來負責了結。你的生活各方面，都在這『小天

地』裏營養着。你並不需要什麽政治組織。這樣一來，家庭便站在個人與國家的中間，差不多完全把國家的面目掩住。人民不但沒有機會去認識國家的存在，並且很少與政府發生什麽關係。我們目見耳聞，以及一切活動，都不外乎家庭的範圍，最多也不過知道點本縣的事情。至於什麽是中國，是政府，我們都是茫不關心的。我們只知道愛家，不知道愛什麽國。我們只知道做一個良好的『家民，』不知道要做一個什麽良好的『國民。』因此我們中國以前的國家組織，不過是皇帝維持江山的一個系統，在人民的生活上看來，並不覺得牠的存在。在太平時代，還可『家自爲政，』在無政府狀態底下過活；若到亂世，則有如一盤散沙，極難收拾。何況與西洋接觸之後，連家庭制度都漸次崩潰；全個社會無一根本維繫的組織，這又安得而不鬧出亂子呢。

中國家庭制度不但阻礙了國家觀念的養成，並且妨害了經濟的發展。一家裏面只有一個人做事賺錢，其餘的人都是依靠吃飯。在負責者方面，看見大家都是混飯吃，自然有時不願意十分賣力。在不負責者方面，便依賴成性，一無所長，只知消費，

不知生產。於是『生之者寡，食之者衆。』如此社會總是『僧多米少，』又安得而不鬧窮？並且因爲全家連帶負責的關係，一人冒險成功，固然是萬分徼幸；若一人冒險失敗，則全家必至受累。所以我們中國人在經濟事業以及其他方面，都沒有久遠偉大的企圖，只想苟且偷安，得過且過。還有我們中國人每做一件事情的時候，要援引許多的親戚家族，雖造一所工場，開一個商店，也不能免除這種毛病。工廠所用的職工，與商店所用的店員，大部分總直接間接與廠主或店主有相當的關係。卽使你不想隨便用你的親屬，但是你終竟抵抗不過家族的壓迫。因此所用非人，寄食者多，社會事業，往往失敗。此又不獨限於經濟範圍爲然。

中國人既然只有家庭觀念，沒有國家觀念，沒有社會觀念，那麽所謂公德，當然是很難發生的了。你若去研究中國聖賢所謂道德，及觀察社會上所認爲的道德標準，大體都是以家庭爲中心。凡有利於家庭的行爲便是好的，有害於家庭的行爲便是壞的。在家庭以內，中國人非常能夠犧牲。一人賺來的錢，可以給全家去用，長輩有病，『侍奉湯藥，』可以日夜不離。家裏有人犯了什麽事情，全家可以頃家敗產爲之

救護。家裏若有人要去做一件事情，全家可以全力爲之扶助。但是一出家庭範圍之外，便不同了。若是自家的人與別家的人發生爭端，他便不問是非曲直，一意袒護自家的人。假使街上有人打架，只要沒有他的親戚家族朋友在內，他看見不但不去調解，反要去圍看熱鬧。若是你可以做得到官，不管你有沒有資格，不管你是如何鑽狗洞來的，更不管你做了以後對於社會的利害如何，家裏無不竭力贊助，認爲你是『光宗耀祖』的『孝子賢孫。』若是你可以發得財到，不管你去欺騙也好，括地皮也好，侵呑公款也好，家裏決不反對，並且認爲你是有本事的人。

這種家庭關係不僅如此，還要推廣到親戚朋友上面去。你做了官，你的親戚朋友都來了。你不管他們能否勝任，必須設法安置他們。你發了財，他們也都來了，用你的，借你的，吃你的，好像是當然應享的權利。同時你要做什麼事情，無論是魚肉鄉曲，或是爭權奪利，你的親戚朋友，總可替你幫忙。你若是一個大富翁，你情願把錢給你的子弟去嫖賭，逍遙，抽大烟；你情願用去修墳墓，建祠堂，祭祀祖先；你情願去豢養親戚家族朋友；却是你不願意捐助慈善事業，或去辦什麼公共利益的事情。修道路，辦

學校，設立圖書館，創辦博物院，建築運動場，你認爲與己無關，所以一毛不拔。總而言之，你願爲子孫做牛馬，你不願爲社會謀幸福。這是中國人普通的心理，這也是中國家庭制度的特殊產物。有了這種過分發展的家庭制度及其附屬的道德標準與倫理觀念，公共道德自然很難養成。那麽中國人最不講公德的現象，並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若是把中國家庭制度與西洋家庭制度比較，論組織、論範圍、論對於國家社會所發生的影響，兩下又是大不相同。西洋的家庭是小家庭，只包括夫婦及沒有婚嫁的子女。兒子一結了婚，便要離開父母，自立家庭。女兒一出了嫁，自然要跟着丈夫。父母並不靠兒子傍老，兒女結婚以後，也不靠父母吃飯。兩方面除了骨肉的愛情外，沒有經濟上、法律上的連帶關係。在家庭裏面，夫妻的地位平等，男人沒有中國家長那樣大的權威，對於子女雖有教育的責任，但不用高壓的手段。全家之中，只充滿了『愛，』不像中國家庭到處佈滿了禮教。在法律上或在社會上，各人所做的事，由各人自己負責，並不累及全家。凡是關於個人間的爭端，以及在社會上的權利義務，有

國家的法律及其機關爲之詳細規定管理，用不着家庭出來過問。簡而言之，西洋國家是以個人爲單位，不像我們中國以家庭爲單位。因此個人與國家中間，沒有家庭爲之隔開，接觸的機會很多，於是個人由認識國家的存在，而發生國家的觀念。

同時因爲家庭以外的公共生活，機會很多，不像我們中國人永久被關在家庭的『小天地』以內，自然需要公共的道德爲之維持，所以在西洋社會裏面，公德非常發達。他的道德觀念，不是以家庭爲標準，乃是以國家社會爲前提。凡有利於公共事業的行爲，便爲道德。凡有害於國家社會的舉動，便是罪惡。並且因爲父母不能靠子女，子女不能靠父母，親戚家族更不能互相倚賴的關係，人人都要謀經濟獨立；對於一切事業，無不勇往前進，社會又安得而不繁榮，國家又安得而不富强？

還有一層，我們應該知道西洋人所注重的是社會組織的繼續，及個人生命的繼續。根據前者於是發生了强有力的國家組織，根據後者於是發生了基督教的信仰。至於我們中國人兩者都看得很輕。我們所注重的，是介在個人生命與國家組織的中間；直言之，便是家庭的繼續。我們中國的家庭，不但包括現在活着的分子，並且

包括已經死去及將來要生的個人。死者的幸福，全靠生者供奉；生者的幸福，又靠死者保佑。但是今之生者，又是將來的死者，那麼爲繼承香火起見，當然要奉『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爲金科玉律。所以由此看來，我們中國人的人生意義，不過在維持家庭生命的緜延；我們的責任，不過是承先傳後。至於個人本身在社會上，並沒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及特別的人格。

（二）　地方主義

與成立於血統關係的家庭制度有密切關係，而同時在社會上佔着重要地位的，便是地方主義。我們中國人的門第常用木牌或銅牌書着主人的戶籍與姓氏。什麼閩侯林寓，什麼山東曹州吳寓等等，你在大城裏面隨處可以看見。再若不然，要是有客人來見你，客人的名片上大概刻着安徽合肥或四川成都等等的籍貫。要是客人沒有帶名片，而又是初次見面，你第一句話必定是問他『貴姓大名，』第二句話必定問他『貴省貴縣。』你在外省的時候，若要謀事，大概先去找同鄉。若你做了官

或在社會上有相當的地位，必有許多同鄉來找你幫忙。我們中國人的同鄉觀念既然如此發達，那麽在反面的意義看來，便不免要排斥他鄉的人。他鄉的人到了任何地方，都要被人家以客籍相待；卽使在這個地方住了兩三代的時間，還是同樣的受人岐視。因此同鄉的人，自然要集合起來，組織同鄉會，設立會館等等。北平以前是一個京都，各地的人都有，所以會館也最發達。各省有各省的會館，各府有各府的會館，甚至於各縣有各縣的會館。會館不但是同鄉的社交機關，並且還有教育同鄉子弟，救濟同鄉貧窮，干涉本地政治等等的活動。

爲什麽我們中國地方主義這樣發達呢？這又不能不使我們聯想到經濟背景與家庭制度了。因爲我們受了家庭制度的影響，所以我們中國人大概都是聚族而居。因爲我們中國是一個農業國家，所以我們的社會分成了無數個自供自給的鄉村。鄉村裏面，有時是淸一色的同族，有時是合數族而成。其範圍大小不等，有數戶的，有數十戶的，有數百戶的。村與村間，在交通不便的情形看來，相隔是很遠的。張家灣與李家寨雖相隔不過十餘里，平常却很少往來。這種鄉村社會經過數千年沒有多

大變動。不但自己是『生於斯，死於斯；』就是祖宗三代，也沒有搬動過。本鄉之內，大家不是有親戚的關係，卽是有家族的關係，而且在政治經濟上，都是自成一個單位。本鄉村有什麼爭端，紳士可以出來解決。本鄉村需要什麼東西，很少靠外面供給。這種結合之下，自然發生種種利害上的關係，異常親近，而成爲唯一的互助團體。尤其是時常受土匪襲擊的地方，由於協同防衛的關係，鄉村的結合愈加鞏固。

鄉村的結合愈鞏固，則愛鄉的觀念愈深切。由鄉推到縣，由縣推到省。在本縣別個鄉村的時候，則以同鄉村的人爲同鄉。在別縣的時候，則認本縣的人爲同鄉。以前有府屬的時候，若在別府，則認本府的人爲同鄉。推而至於在別省的時候，則當然認本省的人爲同鄉。這種地方主義的色彩，真是染滿了社會生活的各方面。其對於政治經濟的影響，與家庭制度差不多是一樣。

地方觀念愈强，則國家觀念愈弱，這是一種自然的結果。一個人的感情有限，如果愛了這個，便不能愛那個。我們中國人既然極端的愛上了家鄉，當然對於站在家鄉以上的國家，很難認識。我們只知道自己是某省某縣人，我們很少想到自己是一

個超省界縣界的中國人。我們做事只知援引同鄉，而不顧到國家的利益。全國之內，劃成了這麼許多省縣同鄉的界綫，那裏又容易產生出一個共同的國家觀念。我們觀察中國的政治，便可明瞭地方色彩的嚴重。什麼直派，皖派，奉派，與夫聯省自治的主張等等，都是地方主義發達的自然現象。一班軍閥政客看透了這種心理，於是不惜利用同鄉的觀念，去團結他們的勢力。普通人民受了這種心理的遺毒，也去攀龍附鳳的追隨，做他們的工具。上而至於中央政府，下而至於地方政府，各個衙門，差不多成了同鄉會館。什麼叫做廉潔政治，什麼叫做文官考試制度，都是這種地方主義底下不能容忍的東西！

不但在政治上是如此，即在經濟方面也十分表現這種色彩。我們中國的商店，所用人員，當然是同鄉居多。並且有時商業的種類，完全根據同鄉的關係而分。譬如從前做匯兌事業的，大概多是山西人；開雜貨店的，大概多是廣東人；在北方開飯館的，多是山東人。職業與鄉土既然發生如是密切的關係，所以同鄉團體的會館，與職業團體的公所，有時也無多大的區別。這種現象，又不單限於商業方面，即在工業方

面，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們中國的手工業者，要帶學徒，多是從同鄉裏面招來。地方主義得了我們這種經濟的與政治的背景，於是更加根深蒂固，牢不可破。

(三) 國民心理

第一要算中國人自私自利。這種心理，好像變成了我們中國人的人格一部分。無論什麼事情，沒有報酬，我們大概不會做的。我們旅行，到了日暮途窮的時候，若去問道旁店家的路，往往大碰釘子。若是我們能夠稍爲出點錢，買他一點東西，店老板便可以親切的給你指教。上而至於軍閥的剋扣軍餉，官僚的剗括地皮，下而至於家裏老媽子的落錢，無一不是自私自利的表現。加入政黨，並不是謀什麼主義的實現，乃是希望得到升官發財的機會。今天於我有利，今天可以與某甲提攜；明天於我有害，明天便可轉過頭來，與某乙結合。翻雲覆雨，無非爲自己的利害打算。這種自私自利觀念，有時衝破血統的關係，使父子反目，兄弟成仇。

我們要知道別國人不是完全不自私自利，不過沒有我們中國人這樣利害罷

了。這究竟是什麽緣故呢?最大的原因,還是經濟的壓迫。我們中國是農業社會,生產方法,幾千年沒有改變,而又時常遇到旱災水災的大荒年。在全部中國史裏,似乎沒有一個連上幾十年『風調雨順,物阜年豐』的時期。兼之每到一個大荒年,北方半開化的民族,便要乘機侵入內面無業的羣衆,便要乘機揭竿爲亂,引起一個絕大的紛亂砍殺。結果連可以耕種的,也不能耕種,全國只有窮餓。我們可以大膽的說,我們各人的祖宗,總有受過災荒窮困磨難的。在這生存競爭極强烈的情形底下,若是我們損己利人,解衣推食,那麽我們一定要被淘汰。反而言之,若是我們完全不管他人,自私自利,搜括錢財,預防窮困,我們生存的機會,自然要多許多。譬如舉一個例來說,假使有一個地方,每家只有六個月的糧食,若要吃到第二年收穫的時候,每家還差六個整月的食料。要是有一家特別慷慨,分些糧食去救別人家,那麽這家自己生存的機會便要減少;到了自己沒有吃的時候,自然不免餓死。在這種形勢之下,誰願意餓死自己,養活別人?

祇顧自己不顧別人的觀念,有時連骨肉也不能顧及。到了荒年,鬻子賣女的事,

我們不是時常聽見嗎?其實這種情形,我們是可以意想得到的。王老五家裏的錢用光了,可以當賣的東西也當賣盡了,八口之家,嗷嗷待哺,怎麽辦呢?王老五於是同他的太太楚囚對泣的商量,最後老夫老婦決定: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將聰明伶俐的幼女雲兒出賣,將所得的代價,養活其餘的七口子,過這個災荒時期。若是雲兒聽見了這個消息,哭哭啼啼的哀求,不肯出賣;再假使王老五夫婦心腸很輭,長嘆一聲作罷,以後這家人的生活,又怎麽樣呢?過了幾天,樓板拆下來賣了;又過幾天,睡的床也揹出去賣了;再過幾天,蓋身的被褥,又細上人家去賣了;全家都弄得精光,無可爲計,只好扶老攜幼,沿門挨戶去討飯。但是大家都遇着荒年,誰有餘力周濟他們?最後,真是到了山窮水盡的絕境,如果再不肯出賣雲兒,那麽只有全家自殺;或是把全家大大小小拴上一條繩子,投河自盡;或是買些砒霜,暗中擱在飯裏,大家吃了數命嗚呼。假使我們的王老五全家採取第一個辦法,結果了全家生命,原因便是因爲他們不肯自私自利,出賣女兒。

假使李老七家裏遇到同樣的厄運,他們硬着心腸,把年輕貌美的媳婦,賣給周

大人做小老婆，得了兩百塊大洋，居然養活了其餘七口子，過了災荒時期，豈不是比王老五老頭子聰明得多嗎？大多數人，都是採取這種辦法，不願學王老五那樣傻頭傻腦。並且再若鬧得沒有法子，就是把一小輩殺了，把他的肉當糧食，也在所不辭。因此，我們得到一個公例，就是：在這種貧困社會裏面，凡自私自利的觀念愈强的，生存的機會愈多。多經一次荒年，多深一分自私自利的心理。

中國社會不但荒年如此貧困，就是平時也不過勉强敷衍度日。凡是能夠羅掘不顧名譽的人，的確要佔一些便宜。所以大家爲預防窮困起見，不能不『見利忘義』。做生意的人，能騙得幾個，便騙幾個。做官的人，一到任便動手搜括。甚至於拉洋車的人，也要敲幾個銅板竹槓。除非真有志氣，真有毅力的人，誰能免除這種劣根性？

全個社會既都充滿了自私自利的心理，那麼當然沒有公德仁俠種種精神，而簡直成了一個『强欺弱，衆暴寡』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裏面，欺善怕惡，趨炎附勢，便是相因而至的兩種墮落心理。凡是可以欺負的便欺負，不能欺負的便逢迎。對於上面有權勢的便誠惶誠恐，對於下面無權勢的便如狼似虎。橫觀中國社會，好像是一

座高塔，上層壓下層，層層相壓，一直到底；落在十八層地獄底下的，便是目不識丁，哀苦無告的善良同胞。軍閥壓官僚，官僚壓劣紳，劣紳壓土豪，土豪壓平民。在同一階級之中，大軍閥壓小軍閥，大官僚壓小官僚，大劣紳壓小劣紳，大土豪壓小土豪，大商壓小商，大農壓小農，大苦力壓小苦力。充國之中，無强有力的公德與法律爲之制裁。誰有勢力，誰佔便宜，誰無勢力，誰該倒霉。大家爲免除比我高者的壓迫，且進一步爲壓迫比我底者起見，於是不能不結納有權有勢的紅人。甲若有權，便去捧甲，雖鑽狗洞，乞哀求憐，肉麻萬分，也所不顧。一旦甲若失勢，則恩斷義絕，不惜投井下石。我們若看透中國官場的黑幕，便可恍然這些所謂高貴闊人，不過是些衣冠禽獸善於趨腥附羶的『勢利狗！』

中國國民心理除了自私自利，欺善怕惡，趨炎附勢外，還有一方面是虛僞，是講面子，是猜疑與陰謀。這些東西，當然是彼此有密切關係的。大家都處在鉤心鬬角，明爭暗奪的空氣裏面，當然是作僞，當然是相互猜疑，更當然是彼此陷害。一個人過於老實，在這種社會裏面，是要吃虧的。

我們中國所賴以維持社會的，不是法律，而是禮教。禮教是注重形式的，一舉一動，尤其是在家庭之間，是有儀節的。當初提倡禮教的時候，或者每種禮儀，其中還有精神爲之內容。到了後來，環境已變，人事已改，實在不能適應社會生活的需要，而我們死命要保守那些繁文節禮，絲毫不變。結果，只有軀殼，沒有精神，所謂禮教，盡是虛僞的東西。出喪本來是一件多麼悲哀的事情，但是我們中國人却要乘這機會，大擺其闊，雇了許多叫化子，鑼鼓喧天的去遊街。心裏並不見得有什麼悲哀，却要假裝大哭大哮，鼻涕與眼淚成沱。女兒出嫁，是多麼一件快樂的事情，却是我們中國的女子，到臨嫁的時候，要假哭一場；若是不會哭的，還得先去學習。夫妻之間，應該如何相親相愛；但是中國的夫妻，不敢在人家面前表示感情，須到自己房間裏面才親熱起來。沒有做到官的時候，不惜用種種卑鄙齷齪的方法去運動；到了得到之後，又要裝腔作勢的一再推辭。本來是戀位不願下臺，但是總要照例稱病辭職。口口聲聲是愛護人民，但是對於搜括地皮，專制橫暴，手下毫不留情。明明心裏不贊成人家的辦法，表面却說毫無異義。這種虛僞心理，世界上再沒有像中國人這麼顯著了。

虛僞的表面是面子。因爲中國人最虛僞，所以最講面子，不講實際。面子問題差不多支配中國人所有的日常行動。我們從請客說起。中國人請客，必須做了許多的菜，務必安擺不下，吃得剩下大半，才足以表示其面子。客人到來，若是主人一不小心，安錯了他的坐位，那麼他便引爲奇辱大恥，認爲沒有給他面子，與你結不解的寃仇。甲乙兩個地方往往因爲一點小事：或是爲爭一棵枯樹，或是爲兩方的小孩吵了一架，兩不相下，面子攸關，而激起械鬥，死了許多人，打了好幾年的官司。一個軍閥或政客被人攻擊下臺，最難解決的，是他下臺的面子問題。有時竟至爲着面子問題，發生國內戰爭，兵連禍結。政治行爲不去實際上做幾件有利於老百姓的事情，却天天只顧大事鋪張，像煞有介事的空口說白話。外國人因爲看透了中國人的面子，所以辦外交的時候，儘管給中國人的面子，而自己却得了許多的實利。中國人所要求的只是名義上的東西，說起來好聽就算了，至於實際與內容往往是不顧的。試舉幾件瑣事爲證。中國菜有時上面做得異常漂亮，但把箸子一翻，底下原來是些白菜或豆腐。房子的外面，好像極其堂皇雄偉，然而一經登堂入室，便是亂七八糟。穿的衣服，裏面

儘管垃圾，但外面非要披一件綢長袍不可。這是中國人衣、食、住、的外面與內面，也可以代表中國社會生活的一斑。

與虛僞心理相緣而生的，便是猜疑與陰謀。因爲中國人大家都是虛僞，各懷鬼胎，自然不能相信他人。人家一開口，兩耳雖然在那裏聽着，腦筋裏却在那裏疑心他有什麼作用，什麼陰謀。若你要發起一個組織，請人家加入，他大概不去認淸組織的宗旨及內容，加以可否，却疑心你發起人是否有別的野心。今天我們可以插血爲盟做同志，明日便可以反目相向做仇人。凡做一件事情，不採取簡直了當光明正大的辦法，而必須在後面繞許多圈子。這種猜疑心理，只要稍爲留心觀察中國社會，便知是很普遍的，並且是由來很悠久的。大概在大家庭裏面，兄弟伯叔之間，用慣了權謀術數，陰險奸詐的手段，所以養成了這種性質。在中國社會上披肝瀝膽的場面，是不容易遇着的；到處都是權謀術數，互相猜疑。因爲事事有陰謀，所以事事不能不猜疑。

這種猜疑心理，有兩種結果：第一因爲不信用人家的緣故，所以會造成任何的結合，不得不引用較可信的親戚或同鄉。因此血統關係與地緣關係，便滲入一切的

結合裏面。從政府的組織，至於工商各界的機關，莫不充滿了這種成分。反過來說，因爲不信用他人，所以對於親戚同鄉以外的人，便加以排擠。到社會上做事，沒有親戚或同鄉的援引，也很孤立的。第二因爲猜疑心重而陰謀又多，所以較大的社會組織，不易成功。縱然暫時結合，也不過是弄權謀的勾當，很少有鞏固的希望。拿政黨來說，其中有不斷分裂的危險。人心如此，國家的團結當然十分困難；政治也只有無目的，無主張，無忌憚，鉤心鬬角，合縱連橫，寡廉鮮恥的一種把戲。

(四) 社會標準

社會必須有秩序，然後才有普遍的進步。人類必須有秩序，然後才有安定的生活。但是社會如何能有秩序，我們便不能不靠社會生活的規則來控制個人的行爲。這些社會生活的規則，便是我此處所說的社會標準。

但是每個社會，都有牠特殊的環境，特殊的文化，特殊的制度，特殊的風尙，以及特殊的歷史，故每個社會都發生一種特殊的行爲標準。甲個社會以爲是的，在乙個

社會未必是甲個社會以爲非的，在乙個社會未必非。甲個社會認爲某種行爲爲善，乙個社會或認爲惡。甲個社會認爲某種對象爲美，乙個社會或認爲醜。卽甲乙兩個社會同認某種行爲爲是，爲善；而所謂是，所謂善，在兩個社會裏面，所佔的地位也有輕重高低之不同。在甲個社會，某種行爲列在所謂好的行爲的首端，在乙個社會或列在末端。因爲每個社會有其特殊的社會標準，所以每個社會對於其分子的行爲之是、非、善、惡、美、醜、有牠自己的態度和制裁。其分子爲博得社會同情，或避免開罪於社會起見，不能不格守這些社會標準：對於社會認爲是的，善的，美的，不能不趨赴；對於社會認爲非的，惡的，醜的，不能不迴避。

我們中國的社會標準，與西洋的社會標準，有許多是不約而同的，有許多是顯然相反的；就是同的方面，也有輕重先後之別。

根本上我們要注意的，便是中國的社會標準，在道德方面，主要的是建築在家庭制度之上，而西洋的社會標準，乃是建築在社會生活之上。假使我們問問西洋人，那些是他們所認爲的高尚美德。他們大概回答我們什麽正義呀，人道呀，眞理呀，愛

國呀，犧牲呀，爲公服務呀等等的東西，決不會想到什麼『孝，』什麼『弟。』但是我們若反過來去問我們卅年前的老同胞，或現在活着的遺老遺少，你們大槪都認『忠』『孝』『節』『義，』或『孝』『弟』『忠』『信』爲最高無上的美德。什麼叫做『忠?』乃是臣對君的關係。什麼叫做『孝?』乃是子對父的關係。什麼叫做『節?』乃是婦對夫的關係。什麼叫做『義?』什麼叫做『信?』大槪是指朋友間應守的關係，充其量也不過是指個人與個人間應有的關係。這些美德，如是分析起來，大多數是建築在家庭的立足點上，沒有一個是直接爲謀社會利益設想的。

我們先拿眞理來說。中國社會並不是完全不要眞理，不過我們認爲沒有『孝』『弟』那麼重要罷了。若是兩者發生衝突，我們情願犧牲前者，保全後者。舉一個最有趣味的例來說，孔老夫子並不是主張要大家說假話的；其實他是一個講誠，講眞理的人。但是遇到『其父攘羊，其子證之』的時候，他老先生便覺得『其父攘羊，』雖是眞理，『其子證之』未免大不『孝』了。以『孝』與眞理比較，在代表宗法社會的孔子看來，孝當然更加重要，其子應該說假話以保全孝道才對。因此，在中國社

會裏面，若是你爲辯護親戚，家族，推而至於朋友，而說假話，作假事，社會上不但不認爲罪惡，並且有時還稱讚你做得很對，很有血性。

西洋人去政府裏面做事，社會上所期望於他的，莫不是爲國家服務；其本人也不能不承認這是他應該遵守的理想標準。若是他違反這個標準，而擅自引用私人，斂括地皮，社會上一經發覺，必羣起非難，認爲罪大惡極，須置之於法。回頭觀察我們中國社會則大不然。中國人去做官，社會上公認其目的乃在『揚名聲，顯父母，』並不是爲國家服什麼務。在利的方面，其動機不過是去找點俸祿，供養父母，至於什麼國家的利益，人民的幸福，這都非做官認爲最高的理想。不但做官者本人自己如此想法，全社會也如此想法。你若爲孝順父母，而犧牲公共利益，社會不但不以爲罪，反以爲德。因此在中國做官，括地皮，用親戚，大家不以爲怪，甚至引以爲榮。普通一般人談到某人做官以後，如何發了大財，用了許多私人，大家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對。怒形於色，憤慨不平的，那是很少。起而作反對運動的，那更不消說絕對沒有。我們的政治，在這種空氣中生長，還有清明的希望嗎？

在風尙方面，西洋人好工作，好活動，好奮鬥，好勇敢，好冒險。我們中國人則反是。我們看不起勞働，以爲勞働是下賤。稍爲有錢的人便雇人做事，自己情願坐着不動。做老太太的，自己順手可以做到的，不願做，偏要呼喚下人從遠處來替他們做。全個社會裏面，無論那個，都是抱着能偷懶便偷懶的宗旨。就是下層的窮苦同胞，我們看見他們如此夙興夜寐，終日工作，以爲他們是勤苦成性的了；其實他們乃是受經濟驅迫，不得不然。假使有一碗飯吃，沒有飲食之憂，他們也是一樣的要鄙棄勞働，好吃懶做。你沒有看見過以前的所謂士大夫階級嗎？他們爲表示其閒暇高貴起見，於是穿着長衫，留着指甲，出必轎馬，把所有體力勞働的工作，都認爲是治於人的階級的事情，自己既爲治人階級，只要勞心便夠了。身體越文弱，手足越不勞働，越可以表示自己的高貴。在女子方面，必須弱不禁風，然後才算是美。這種崇拜文弱之風，當然使全民族的體質不能强健起來，使全民族的精神不能振作起來。

拿好活動與否來說，卽與好工作與否有密切的關係。工作不能不活動，活動也不能不工作。故西洋人既好工作，便自然好活動；既好活動，便自然要工作。我們中國

人既然如上所說不好工作，那麽我們不好活動，便不是意外的事情了。我們若是有閒功夫，我們決計不像西洋人那樣的玩法。他們總不外打球，騎馬，散步，搖船，及跳舞等等的活動。我們呢，那就大不同了。無論外面是如何萬紫千紅，鳥語花香，我們寧願坐在家裏談天，最文雅的也不過是飲酒賦詩罷了。若是多有幾個人，那麽我們便要開一桌麻雀來打。麻雀之所以在我們中國不分大小男女，大受歡迎，充國流行者，也未是不是因爲牠適合中國人脾胃之故。否則，爲什麽西洋人對牠索然無味呢？麻雀曾於數年前在美國大出風頭，曾幾何時，便完全銷聲匿跡。我曾問過美國人爲什麽他們不喜歡玩麻雀，他們回答說美國人好動，沒有心思靜坐在那兒鈎心鬪角。換句話說，他們是不喜歡這種靜的玩意兒。

一個人好活動自然有幹的精神，有幹的精神自然好奮鬪。有人說爭鬪與狂飲是西洋人在野蠻時代的特性，到現在還是他們引爲快樂的東西。因爲他們喜歡爭鬪，所以他們能犧牲一切，爲國家奮鬪，爲情人奮鬪，爲主義奮鬪，爲理想奮鬪，爲其他一切自己所認爲有價値的東西奮鬪。因爲他們喜歡狂醉，所以他們能忘却一切，爲

國家狂醉，爲女人狂醉，爲主義狂醉，爲理想狂醉，爲其他一切自己所認爲可愛的東西狂醉。他們有的是沸騰的熱血，有的是充滿的精力，他們可以爲某對象奮鬬而死，他們可以爲某對象狂醉而亡。在我們冷酷的中國人看來，總覺得他們是傻頭傻腦。我們社會所崇尙的是取巧的方法。什麼以退爲進呀，以柔制剛呀，都是自古以來相傳的金科玉律。我們中國人很少爲任何對象奮鬬，爲任何對象狂醉。不管對象是國家也好，女人也好，主義也好，或理想也好。

最後我們要說的便是勇敢與冒險是互相爲緣的。冒險的人，沒有不勇敢。勇敢的人，沒有不冒險。而勇敢與冒險，又多半是好活動好奮鬬的人所必具的精神。我們中國向來不尊崇勇敢的，以勇爲武夫的特質更不贊成冒險，故曰『明哲保身』，『君子不立於危牆之下』。因此我們看見外國人的餐風宿露，冒盡危險，去周遊世界，探險兩極，而無絲毫實利之舉動，簡真莫明其妙認爲『其愚不可及也。』我們每家人家，父之教其子，兄之訓其弟，莫不戒子弟勿去冒險。愈是有錢的人家，愈是拘束他的子弟，自小就不讓其出外遊玩，一天到晚關在家裏，好像寶貝一樣。所以到了大來，都

是懦夫。『蓋井而觀，腰舟而渡，』這的確是我們中國人的精神。不要說別的，單拏我們中國人對於運動一事，便可見一斑。一般老先生們看見西洋人那種劇烈運動的方法，手打足踢，頭頂胸撞的玩球，真是覺得危險。若是他們有少爺在學校裏面讀書，當然是要阻止他們加入運動的。

（五）階級背景

中國社會固有的階級，大家都知道是士、農、工、商；但是大家所容易忽略的是：士是支配階級，而農工商是生產階級。

根據中國以前的教育制度，讀書的目的，便是做官。但是做官的人，必須讀書。故士的階級，卽支配階級。得志的人，固可做到顯官達宦，威赫一時；不得志的『士』也可退爲鄉紳，名重鄉曲。總而言之，讀書人是中國社會生活各方面的領袖，連梁山泊的『反叛』行爲，也不能不用智多星吳用爲之計畫。

讀書的目的在做官，做官的目的在發財。故升官發財，在中國社會裏面是一而

二，二而一的。攬着主權的皇帝，有如一個大房東，人民有如房客，官僚有如房屋的管理人。房屋的管理人，向來就不料理房子的修繕，如水溝水道等等，而只打算儘量的搾取房租。他們不僅剝削房客，並且百方欺騙房東。蔽上欺下，把人民的膏血，一點一滴的搾入自己的腰包。

生產階級，是中國社會的柱石，包含從事於經濟事業的一切人民。這個階級，乃真正努力於耕種，製造，及交易的，與支配階級立在敵對的關係上面。支配階級，是寄生於這個階級之上的。生產階級增多，支配階級廉明，則中國社會才能安定；否則，便要大亂。

現在將生產階級分爲農、工、商三個階級來說。

中國是農業社會，所以百分之八十五以上是農民。他們在全民中雖然是佔大多數，但是因爲沒有智識，沒有團結，及經濟力貧弱的關係，並沒有什麽勢力，在社會上是最被搾取的階級。他們在政治上，社會上沒有什麽要求，更沒有什麽運動。他們把一切都看作天命，任憑其他階級搾取。他們過慣了被壓迫的生活，對於專制政治，

絲毫不加以反抗。時常發生旱災、水災，蝗災、他們都委之於運命，不去講求補救的方法。若是實在不能過活，他們便流入遊民階級，或做兵，或做土匪，或做乞丐。

農民之中，有田主，有自耕農，有佃戶，有雇傭勞働者。純粹的田主階級是很少的。田主多半是退職的官僚，或地方的鄉紳，平時只把田土分租與佃戶，或任長工耕種，到收穫的時候才去管理收租。自耕農佔農民之主要部分，富足一點的除自己所能耕種的面積外，有時把田分租與他人，或請別人幫忙。貧農則有時兼為佃戶或雇傭勞働者。至於佃戶，比較自耕農來得很少。其貸借田地的方法，或用租金，或是分租。所謂分租，卽每年的收穫，以一定的比例，分配於地主與佃戶兩方面。佃戶與地主之間，除此田地的貸借關係外，沒有別的主從義務，所以兩方面不感覺到什麼階級意識。

我們中國地主多雇用勞働者自行耕種。雇傭勞働者有的是長工，有的是月工，有的是短工，有的是包工。長工是長年服務的，工資以一年計算，每年年底改訂契約一次，吃飯與居住概由主人供給，與主人成立主從的關係。若得主人信任，有時升做工頭，代主人監督其餘的雇傭勞働者。至於月工，短工，包工，則係臨時雇用。月工當然

是以一月爲標準，短工多以一日爲標準，包工則以工作爲標準。

從大體看來，過去的農民，自己內部的爭鬬，比較不很顯著；而與其他搾取階級的爭鬬事實，倒屢見不鮮。所謂其他搾取階級，第一爲官僚和軍閥，第二爲土豪和劣紳。農民反抗他們的方法，因爲專制政治逼得他們無路可走，多採取直接行動。或投入土匪，對官僚軍閥，土豪劣紳報仇；或舉行暴動，壓迫官廳，取消種種苛政。

工人階級有新式的工廠工人，有舊式的家庭手工業工人。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中國問題的社會背景，目的在分析中國沒有與西洋文明接觸以前的社會情形。所以這裏我們所要說的，單是家庭手工業所形成的工人階級。這種手工業之內，也可分爲三個階級：即是行主，工匠，學徒。行主是經營者，工匠是職工，學徒又叫做徒弟。職工是有工銀的，徒弟是無工銀的，但吃飯住居都是由行主供給。行主，職工，徒弟三個階級間的關係，是非常親密的，因爲彼此多有親戚朋友的關係。

最後說到商人階級，其中也如工人階級一樣，可分爲掌櫃（南方稱老板，）夥計，及學徒三個階級。掌櫃是店主，夥計是職員，學徒是徒弟。徒弟多半是店主的親屬

或同鄉，沒有薪水，但是有飯吃，有房住；學習的期限，少則二三年，多則四五年，出師之後，即升入夥計階級，可得工資，或留店內，或轉入他店。夥計之有才幹的，幫人家做了幾年以後，多半自己另外去開舖子，跳入店主階級。因爲店主，夥計，學徒之間，不是有血統的關係，便是有同鄉的關係，而彼此又天天見面，相處甚久，所以很少有階級的對峙形勢。

（六） 教育制度

我們要知道現在中國教育制度所發生的各種問題，便須知道我們以前的教育制度是怎麼一回事情。我們以前的教育制度雖然已經廢除，但是牠的靈魂還寄託在現在各種制度思想裏面。

第一，我們知道以前的教育，不是國家的事業，乃是私人的事情。我們以前沒有學校，只有私塾。每個私塾，有一個老師，和幾個至十幾個學生。有的私塾，是一家設立的，有的是幾家合起來辦的。這些有子弟讀書的人家，多半是有飯吃的。很窮的人家，

不但沒有錢送子弟入學，並且還要留子弟在家裏做事。所以中國以前能受教育的佔最少數。這班讀過書的人，因爲自己家裏經濟狀況本來不壞，而且又只有讀書人才能做官，於是在社會上便形成了一種特殊階級。

第二，我們要知道我們傳統教育的內容。換句話說，我們要問我們的私塾裏面教些什麼？在西洋社會裏面，教育的目的是影響將來的，是決定進步的。但在我們以前的中國，則大家認爲教育完全是保存國粹的。因此我們以前讀的都是四書五經，聽的都是『古先聖王之道，』至於什麼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化學、生物、各種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都夢想不到。一班讀書人只知道背誦這些古書，做幾句爛文章，把所有的精力都費在這些古董上面，而變成保守反動的骨幹。凡有新思想新勢力的萌芽，他們便要加以摧殘。支配階級如此冥頑不靈，社會那有進步？

第三，我們要問：我們以前的教育，既然是私人的事情，那麼究竟與國家是否發生關係？我們的答案，是有密切的關係。各代君主，因爲要鞏固他們的天下，於是利用孔子的學說，來範圍人心，把四書五經做爲科舉取士的標準。全國各地有秀才考試；

考取秀才以後，才有考舉人的資格；中了舉人，才能考進士；考中進士，便有官做。凡是要做官的，不能不從事科舉；要從事科舉的，不能不知道四書五經；要知道四書五經的，不能不讀書。讀書的目的，只爲做官。做不到官的時候，才去教私塾。私塾所教的，又不外四書五經。教出的學生，又不外從事科舉。得意的便去做官，失意的又來教私塾。轉來轉去，沒有新東西出來，直是一種『輪迴教育』在君主方面，這是一種最有效的愚民政策，要一班支配階級，以孔子的思想爲思想，尊君法古；並且使他們一生葬送精力在玩弄這些古董上面，沒有功夫去懷疑他的統治勢力。在政治方面，有了這班冬烘先生，一切設施，當然不外循規蹈矩，尊古法制。凡社會生活的變遷，與政治的運用，都非他們所能想及。結果，所謂政治，不過是做官的代名詞。

西洋社會到了近代，教育是國家的事業，也是國民應盡的義務；反過來說，也可說是國民應享的權利。所以他們由國家設立學校，並且强迫每個國民要受若干年限的義務教育。在學校裏面所授的科目，除本國文及外國文外，都是社會科學或自然科學。思想異常自由，沒有那些『古先聖王之道』把他們腦筋桎梏。學生畢業以

後，各人就自己性情所近，把平常所學的東西，拿去社會上做事情，不一定要去做官。因此，第一，西洋先進各國，教育異常普遍，人人都當作家常便飯，讀書的人不能在社會上形成一種特殊階級。第二，學校裏面所教的東西，都是與社會生活有密切關係，故學能致用。第三，思想自由，注重創造，不像我們要尊崇孔子，罷黜百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故他們無論在文學，科學，藝術各方面，都有日新月異的進步與貢獻。第四，他們讀書不是爲着做官，乃是求適應社會生活，並謀改進將來的生活，在社會上不因爲讀了幾句書便取得一種優越的地位。比較起來，我們的傳統教育是保守的，特殊的；西洋的教育，是進步的，普遍的。

（七）語言文字

語言文字是傳達思想的工具。沒有語言，我們彼此便不能交換意見，所有個人的經驗與智識，也不能傳給別人。沒有文字，則在空間方面，不能行遠，只能在面談的時候交換意見；在時間方面，不能持久，談過之後，沒有文字記下來，一切都無踪跡。並

且思想經過文字的敍述，比語言更有系統，更爲確切。故語言文字對於文明的構造與傳布，對於社會生活的團結與改進，對於國家意識的養成與發展，是最有關係的。

我們中國的文字發生極早，並且向來我們對於文字是很重視的。論理我們的文字與文學，應該最進步的了。不幸得很，我們的文字，第一，沒有字母，沒有拚音，沒有文法。每個字有多個音，每個字有多個意義。學作文的時候，沒有規矩可循，全靠把古書的調法背熟，得到其中的自然法則。因此，我們的文字極爲艱難，平常的人，要讀十幾年書才能作一篇通順的文章；若是腦筋笨的，一輩子也不會作文。我們的文字既如是艱難，那麼爲什麼不早改良呢？這又要怪我們社會的保守觀念，以及一班儒者的好古成性了。

我們以前的社會對於文字的認識，以爲愈古愈好，要古得像尙書一般的筆墨，爲普通人所看不懂，才算本事。所以我們以前作文，總要做得佶屈聱牙，直追秦漢以前。我們不知道文字是傳達思想的工具，我們反以爲文字是有閑階級的裝飾品，故意使人家莫名其妙。因此我們中國的文字，到現在還是異常困難。普通一般人看見

文字這樣的艱難，謀自家生活之不暇，又那裏能夠費十幾年功夫去學做幾句文章。就是有錢人家的子弟，也有許多受不了這種『十年寒窗，磨穿鐵硯』的苦事，寧願目不識丁，或讀得半通不通。結果，中國患文盲病的佔百分之九十以上。普通一般人民，既不識字，沒有受過相當的教育，那麼他們對於社會，當然不能有很多的貢獻，只知奉行故事，及吃飯穿衣而已。如是影響到政治上去，便是國家觀念與民主政治不能產生；影響到文化上去，便是新的創造與新的貢獻不能出現；影響到全社會上去，便是沒有進步。

在他方面，因爲文字的艱難，所以能夠弄文字的讀書人，便形成了中國的特殊階級。他們能夠看得書，作得文，不但自己以爲了不得，就是普通一般人也以爲了不得。兼之，我們以前用科舉取士，做官的人非讀書出身不可，於是士的階級，更爲社會所重視。

我們中國的文字，不但艱難，而且變爲傳統思想的專利品。一班文人，以前都有一個共同概念，以爲文是『載道』用的。而所謂『道，』又是『古先聖王之道，』兩

千年來，說來說去，還不過是千篇一律的東西。因此文字的功用，非常狹隘；文字的內容，非常枯槁；個人的思想，不能自由發展；個人的經驗，不能自由傳播。如此，文化沒有新的色彩，社會那有新的進步？而且一成不變的道學，當然不能適應社會生活的演變，結果所謂『古先聖王之道，』不得不變成虛僞的東西。全個社會於是便發生了虛僞的心理，而趨於墮落腐敗。

關於文字，還有一點不能不提到的，便是我們的言文不符。語言與文字兩相分開，說的不同寫的，寫的不同說的。在語言方面，失却文字的幫助，運用異常簡狹。平常的語言，很難談高深的思想。普通一般人所說的，不過飲食起居的幾句話罷了。在文字方面，失卻語言的幫助，內容異常枯竭。寫出來的，都是陳詞爛調，不能代表活的生活，結果成爲一種死的文學。

我們中國的語言，不但與文字不符，並且因爲交通不便的關係，各地不同，各省有各省的話，各縣有各縣的話，各鄉有各鄉的話，甚至『一山一河之隔，而語言若兩國焉。』我們知道語言是團結一個國家或社會最重要的工具，因爲有了這種工具，

我們才能夠了解共同的利害榮辱，發生一種同情共鳴的觀念。一個國家，沒有統一的語言，便失卻一個最重要的基礎。我們中國的語言既然如此不統一，那麽全國意志，難於勾通，也是自然的結果。

（八）結論

概括來說：

（一）我們的家庭制度，養成了根深蒂固的家庭觀念，阻礙了國家觀念的形成，經濟的發展，及社會公德的產生。全個社會有如散沙一般。所謂散沙，卽是全國分成無數一個一個的家庭，上面很難養成超家庭的大團體生活。

（二）我們的地方主義因爲有農業的背景及血統的關係，極爲强烈。地方觀念愈重，則國家與社會的觀念愈弱，結果各地方各自爲政，漠不相關。

（三）一般國民心理都是充滿自私自利，欺善怕惡，趨炎附勢，虛僞，猜疑，陰謀等等。中國社會在此種空氣之下，當然很難產生高尙的公德，努力合作改進

公共生活。結果社會只有腐敗，政治只有黑暗，大家只有在地獄裏過活。

(四)因爲中國社會標準，在道德生活方面，多建築在家庭之上，所以公德心不能發達。而且普通一般的風尙，都崇尙文弱，賤視勞働，好靜惡動，所以沒有進取的精神與勇氣。

(五)以前中國社會可分兩個階級，即讀書人的支配階級，及農工商的生產階級，前者以搾取爲目的，後者只有供前者的剝削。

(六)中國以前的教育是君主一種愚民政策，以孔子的學說爲鞏固君權的工具，以科舉的手段來籠絡民間的人才，在社會上造成了讀書人的特殊階級，而爲保守反動的骨幹。

(七)文字艱深，言文不符，語言又不統一，使教育不能普及，人民程度不能提高，國家意識不能養成。

歸根到底，上面所說社會的背景，不外使我們中國人有家庭觀念，地方觀念，利己觀念，而無國家觀念，社會觀念；中國只能保守，而無進步。

第三章 中國問題的思想背景

我預先要聲明的，便是我在這裏討論中國的哲學背景，目的並不是去分析中國所有思想家的思想也不是去考證各家思想的內容；換句話說，我不是要寫一篇『中國哲學史』或『中國各派哲學的研究。』我的目的乃在提綱振領，把支配中國人的精神生活的幾個重要哲學或宗教系統提出來，說明其對於全個中國社會所發生的影響，及其形成今日中國問題的原因。明瞭我這個主旨，便知道我不是專為中國哲學而來討論哲學，乃是為研究中國問題而來討論哲學；並且可原諒我下面那種大刀闊斧的新寫法，是我偏重解釋所不得已而取的一種態度。

我們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大概言之，可說是為三個重要哲學或宗教系統所支配：一是儒教，二是道教，三是佛教。其中尤以儒教為最佔勢力，為中國的正統派思想，籠罩中國社會有二千多年，對於我們一切的文物制度，實在有分不開的關係。其他

各種學說如墨家，如法家，雖在發生的時候，有相當的影響，但後來因為歷代尊孔的結果，都被排斥，在中國社會生活裏面，沒有多大的勢力。

最奇怪的就是中國各派哲學的發軔，除後來從印度流入的佛教外，都在春秋戰國時候。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我們中國社會到了周朝下期的時候，因爲封建制度的崩潰，君主的昏庸，於是全個社會發生了一種極大的紛亂。周室的勢力日益衰微，諸侯的專橫更加厲害，各個諸侯對於周室，由臣從的關係，漸到獨立的地位；由獨立的地位，漸到爭霸的局面；更由爭霸的局面，漸到吞併的形勢。所謂統有中國的周室，失卻了所有的權威。全個社會，無所維繫，於是四分五裂，戰亂不已。人民的痛苦，如水益深，如火益熱。社會上的固有制度，也根本發生動搖。這種紛亂情形，好像現在的中國一樣。現在的軍閥，好像就是以前的諸侯；現在的爭地盤戰爭，好像就是以前的爭霸戰爭。處在這種亂世的人，自然不免要受很大的刺激。一般有思想，有感覺的人，看見四圍如此黑暗，當然不能滿意，要去找出解決的方法。但是因爲各人的經驗與環境不同，所以各人對於解決的方法，與夫對於現狀的觀察，也不能不隨之而異。於

是而有種種學說發生，與現在有種種主義發生一樣。儒家道家墨家及法家等等哲學，便從這種環境裏面產生出來。

（一）儒教

儒教的宗主當然是孔子。所以我們討論儒教的影響，不能不以孔子的思想爲中心。孔子看見當時這種大亂情形，回想到以前封建社會的安寧，便發生一種反動心理，以爲當時一切的紛亂，都是由於不『遵古法制；』若能返於『古先聖王之道』，那麽便不愁天下不太平。所以他對於當時社會的解決，第一個主張便是復古。他一生最得意的工作也就是宣傳古的制度，如世人所說刪詩書，定禮樂，贊易，修春秋之類。惟其因爲他是保守的緣故，所以他沒有什麽創造，也不願意有什麽創造。『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那才是『夫子自道』的眞正態度的的確確，他一心一意想把他那時紛亂的社會，退回到以前那種封建社會裏面去。他並沒有想到若干年代以後的社會，與若干年代以前的社會，有許多地方不同。其所以中國社會到了春秋時候大

亂起來，也就是因爲以前那種簡單的社會組織，不能適應當時比較複雜的社會生活。中國當時在此十字路頭，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是順應社會生活日趨複雜的需要，去創造新的制度，理想，及組織，使社會能向前推進，不至爲過去的傳統文明所阻礙。一是認爲一切紛亂，都是起於舊的文物制度的崩潰；若是拋棄舊的，而另去創造新的，恐怕紛亂更加厲害；不如恢復舊的，使社會退回到原來有秩序的狀態裏面去爲好。孔子便是採取第二條路，反對第一條路最有力的人。這種復古的保守主義，因爲自漢以後，歷代尊孔的結果，在中國社會便發生了一種牢不可破的守舊心理。一般人民都不用腦筋去改良舊的東西，發明新的理想，制度，及方法。所以社會生活，無論那方面，經過兩千多年，沒有多大進步。講思想，我們仍不能不推重春秋戰國時代的諸子百家。講物質生活，我們仍不脫簡單粗陋的農業生產。

而且孔子所夢想的以前那種社會，乃是建築在封建制度之上的；而那種封建制度又是顯然以家庭爲基礎的。所以孔子的政治理想及倫理觀念，總脫離不了家庭制度的範圍。從他的眼光看來，國家不過是擴大的家庭，家庭也是縮小的國家。在

國家裏面，君主好比是父母；在家庭裏面，父母好比是君主。若要治國，必先齊家。怎樣齊家？必須把家庭所包括的父子，兄弟，夫婦三種成分的關係劃定。所以儒家不能不拿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順』的倫理來做齊家的基礎，其中尤重『孝，』次重『弟，』因爲兩者都是維持家庭的根本。故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爲人之本與』。國家既然是家庭的擴大，那麼加上『君臣，朋友』的倫理關係，便足夠了。所以儒家的倫理系統，卽是『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的『五倫。』這『五倫』乃是從家庭出發，所以儒家的道德觀念，也是以家庭爲起點；儒家的社會組織與政治思想，也是以家庭爲模型。簡而言之，家族主義，便是儒家澈上澈下的哲學。

在家庭裏面，兒女要孝順父母；在國家裏面，人民要服從君主。所以孔子及儒家們從家長式的政治理想出發，便不能不走到主張君主政體的路上去；既然主張君主專制政體，那麼當然要把全國的領土主權，及人民，都看做君主的私產。所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也是儒家一種很合邏輯的推論。但是我們要知道，在家庭裏面，父親雖然有最高的權威，決定一切，然而父親對於兒女，非常愛

重，對於兒女的幸福，非常留心。推而至於一國，孔子以爲君主既然是全國的家長，『民之父母，』那麼他對於人民也應如父母待子女一樣，爲他們謀幸福。因此，孔子的君主專制政體，不是殘暴的，乃是仁愛的。換句話說，儒家的政治思想雖是反民主的，但是以人民的幸福爲根本的。可以說是一種民本主義，而不是民主主義。民本主義乃是主張政治爲人民所享的。民主主義不但主張政治是爲人民所享的，並且是爲人民所有，爲人民所治的。孔子及儒家們雖然贊成政治爲人民所享，卻不贊成政治爲人民所有，爲人民所治。

孔子們因爲反對民主政治。所以不惜一則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再則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三則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據他們的意思是：君主固然要以爲人民謀幸福爲目的；但人民對於政治不能過問，不宜過問，也可不必過問。這種擁護君主政體的學說，自然於君主有利。所以漢高祖在沒有得到天下的時候，便不惜把『儒冠』來權當小便之用，及既得天下之後，爲鞏固江山起見，便罷黜百家，尊崇孔子。自漢以後，歷代帝王，看破此中祕訣，無不利用孔子的學說，做他們

把持天下，維持君權，壓制人民的工具。孔子自己並不想做一個教主，孔子的學說也並不是一種宗教；但是歷代的君主硬要把孔子學說當做國教，把孔子當做教主。後來更有一班所謂儒者，趨炎附勢，極力在下擁護，搖旗吶喊，推波助瀾，希望取得君主的歡心，而為獵官發財的企圖。故『陳涉起而孔鮒往，劉季興而叔孫從，恭順有加，强聒不捨，捷足先得。』嗚呼！這是所謂儒者的人格！嗚呼！這是所謂儒者的精神！把其餘的學說視爲異端，排擠壓迫不餘遺力，結果，第一思想不自由，學術無進步，鬧來鬧去，還是『學而』『子曰』的陳腐東西，全個社會死氣沉沉，停着不進。第二，這種孔教思想，把中國桎梏在君主專制政體之下兩千多年，全國的治亂完全操在君主手裏，人民無權過問。若是『聖主在位，』人民還可『仰沾雨露之恩；』若是昏君出世，那麼人民只有忍受一切壓迫痛苦！第三，一班士大夫，以孔子的思想爲思想，沒有獨立的人格，成爲一種腐儒，專以逢迎君主爲能事。結果社會上也成了一種趨炎附勢的風氣；政治上成了一種家奴走狗的政府。公德墮落的影響，人格卑鄙的結果，這我們不能不歸功於所謂儒者！

儒家們既然反對民主主義，當然不會主張君主須向人民負責。在他們眼光裏看來，人民不過是些阿斗，須『作之君，作之師』。但是誰去『作之君，作之師』呢？他們於是推到天上去，說『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所以他們的君主專制政治是只對天負責的，不對人民負責的。故君主又名爲天子。猶之家長只對祖先負責，不對子女負責一樣：但是天是啞口無言的東西，所謂君主對天負責，也不過是『神道設教』的意思。結果，老老實實，君主是不對任何個人或機關負責的。不但一國的土地是君主的家產，就是全國的人民也是君主的家奴。在這種君主專制政體之下，人民當然沒有參政的權利。人民沒有參政的機會，又那能得到參政的能力？所以我們雖把滿清的大皇帝推倒，建立了所謂『民國』，但是全國的政權，還是在新皇帝們的手裏。他們中了專制政體的遺毒，同時又失去爲民父母的倫理觀念，於是變本加厲，橫暴愈甚，對於人民壓迫蹂躪，無所不至。一般人民過慣了家奴走狗的生活，沒有政治的能力，也不起來反抗，也不知道如何反抗，於是釀成了二十餘年來的怪現象！

孔子的君主專制政體，不但如上所說阻礙了民主政治的發展，並且阻礙了國

家觀念的產生。人民既無參政的機會，那麽對於國家的事情，當然以爲這是皇帝老子家裏的事，與小百姓毫不相干。無論是外人的侵略，無論是政權的交替，無論是官吏的腐敗，無論是鄰省的災荒，一般人民總是不聞不問，除了自家能活一天算一天外，別的事情都不去管。如是一般人民對於國家，不但不發生感情，並且根本上就不認識牠的存在。兼之有了孔子及儒家們的家族主義，一般人民可以生活在家庭『小天地』裏面，不需要較大的社會組織，所以我們中國人只知道有家而不知道有國。無怪我們中國與西洋各國一相接觸，我們只有土崩瓦解。

儒家既把國家當做一個大家庭，那麽他們對於治國的方法自然也與治家一樣。我們知道在家庭裏面，彼此間的關係完全建築在血統之上，而且人數不多，用不着什麽法律，只要有賢父兄在上，有感情爲之維繫，有禮教爲之標準也就夠了。所以儒家主張，國家生活也應採人治主義，不宜用法治主義。他們認爲如果有聖君賢相在上，天下自然會太平安樂。所謂『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君子篤恭而天下平，』『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這些這些，都

是儒家信仰人治的表證。

主張人治，當然指望賢人在位，以身作則，故儒家提倡人治主義之後，不能不主張賢人政治。我們可以從他們的書中找出許多類似下面的話頭：如『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則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悖。』『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儒家既是主張人治，而又擁護君主政體；而政治命脈，在他們的眼光看來，差不多完全繫於君主一人之身。故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惟其因爲主張人治主義，所以必須『待其人而後行；』惟其因爲相信賢人政治，所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者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

我們中國因爲受了儒家這種人治主義的影響，兩千餘年以來都排斥法治。凡個人與個人間，個人與國家間，個人與團體間，團體與團體間，團體與國家間，以及全

個國家的根本組織，都沒有明文規定的法律關係。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社會生活都在糊塗不安定之中。人治的辦法，根本上就不是長治久安之計，勢必『人存政舉，人亡政息。』若是遇到聖君賢相，天下還可太平；若是遇到昏君奸臣，天下只有大亂。難怪尹文子要說：『若使遭賢則治，遭愚則亂，則治亂續於賢愚，不係於禮樂。是聖人之術，與聖主而俱沒；治世之法，逮易世而莫用，則亂多而治寡……』更無怪韓非子要說：『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者亦不爲桀紂。抱法則治，背法則亂。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誠然，我們中國過去幾千年的政治，都是『背法而待堯舜，』故『亂多而治寡。』上面無法可守，下面無法可循，一般人民到了忍無可忍的時候，只有訴諸武力，大家砍殺一場。

但是人治也不能不有相當的規範，做行爲的標準，所以孔子及儒家們，打出人治旗幟及反對法治主義以後，不能不提出各種生活的規矩出來，以爲表率。尤其是因爲儒家的政治理想，完全建築在家庭制度之上，對於家庭生活，不能不有極詳細

的方式。他們相信，若是大家能本着自己的良心，照這種規矩或方式做去，社會秩序自然可以維持。這種規矩或方式，既不是國家的法律，當然只有靠養成一種風俗習慣，使大家去服從。一經成爲風俗習慣之後，這些私人所定的規矩或方式，便成硬化，後來統名之曰禮教。

禮教與法律都是行爲的規則，但是有幾個根本不同之點。第一，禮教的來源是私人的言行，經風俗習慣凝結而成。周公可以制禮作樂；孔子也可以定禮樂；法律乃是由政府機關所制定。第二，禮教沒有强制執行的機關，全靠社會輿論發生功用，願守此禮與否，儘可隨人自由。法律則有法庭執行，違者便要受罰。第三，禮教的性質空泛，不但沒有嚴密的規定，而且沒有解釋的機關，各人可以隨便運用。法律則明文具在，一定不移，不能通融，若有疑義，法庭可以解釋。第四，禮教與道德不分，凡是違反禮教，便是不道德的行爲。法律則與道德純爲二事：犯了法，不一定就是不道德；不犯法，不一定就是道德。

若就禮治與法治兩者的利弊比較，我們可以得到下列幾個結論：（一）法律

是維新的，禮教是守舊的。因爲法律可以視環境的需要，隨時修訂；禮教則基於風俗習慣，積重難返，很難適應社會生活的演進。（二）法律可以適合現代社會各種複雜的關係。因爲有淸淸楚楚明文的規定，並且有法庭在那裏監督執行，不至使各方面的生活感覺不安定，而阻礙了各種事業的發展。禮教則全靠各人自己的解釋，沒有固定的標準。以之適應簡單的社會生活，弊端還少；以之適應雜複的社會生活，則爲害甚大。（三）法律與道德分家，使道德本身、不至因爲所管轄的範圍太大，倒失卻了牠的作用，而變成虛僞的東西。禮教偏要把道德拉做一塊，靠道德的力量，去實行牠的制裁。但是社會生活日益複雜，有許多問題完全與道德無關，而强以道德去拘束，結果所謂禮教，所謂道德，都成了虛僞的東西。這種虛僞心理，布滿了中國的全個社會而不可救藥。我們並不是說禮教完全沒有益處；在私人行爲相當的範圍以內，我們承認禮教是有功用的。不過像儒家那樣絕對反對法治，相信禮治，那是有害無益的。中國社會所以兩千多年沒有進步，到處充滿了守舊與虛僞的心理，我們不能不歸罪於孔子，尤其是後來這班靠孔子吃飯，搖旗吶喊的儒教徒。有人說：『禮教

吃人』更有人要『打孔家店，』我們實在可以原諒這種糾正的用心。

禮治是有等差的，有階級的。等差不謹，階級不嚴，禮防是要崩潰的。所以孔子及儒家們主張禮治之後，自然要主張階級等差，於是乎有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大學裏面所舉『止於至善』的方法，也是『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禮記一部書，差不多完全是關於等級的劃分。至於易傳所言貴賤男女等等，春秋所言貴賤親疏賢愚等等，眞是舉不勝舉。分析起來，儒家主張，縱的方面，有貴賤的階級，如君臣尊卑之屬；橫的方面，有親疏的階級，如『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之屬；性的方面，有男女的階級，如夫婦不平等之屬。因此儒家的社會是有等差的，有階級的。有了等差，階級，當然又不是平等的社會。我們中國社會，因爲農業的經濟背景，雖然沒有勞資兩個階級的對峙，但是因爲受了儒教的影響，社會上也有許多階級的差別。這種差別，一方面給已在上的人極大的自由，一方面使得在下的一點不能自由。所謂『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便是一個很好的

例證。流弊所及，中國便成了最自由與最不自由的大矛盾。在上的最自由，在下的最不自由；有權的最自由，無權的最不自由。

儒家既然要分別等差，那麼當然要注重分別等差以後，彼此相互的關係，使這些關係不至於紊亂。但是如何嚴密規定這些關係，使他們不亂？『必也正名乎！』所以子路問孔子：『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的答覆是：『必也正名乎！』子路覺得很奇怪，爲什麼爲政要『正名』，故譏笑孔子說：『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孔老夫子聽見子路駡他『迂』，不覺怒從心來，便回敬子路一個『野』字，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孔子正名的工作，在春秋。故莊子曰『春秋以道名分。』董子曰，『春秋辨物之理，以正其名；名物如其真，不失秋毫之末。』司馬遷曰：『春秋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聚散，皆在春秋。』孟子曰：『春秋天下之事也；』又曰：『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所謂『名分，』便是社會上的等差關係，

所謂『不失秋毫，』便是所定等差關係的嚴密。所謂『萬物聚散，皆在春秋，』便是春秋所包含的關係極廣，無所不包。所謂『亂臣賊子懼，』便是嚴定等差關係所發生的效果。

但是名正了，名分也定了；名分定了，等差關係也定了。於是禮防成了，禮教也成了。可是社會生活因此受牠嚴密的約束，不能活動了，不能隨時改變以適應新的環境了。中國社會的生命永遠被這種深厚的禮防城牆圍着，好像一座古井裏面的水一樣，不能流動，沒有變化，結果是無進步，無色彩。

總而言之，孔子及儒家們主張了復古的保守主義，便妨礙了中國社會的進步；主張了開明的君主專制，便妨礙了民主政治的發展；主張了家族主義，便妨礙了國家觀念的養成；主張了人治主義，便妨礙了法治主義的實現；主張了禮教，便養成了虛僞的心理及社會上不平等的關係。在春秋的末葉，孔子主張這些東西，或還不無理由可說。所可怪者，就是後來的儒者們，不用腦筋，專知逢迎君主的好惡，『孔步亦步，孔趨亦趨，』『見孔於羹，見孔於牆，』像煞什麼似的趨腥附羶，把其餘的學說一

概抹殺，把社會演進的事實當做不見，而一味把孔子捧作神化的偶像，把孔子的思想桎梏全國人的腦筋。中國的思想真是統一了，孔子的思想的確傳統了，卻是中國由此便沒有長進了！

（二）道家

我們中國的正統哲學，既如上面所述，籠罩了中國的制度文物，產生了許多不良的結果，那麼其次有力的哲學系統能出來糾正一點嗎？不但不能，並且對於中國社會的進步，更有妨礙。我們知道儒家無論如何復古守舊，還相信人爲的力量，認人可以改造社會；全個思想系統還是建築在以人爲中心的基礎上面。所以孔子孟子本人也不辭勞苦，去周遊列國，勸解那班當局的人。至於老子，則感想剛與孔子相反。他遇着亂世，看見當時政治的黑暗紛亂，一班亂臣賊子的爭權奪利，打成黑漆一團，好像亂絲一般愈理愈亂，於是根本上主張大家不要去爭，去理，去治。因此，老子根本上就否認人爲的力量，相信自然界法則爲萬能，以『道』爲先天而存在；且一成不

變。故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因爲『道』是先人類而存在，並且先天地而存在，故『道』是離人類社會而獨立，永遠不能更改的。根據這種觀點，『自然』變成了『萬能，』人力當然是毫無力量的了。我們人類生在天地之間，照老莊看來，異常渺小；我們只能順着自然，決不能有所創造，也決不能改變環境。故莊子說：『吾在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又說：『以輔萬物之自然，而莫敢爲。』

道家這種『自然萬能』的主張，既然否認人爲的能力，便在中國社會上產生了一種運命主義。一般人民以爲一切都有天命，一切都有外界的主宰，非人類所得而改變，於是覺得努力是毫無影響的。自然界能支配人類，人類決不能征服自然界。水災儘管一次一次的降臨，我們的祖先總以爲是天道如此，不去設法預防，旱災儘管不時的發生，我們的祖先又總以爲是出於天意，不去講究灌漑的方法。自己窮得吃樹皮草根，還是以爲前生注定。統治階級壓搾他不能翻身，他口裏還說『死生有

命，富貴在天。』這種消極的態度，不但對自然環境只有屈服，就是對社會環境也只有屈服。因此我們中國人的人生觀，變成消極的，順從的，頹唐的，懶惰的。我們沒有前進，反抗，振作，奮鬥，各種精神。我們願意做自然環境的奴隸，我們也願意做社會環境的奴隸。交通不方便，讓牠過去。經濟不充裕，讓牠過去。政府極腐敗，讓牠過去。活得一天算一天，『做一日和尙撞一日鐘，』大家如此，人人如此，這種社會當然是沒長進。

道家不但相信『自然萬能，』並且積極的相信自然爲絕對的美，絕對的善；一經加上人工，便要壞了。所以老子說：『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莊子怕世人不懂，還打了一個譬喻說：『南海之帝爲儵，北海之帝爲忽，中央之帝爲混沌。儵與忽時相遇於混沌之地，混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混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混沌死。』因爲道家認自然爲絕對的美，絕對的善，故主張無爲，一切任其自然。這種無爲主義，當然是與政治這個東西根本不相容的。政治的目的在治，在干涉。無爲的主張在不干涉。比較起來，儒家還是要政治，並且還是要以家庭爲模型的君主專制政體；道家就根本上反對政治，反對一切政治組織，反

對任何式樣的政府，自然連孔子的君主政體也包括在內。換句話說，道家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他們覺得政府是罪惡，政府的勢力與人民的幸福成反比例：政府的勢力愈大，人民的幸福愈少；法律愈多，人民的痛苦愈甚。你們不信，請看下面老莊自己的話。

老子說：『民莫之令而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這些話，不是明明白白主張無政府主義，是什麼？莊子根據此旨，更爲巧妙的發揮。他用治馬，治埴，治本的故事，來反對干涉主義的政治。他說：『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馽，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

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孔子是要所謂文明文化的，不過他認爲以前的文明，文化，比他那時的好，所以主張復古。到了老莊手裏，因爲他們認爲自然是絕對的美，絕對的善，所以對於人爲的文化文明，都認爲是罪惡的淵源。由他們看來，文字是罪惡，智識是罪惡，藝術是罪惡，禮俗是罪惡，法律是罪惡，政府是罪惡，乃至道德標準也是罪惡。故老子說：『常使民無知無欲；』又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他並且恐怕我們還不知道他的意思，又反過來說：『大道發，有仁義；慧智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莊子對於此點，也有痛快淋漓的議論。他一則曰：『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民乃朴鄙，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再則曰：『爲之斗斛以量之，則並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以稱之，則並與權衡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並與仁義而竊之。……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是非竊仁義聖知耶？』

總而言之，老子及道家們因爲相信自然是最美最善的，所以反對一切人爲的力量；因爲反對一切人爲的力量，所以主張無爲主義。因爲主張無爲主義，所以他們反對一切政府的干涉。同時也可說，因爲主張無政府，所以主張任其自然；因爲主張自然，所以主張無爲。同時再可以說，因爲主張無爲，所以主張自然；因爲主張自然，所以主張無政府。因此老子及道家們這三種主張——自然主義，無爲主義，及無政府主義，是一貫的東西。有了這個，便不能不有那個；有了那個，也不能不有這個。

老子的學說在周末的時候，本來與孔子的學說同佔勢力，但是因爲老子的思想，根本上反對政府，主張放任的緣故，所以很不合統治階級的脾味。同時因爲一班擁護君權的儒家，從旁極力排斥，老學更不能發展。不過我們要知道，老子的思想的確可以代表人類一種消極的心理，並且經莊子那種文華才思的宣傳，牠在中國社會上也有重大的影響。不要說普通一般人民很受這種哲學的麻醉，引來自慰；就是死不對頭的儒家，無形中也時常借老莊的話來出氣。老學雖不是我們中國的正統思想，卻是無愧當我們中國的旁統思想。

這種旁統的道教思想，對於中國全個社會的影響，綜合說來，約有下列各點。第一，道家的無政府主義，在積極方面，使人們對於政府發生一種厭惡及不負責任的心理，以爲政治根本是壞的東西，不宜過問。大家不去過問，於是政權便爲少數人把持，愈弄愈壞。因此在消極方面，便妨害了國家組織的發展，及民主政治的養成。在太平時候，有孔子的家長式的君主政體，還可敷衍下去；到了社會情形複雜緊張的時候，便要大亂幾十百年。至於道家的自然主義及無爲主義，更加消極。凡一切人爲的文物制度及努力，都在他們反對之列；照他們的意思，我們只有順服自然，不應征服自然。因此道家在中國社會上便發生第二種壞的影響，卽是運命主義。他們根本上就否認人爲的力量。流弊所及，我們無論遇到什麼困難，只有逆來順受；不但自己不去想方法解決，並且反對人家去解決。社會上有了這種運命主義的心理，便缺乏改進的力量。政治腐敗，不去革除；軍閥壓迫，不去反抗；官吏榨取，不去打倒；外國侵略，不去抵抗；生產方法不去謀改良；交通工具不去謀便利；天災不去預防；饑荒不去救濟；凡百事業都是得過且過，糊糊塗塗。於是社會上又發生第三種影響，卽是懶惰的心

理，由自然而無爲；由無爲而懶惰；由懶惰而沒有長進，這也是一貫的道理！

孔子和老子的學說都不是宗教，乃是哲學的系統。他們自己也沒有要做教主的野心。孔子的哲學，因爲歷代君主的利用，以及一班士大夫的捧臺，結果便成爲中國的正統思想，統名之曰儒教。儒教雖不是宗教，但牠的勢力與地位，比外國的國教還要利害。所以有人名之曰孔教。說到老莊的哲學，他們根本上就反對人爲制度，當然也不贊成宗教。但是因爲老子學說裏面有一種神祕的元素，所以在社會上便發生一種宗教性質的道教，具有各種迷信，在下層階級裏面尤佔勢力。其阻礙社會進步的罪狀，更不可勝數。中國社會有了這兩種勢力——儒教與道教，已經吃虧不少，那知後來又從印度流入一種教人出世的佛教。

(三) 佛教

佛教是一種宗教，可是我們並不去討論牠的宗教形式。我們所要說的，乃是牠的哲理，及其給與中國社會的影響。

我們知道孔子哲學是注重今生的，現世的；老子的哲學也是注重今生的，現世的。不過他們二家注重的方法不同罷了。孔家的方法是復古主義，君主政體，家族主義，人治主義，禮治主義等等東西。老家的方法是自然主義，無爲主義，無政府主義等等東西。至於佛教，則根本上不要今生今世，比老莊還來得更消極。因此，牠的第一個基本出發點，便是厭世主義。爲什麼要厭世？因爲佛家覺得現世充滿了生，老，病，死的苦痛，今生今世上沒有樂趣。你不信，讓我引佛發生厭世的經過便明白了。頭一次：

『太子出遊，看諸耕人，赤體辛勤，被日炙背，塵土坌身，喘呻汗流。牛縻犁端，時時捶掣，犁稿研領，鞅繩勒咽，血出下流，傷破皮肉。犁場土撥之下，皆有蟲出，人犁過後，諸鳥雀競飛吞啄取食。太子見已，生大憂愁，思念諸衆生等有如是事。語諸左右悉各遠離，我欲私行。卽行到一閻浮樹下，於草上跏趺而坐，諦心思惟，便入禪定。』

以後第二次便是於城東門遇老人，第三次是於城南門遇病人，第四次是於城西門遇死人。每次有遇，皆屏人默坐，慘切憂思，不能去懷。第四次所遇，更爲感動，其經過如下：

『太子駕車出遊……既又出城西門見一死屍，衆人轝行，無量姻親，圍繞哭泣，或有散髮，或有槌胸，悲咽叫號。太子見已，心懷酸慘，還問馭者，馭者白言，「此人捨命，從今以後，不復更見父母兄弟妻子眷屬，如是恩愛眷屬生死別離更無重見，故名死屍，一切衆生無常至時，等無差異。」太子聞已，命車回宮，默然繫念如前。終於城北門更見比丘，鬚髮畢除，著僧加黎，偏袒右肩，執杖擎鉢，威儀整肅，行步徐詳，直視一尋，不觀左右。太子前問。答言「我是比丘，能破結賊，不受後身。」太子聞說出家功德，會其宿懷，便自唱言：「善哉！善哉！天人之中，此爲最勝，我當決定修學是道。」時年十九。二月七日，太子念出家時至，於是後夜中內外眷屬悉皆昏睡，車匿牽馬，踰城北門而出。爾時太子作師子吼：「我若不斷生老病死憂悲苦惱，不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要不還此！」』

上面佛出家的經過，便可以清清楚楚表明佛家爲什麼要厭世的道理。既然抱了厭世主義，所以佛教第二個基本出發點，便是出世主義。所謂出世主義，卽是對現世求解脫的意思。既然對於現世要求解脫，那裏還去管現世那些麻煩事情。政治、倫

理、文化等等，老子還要去反對：但在佛家看來，完全沒有這麼回事，連反對也是多此一舉。他們心目中惟一回事，便是求出世，愈離遠現世愈好。

因此佛教所給我們的人生觀是一種消極的人生觀。遇到問題，遇到困難，我們不但不去解決，並且向後轉走逃避。這不消說與積極入世的淑世主義，是風牛馬不相及的了。你不見佛教在中國的消長與中國的治亂有密切的關係嗎？中國亂的時候，便是佛教盛的時候。中國治的時候，便是佛教衰的時候。爲什麼？因爲亂的時候，天下四分五裂，爭戰不息，痛苦萬分，而中國又因孔老二教的關係，沒有很積極的人生觀，結果厭世的觀念浸潤上下，相率而奉佛教，希望求與痛苦的現世解脫。到了治平的時候，現世還可安平過去，一般人心理上沒有求解脫的必要，所以佛教不甚發展。

(四) 結論

合儒道佛三家的哲學，大概可以形成中國人的精神生活。就中儒教是正統的思想，道教是旁統的思想，佛教是外來的思想。儒教是主，道佛兩教是副。儒教自漢以

來，都是盛行；道佛兩教，有盛有衰。

（一）儒教的主張與影響是些什麼？主張是復古的保守主義，家庭中心主義，君主專制政體，人治主義，禮治主義，差等主義。影響是守舊心理，虛僞心理，民主政治不能養成，法治主義不能實現，國家組織不能發達。

（二）道教的主張與影響又是些什麼？主張是自然主義，無爲主義，無政府主義。影響是運命主義的心理，消極懶惰的態度，與不管政治的現象。

（三）佛教的主義與影響又是些什麼？主張是厭世主義，出世主義。影響是不管今生今世那些閒事。

總看上面所說支配中國人生態度的三種哲學或宗教系統，沒有一種是很積極的，往前的，維新的。所以我們中國人的精神生活也是隨隨便便，糊糊塗塗，得過且過的。

第四章　中國問題的政治背景

打開我們中國政治史來看，幾十年一小亂，數百年一大亂。有時亂得昏天黑地，天翻地覆。表面看來，似乎中國以前的政治，是極變化的能事，具有極濃厚的色彩了。但是假使我們去仔細觀察政府根本的組織及其所做的事情，那麼姓趙的去，姓朱的來，還是依樣畫葫蘆。唐代的詩人李太白若能再生於清朝康熙乾隆之世，我想，他所看見政制的差異，不過是些朝衣，朝服，朝儀，朝禮，及國號，紀元等等罷了。為什麼中國政治在與西洋沒有接觸以前，那個長久的時間裏面，沒有根本的變化？若我們明瞭農業社會是我們中國的經濟背景，家庭制度是我們中國的社會背景，儒家的傳統思想是我們中國的哲學背景，我們便可恍然大悟了。

（一）政府的系統

我們中國以前的政府，可分名義上的政府，與事實上的政府。名義上的政府是有形的政府；事實上的政府是無形的政府。什麼是我們中國以前名義上的政府？概括說來，乃是自皇帝以至於知縣。什麼是我們中國以前事實上的政府？分析說來，乃是自家庭以至於公會。

在我們中國以前的政府系統的最高峯，當然是皇帝。照我們的傳統政治思想看來，所謂國家不過是一個放大的家庭。皇帝是父親，人民是兒女。在家庭裏面，父親有無限的權威；在國家裏面，皇帝有無限的權威。人民對於皇帝，如兒女對於父親一樣，只有誠惶誠恐，盲目服從。皇帝對於人民，如父親對於兒女一樣，雖有替他們謀幸福的使命，但是這種使命，不是人民付託給他的，乃是天付託給他的。所謂『受命於天，』便是這個意思。皇帝對於天的關係，也是有如兒子對於父親的關係。所以我們以前的皇帝，也叫做『天子。』『天子』者，乃『天』之『子』之謂也。既然皇帝是天的兒子，人民的父親，那麼根據我們中國的傳統觀念，他只能對天負責，不能對人民負責。猶之在家庭裏面，父親只能對祖先負責，不能對兒女負責一樣。怎樣負責方

法，家庭裏面便是祭祖，皇帝便是祭天。

天是什麼東西？天是看不見，聽不到，摸不着的東西，簡直沒有那回事的東西。既然是不成東西的東西，或是沒有意志的啞口無言的東西，那麼爲什麼要向牠負責？原來這班稱孤道寡的皇帝們，爲着要鞏固他們的權位，不能不神聖化他們的出身，更不能不神聖化他們的主權，於是不得不抬出一個虛無漂渺的『天』來做護身符，說『天』是他們的父親，『天』給他們統治人民的權力。『天』既然是沒有意志的東西，那麼所謂對『天』負責，乃是騙人的話；事實上，等於不負責或等於自己對自己負責。

因此，我們中國以前的政體，無論從理論上或從事實上看來，無疑地是君主專制。全國的主權，集於皇帝一人。皇帝的意志，便是法律，大家都得服從。他的舉動，有時雖然事實上要顧到祖宗的成法，民間的風俗，或大臣的意見；但是理論上他是最高無上，無所不能爲的。全國臣民，莫非他的奴隸；全國的土地，莫非他的產業。他可以生殺予奪，他可以立法，司法，行政。他是『皇帝！』

皇帝不是一個三頭六臂的怪物；他的權力雖是無限，他的能力卻是有限的。何況他有時是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有時是一個好像白癡的糊塗蟲。他要處理政事，自不能不委派大臣，分掌各部，組成中央政府。拿清朝在一八四二年以前的情形來說，有內閣，有軍機處，有六部，有翰林院參預或執掌政務。此外還有御史，職務在諍諫皇帝或批評臣下一切舉動。中央政府除了直接管理朝廷裏面的事情及京城的事情外，對於各省的政務，多半取一種監督或批評的態度。

各省有一長官，或稱總督，或稱別的名目，都沒有關係。有時候兩三省合併起來，設一總督或其他長官，如閩浙總督，兩江總督等是。當然總督之下，還有各種官吏，幫助他處理政事。

省之下，有府、廳、州、縣。縣是中國以前政府系統的最末一端，到縣才與人民發生關係。縣才是行政的眞正單位。

縣的長官，在前淸稱知縣。知縣一身兼有立法，司法，行政等權。他的命令，在本縣裏面便是法律。他要管理警察，維持秩序。他要受理訴訟，審判案件。他要奉承上司，徵

收賦稅。遇到災旱，他要去祈神求雨。遇到飢荒，他要去賑濟災民。遇到公共祭祀，他要去禱告跪拜。總而言之，他是一個小皇帝。在一縣之中，他是『民之父母。』

由皇帝至於知縣，組織是由上而下的，責任是由下而上的。何謂組織是由上而下的？因爲自總督至知縣，各級官吏是由皇帝委任的。何謂責任是由下而上的？因爲各級官吏，都是向上負責，不是向下負責，如知縣向知府負責，知府向道臺負責，道臺向總督負責，總督向皇帝負責，皇帝向莫名其妙的天負責。人民對於中央政府，只是一種間接又間接的關係，所以除了知道京城有那麼一個『真命天子』以外，什麼都不知道。

每個長官在他治域之內，除了對上面的長官須負責外，對於其治下的低級官吏及人民，儼然又具有極大權威。所以全國遇到賢明的君主，全國可以得到相當安居樂業的機會；地方遇到賢明的長官，地方也可以得到相當安居樂業的機會。假使中央有了昏君奸臣，那麼人民只有忍受一切虐政；到了實在忍無可忍的時候，只有暴動起來，革掉皇帝老子的命，另外有一個英雄好漢便來坐那把寶座。除此以外，沒

有別的路徑可走。假使地方有了貪官汚吏，那麼人民也只有忍受一切搾取；到了實在忍無可忍的時候，也只有暴動起來，去打倒貪官汚吏的衙門。除此以外，也很少上訴的機會。

因此，每一個朝代，差不多都是由强盛而庸弱，由庸弱而腐敗，由腐敗而革命。這麼一個循環，便在中國政治史上轉來轉去好幾千年，好像是一種預定的運命。

中國以前的政府系統，雖是如上所說，到縣而止；但是事實上的統治還不在此，而在家庭以及與家族制度有關係的鄉村，家庭才是中國政治的中心。在昨日的中國社會，我們應否讀書，我們應學什麼職業，我們應該與誰家姑娘結婚，都是家庭的事，本人不能決定。財產是全家共的，沒有父母的允許，產業不能自由買賣。一個人的行爲，全家都要負責。他吃官司，便要連累全家。他生孩子，也要大家供養。家庭裏面的家長，便是家政府的皇帝。他操有全家立法，司法，行政的大權。誰不服從他的指導，他可以隨便打罵。大少爺與二少爺或因穿衣吃飯問題，發生爭執，大吵其架，父親看見，認爲二少爺不對，給他幾個耳光，便可了事。一家的事，一家如此了之。一家了不了的

事，又怎樣辦呢？

假使張老板的兒子阿狗，打傷了李老爺的少爺阿猪。李老爺不肯干休，於是這事當然超出一家的範圍，非張老板一人可自了的了。或者是由張老板李老爺兩人直接交涉，或者有中間人爲之奔走調停，結果找出一個兩方同意的解決方法，便是由張老板做一桌酒席，放一串爆竹，賠幾塊大洋的醫藥費了事。

如果這樣解決不了，那麼李老爺或張老板第二步便是去請本村的族長，或本鄉的紳士，出來公斷。有時恐怕他們不願純盡義務，還得做一兩桌酒席給他們大嚼特嚼。他們吃完之後，聽了兩方的意見，才大家去想出一個解決的辦法。這個辦法，大概能得兩方的服從。一來因爲如果不服從，便要得罪這些有勢力的公斷人。二來因爲如果去打官司，知縣對於這些族長紳士的意見，也是非常尊重的。

萬一，有一造或兩造都不滿意族長紳士們的判斷，那麼才去知縣衙門裏面告狀。到衙門告狀，人民才與政府發生關係。然而這樣的事是少極了，因爲各家的事由各家了決；兩家以上的爭端，如果直接交涉可以解決，便解決；如果直接交涉解決不

了，便去請本村的族長，或本鄉的紳士公斷。經過這麼幾重的步驟，爭端十之八九是不進衙門去解決的。何況中國官吏，那樣的貪污專制，人民怕他們，有甚於猛虎呢。

然而無形的政府還不止此。在職業方面還有公會的組織。

中國的公會與歐洲中古世紀的『基爾特』是一樣的東西。牠是由同一職業的人所組織的，如錢業公會是吃錢飯的人組織的，木業公會是做木生意的人組織的。除農民外，差不多重要的職業，都有公會或公所；甚至於流氓乞丐，也有他們的團體。這種同業的組合，在城市方面，尤其發達。各種公會在其本職業範圍之內，是有很大權威的。在經濟生活方面，簡直可以說牠也是一種無形的政府。

第一，公會協定貨品的價錢；禁止同業者不得自由提高買價，以及低價出賣。誰要破壞，誰便要受懲罰。這顯然是對經濟生活一種干涉，一種束縛。不過這種干涉或束縛是中國窮社會一種挽救方法。在生產幼稚，人口過多的情形底下，如果沒有公會這種限制，讓個人完全去自由競爭，結果恐怕要把許多人擠到貧困線之下，活活餓死。

復次，公會決定雇主與雇工的關係。凡工資的標準，工作的時間，以及學徒的養成等等，都有規定。在以前那種家庭手工業之下，中國社會，沒有什麼勞資的對峙。第一因爲雇主雇工，一天到晚都是同在一塊做事，有如家人父子一般，個人感情非常親密。第二因爲在手工業制度之下，雇主所能賺到的利息，究竟有限，不至引起雇工的嫉妬與仇恨。況且農業社會，交通不便，一切生活都很停滯。貨物的需要與供給，沒有多大變更，貨物的價目與種類，自然也不會有多大變更；結果工資當然也隨之不會有多大變更。

不過公會最重要的職務，還在立法與司法方面。牠規定生產與分配的規則，度量衡的標準，信用的條件，解決財政的方法，破產的手續，等等。這些規則，雖然隨各個公會不同，但是合起來，可說是我們中國以前的商法民法。

公會不但立法，並且是司法的機關。凡同業之間，發生了糾紛，大概都是交公會去解決。公會的領袖，卽來擔任仲裁。這種仲裁的判決，多半是能得到兩方的服從的。第一因爲公會有社會與道德的制裁，誰不服從，誰受大家的非難；第二因有經濟的

關係，誰不服從，大家不願與他爲金錢上的往來；第三因爲如果不服從公會的裁判，只有到衙門裏去打官司。中國官吏那樣貪汚，衙門那樣腐敗，去打官司，往往弄得傾家破產，得不到絲毫的公道。

公會的組織是很民主的，牠的辦事人員是由會員推舉的；可是推舉的結果，往往是有錢有勢的人當選。同業的人，都可以入會，而事實上也都入會；因爲不入會，一方面要受種種排擠，他方面得不到保障。

詳細講來，公會有許多種類。沒有鄉土的關係，在一地方依着同業者所組織的叫做公會，公所等等。依着同鄉人而組織的同業組合，多半叫做幫，有時也叫做公會。公所由本地人組織的叫做士幫，由他鄉人組織的叫做客幫。

這就是各種職業的政府，雖然沒有政府的形式，但從立法司法行政看來，事實上等於政府。

所以，我們中國以前的政府，表面上的系統，是由皇帝至知縣而止；但是真正的統治機關，還是家庭與公會。表面的政府系統，儘管變動，而社會的秩序還不至於根

本搖動者，其原因未嘗不在乎此。

人民的普通生活有家庭的統治，職業的活動又有公會的統治，那麼政府的功用，真是微乎其微了。所以中國以前越是太平，越是無政府狀態。

(二) 政府的職務

我們以前每個朝代的天下，都是由一個强有力的軍閥搶來的。他在混亂之中，把其餘與他互爭雄長的軍閥，一個一個的打倒；打倒之後，便把皇冠加在自己的頭上，南面而坐，稱孤道寡起來。那時候，全國的臣民，莫非他的奴隸；全國的土地，莫非他的財產。他要滿足他的性慾，他就可以挑選天下的美女。他要多少財貨，他就可以任意剝削。他是多麼威風，多麼勢耀啊！

但是這種味道，誰不願意嘗嘗。若做皇帝的人，一個不小心，便有陳勝吳廣之徒，要起來揭竿爲亂，奪取天下。所以做皇帝的人，爲維持他的政權起見，第一件事情要做的便是養軍隊，養官吏，做他的家奴走狗。文官可以替他做偵探，出主意；武官可以

替他打死仗，出死力。誰要企圖破壞他的統治，他就可以利用這些工具，來撲滅他所認爲的叛徒。因此在中央的官吏，便成了君主直接的家奴，在地方的官吏，便成了君主間接的走狗。這些家奴走狗的職務，便是一心一意的去維持他們主人的江山。遇到外來的侵略要抵抗，遇到裏面的反亂要剷平。這不是爲人民打算，這乃是爲君主打算。人民若因此能得到稍許安居樂業的機會，也是偶然的『雨露之恩』。

然而養兵，養官，以至於養那窮奢極欲的朝廷，非錢不可。所以我們中國以前政府的第二個重要職務，便是徵稅。中央政府限定各省政府每年應交多少糟米錢糧。各省政府又限定各縣政府每年應交多少糟米錢糧。上面包給下面，一級搾取一級。當然最後擔負這種重累的是一般平民。平民將其血汗所得，奉之於知縣；知縣扣出額外的徵收，歸入私囊，然後奉之於各省；各省當局又扣出額外的徵收，歸入私囊，然後再奉之於中央；其間還不知道要經過多少重的搾取，多少級的剝削。

中央每年只要得到各地固定的收入，可以維持他的政權，其他的事不願過問。地方長官只要把本地方應繳的錢糧交到，那麼對上面可以說是已經盡了他的職

務，對下面再也不願多管閒事。除非人民發生了爭端，非家族或公會所能了決，已經鬧進衙門來了，他才去審判審判。又除非遇到水災旱災，有礙錢糧的徵收，他才去拜天求神。更除非有人作奸犯法，危害皇帝老子的江山，他才去把犯人捉來，砍的砍，監禁的監禁。

如此，便是我們中國以前政府的職務。這種職務，當然是非常簡單。政府只要人民納些錢糧去養軍隊，養官吏；用那些軍隊與官吏去保持政權。至於怎樣積極去為人民謀幸福，如修理道路，整頓溝渠，普及教育，改良農業，便利工商等等，那都非政府所願過問的事情。在人民一方面，因為普通生活受家庭制度的支配，經濟活動受公會的管理，同時全個社會都在農業的簡單生活之下，不覺得有強有力的政府之必要，若能『仰沾雨露之恩，』安居樂業，於願已足。因此，我們中國以前的人民，除了納稅去養活那班統治階級以外，很少與政府發生關係，差不多完全不覺得政府的存在。太平的時候，還知道有一個皇帝在上面，大亂的時候，連皇帝都不知道在那裏。全個社會像這樣無政府狀態一般的，睡過了幾千年。

(三) 統治階級的治術

我們中國以前的政府，既然需要許多官吏，而這些官吏又必須爲君主的家奴走狗，那麼有什麼方法可以達到這個目的呢？於是科舉制度，應時而出。原來任用官吏，有三個方法：一是委派；二是選舉；三是考試。我們以前的科舉取士制度，就是考試以後，再加以委派。

考試本來是比較最公平最好的一種制度，但是我們中國沒有得到牠的好處，反而受到牠的壞處。這又是什麼道理？原來我們中國歷代君主考試人才的目的，並不在要他們能夠替人民做事情，乃是要他們老老實實的做家奴走狗，替皇帝家裏看守江山。所以考試的東西，不是關於運用政治的知識，治理國事的大計，乃是四書五經，八股文章。四書五經是擁護君主專制的。八股文章是個蔽思想的。兩者都是愚弄人民，鞏固政權的好把戲。

一班君主知道，社會上最難治，最危險的，便是智識階級。你看他們雖然是些文

弱書生，但是若不設法安置他們，他們就可用其方寸的腦，三寸的舌，五寸的筆，捭縱連橫，煽動播弄，鬧得天下不太平。一班君主們看破此中祕訣，所以拿出科舉取士的方法來聯絡人民中的優秀分子，讓一班讀書人，一生一世，絞盡腦汁，在四書五經，八股文章的上面。一班君主好像是對智識階級說：『你們要做官嗎？那麼你們第一要不用自己的思想，因爲你們自己去胡思亂想是很危險的。那裏是四書五經，古先聖王之道，孔子之言。你們不必自己思想，就拿孔子的思想爲思想，那才是不危險的分子，那才是我的順民，我的家奴，我的走狗。』

結果，所收的人才，果然都是一班不用腦筋，不用思想的腐儒。他們只知做君主的家奴走狗，不知爲人民謀幸福。什麽叫做政治，什麽叫做政府，怎樣去處理國事，如何去改良社會，他們是全然不懂的。所以中國屢次失敗於西洋各國之手，以後還有許多王公大臣，相信義和團的師父師兄們，可以扶清滅洋。

這班由科舉所取的官吏，若是另外有立法機關，通過法律，叫他們去實行，恐怕他們還可以依法辦理，做出些成績出來。可惜我們中國從來沒有這麽一個東西，而

且從來是尙人治反法治的國家。這當然第一是因爲受了儒家傳統思想的關係，第二是因爲一班專制君主不願受法律的束縛。所以我們的政治，全繫乎人。『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於是成爲人治的自然結果。我們以前雖然有些禮法習慣做我們行爲的標準；但是這種標準，只有道德的力量，沒有法律的制裁。

人治既然是繫乎人，然而人是靠不住的。遇到好人，還可以替人民做點事情。遇到壞人，那簡直沒有方法監督。我們中國科舉所取的人才，既然都是腦筋冬烘，只知逢迎君主的高等游民，那麽你要他們去處理政事，一身兼立法，行政，司法的大權，結果，豈不是只有腐敗黑暗的政治？

（四）結論

由上看來——

（一）中國以前的政府，在名義上是在由中央的皇帝到各縣的知縣的系統；但事實上是在家庭，及同業組合的公會。

的職務。

（二）中國以前的政府，其目的是在保持皇帝的江山。爲了要保持江山，所以不能不養軍隊，養官吏；更不能不徵稅。於是養兵，養官，抽稅，便成了政府基本的職務。

（三）統治階級用科舉取士的方法，其用意在消極方面籠絡一班優秀份子，使其不至於造反作亂，積極方面在要他們擁護君權，鎭壓人民，做皇帝的家奴走狗。

結果，形成下面所舉中國政治的幾個特質——

（1）中國政府的組織是由上而下的。有了皇帝，才有中央的王公大臣；有了中央的王公大臣，才有各省的長官；有了各省的長官，才有各縣的知縣。各級官吏，只向上負責，不向下負責。人民沒有參政的機會，得不到政治的訓練，養不成政治的能力。這顯然是反民主政治的君主專制。這顯然與近代西洋民主國家不同。

（2）中國政府的功用，異常簡單，不但積極方面不去爲人民做些公共事

業，就是消極方面的維持秩序，也不是爲人民着想。因此，人民在比較淸明時代，很難認識政府與國家的存在；到了黑暗時代，橫受各種搾取壓迫，那只有厭惡政治，咒咀政治。

(3)中國政治完全建築在人的關係上面。國家大事，人民利益，要看官吏的喜怒哀樂。而這班官吏，又是以四書五經科舉取來，毫無政治智識。所以結果成了家奴走狗的政治，卑鄙齷齪的風氣。

(4)中國事實上的政府，乃在家庭與公會之中，人民差不多很少與政府系統發生接觸，也不覺得有國家或其他較大的社會組織之必要，自然沒有什麼國家觀念或社會觀念。

第五章　中西接觸與中國問題的發生

中國以前的社會，經過兩千多年沒有多大變動，常在靜的狀態底下，全個文化大體都是我們中國自己的特殊產物，沒有受外界重大的影響。思想是以孔家哲學爲主體，社會是以家庭爲單位，政治是君主專制，經濟是農業背景與家庭手工業制度。若是我們中國能夠繼續的把門關住，不與外面往來，那麽這種靜的社會，還不知要到什麽時候才生變動。我們自己對於這種停滯的狀況，覺得沒有什麽不滿意。我們認爲中國的文化是最高無上的；中國以外，都是野蠻民族，與他們接觸，得不到一點益處。因此，我們睡了幾千年，懶氣洋洋的，不願顚動，也不願人家來搗亂。儘管西洋社會變得怎樣的劇烈，我們在夢鄉裏總是不知不覺。但是命運之神，終竟要降臨了。我們雖然想把四門緊緊的關着，然而歐風美雨，驟然而至，不但把我們的門戶打得四開，並且把我們的藩籬也搗毀無餘。四圍閉塞，故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我們，便不能

不與西洋各國見面。若是這班不速之客，還是像以前北方一帶的部落民族那麼落後，他們進來之後，我們不過享以酒餚，贈以玉帛，餽以美女了事；再若不然，不過讓他們在中國做若干時日的皇帝。結果，他們還是要被我們同化。現在這班從西方來的不速之客便不同了。他們挾有優越的文化，優越的政治，優越的經濟，以臨我們，我們既不能揮之使去，又不能化之歸我，更不能屈之以從，結果只有衝突；衝突之下，當然是優勝劣敗。我們中國社會受了無數次的挫敗，對於向日的全個社會基礎，自不能不失卻信念，而逐漸加以懷疑。於是內外夾攻，全個社會，不得不發生根本動搖，由動而靜，變化起來，釀成數十年來的混亂大觀——卽李鴻章所謂『三千餘年一大變局。』

（一）西洋勢力東進的原因

西洋在西方，我們在東方，海天相隔，何啻萬里，真是所謂『風牛馬不相及。』我們既沒有請他們，也沒有惹他們，爲什麼他們要不遠萬里，冒盡風波而來？來了之後，

我們閉門不納，爲什麽他們不管三七二十一，偏要打將進來？此中必有緣故，待我說來。

原來白人之所以跑到我們中國來，有遠因與近因兩種。讓我們先說遠因。

第一個遠因是商業的動機。我們東方的絲，繡，香料，珠石，及象牙雕刻之類，對於歐洲人確有很大的引誘能力。他們很早就看見這些東西，並且表示異常的歡迎。原來做這宗生意的，完全是阿拉伯人與意大利人。先由阿拉伯人，從亞洲及東印度各地，販到地中海與黑海的東岸，賣與意大利人；再由意大利人，運到意大利各重要城市國家，如威尼士 Venice，簡洛亞 Genoa，及佛羅倫斯 Florence 等等地方；最後，多半由德意志商人，販往歐洲其他各地拍賣。因此意大利變爲歐洲與東方通商的樞紐，異常繁榮。其他各國看見這種情形，自然眼紅，於是想另找航路，直接與東方通商，以期打破意大利的壟斷。此卽航海探險運動的最要動機，也卽海運開通的一大轉機。

其次，就是地理的發現。在從前，我們中國人固然不知世界上還有什麼歐洲；他們歐洲人心目中又何嘗有我們中國。其後，因爲看見東方的珍奇貨物，對於東方，才發生種種幻想；又其後，一面因爲有找海路通商的需要，另一面因爲受了地球是圓的學說的影響，才有探險的運動。葡萄牙先起，西班牙繼之，荷蘭及法英又繼之。一四八八年，地亞子 Bartholomew Diaz 發見好望角。一四九二年，哥倫布 Columbus 發現新大陸。一四九七年，瓦斯哥大加馬 Vasco da Gama 到了印度，卡保 Cabot 到了北美洲。一五〇〇年卡布洛 Cabral 到了現在的巴西 Brazil。一五一三年，馬其倫 Magellan 繞過美洲的極南端，橫渡太平洋，至菲列濱羣島。自是而後，白人的足跡，逐漸走遍天下，而遠在遠東的中國，也不免他們的光臨。

又其次，便是政治上的原因。我們知道歐洲到了十五世紀，各先進國家，如法、如英、如荷蘭、如西班牙、如葡萄牙、都已脫離封建制度，走入民族國家的大路。國家主義，正如旭日方昇，各國君主爲鞏固自己的地位，發揚本國的勢力起見，於是大家競爭向外發展。自發現美洲及各條航線以後，更是爭先恐後，視歐洲以外各地爲外府，可

以予取予求。因此重商主義，與殖民地政策，便成爲當然的結果。我們中國地大物博，自然要受這種潮流的波及。兼之有少數旅行家，如馬可波羅之流，替我們中國大事宣傳，說我們如何富足，如何文明，更使歐洲人聽見之後，心動神移，巴不得要跑來通商。

再其次，爲宗教革命的影響。原來基督教是統一的。西歐只有一個總教堂，在羅馬發號施令，在十六世紀以前，絕對想不到基督教到現在，分成這麼許多派別。但是因爲教堂的腐敗；教義的硬化；各國君主，不願受教皇的干涉；新興的商人，不願受教士的剝削；智識分子，不願盲目的受舊教的束縛；一般人民，激於愛國的情緒，不願本國受羅馬的支配；於是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約翰柯文 John Calvin 等，登高一呼，而宗教革命之勢成。經過三十年戰爭，乃得信教自由。因爲信教有了自由，所以派別紛起。同時基督教，有新教與舊教之分。同是新教，又有無數的派別，如長老會、聖公會、浸禮會、監理會、組合會、教友會等等。各派爲擴大自己的勢力起見，於是爭先恐後的向外發展。無論是天涯地角，一有機會，他們便要去傳布他們自己所認爲的

『上帝福音。』加以，有些國家，信教還不自由，一班教會裏面的『叛徒，』想得到自由信仰的地方，不能不去另覓天地。英國清教徒的移殖美洲，卽其一例。兼之，本國政府有時不惜利用教士們做帝國主義政策的先鋒，而教士們當中也有些是甘心願做侵略的工具。他們到一個地方，便設法培植本國的勢力。若有教士被害，本國政府便可借題發揮牠的野心：或派兵將該地佔領，或要求其他重大賠償，以爲侵略的基礎。所以有人說，教士，商人，國旗，是帝國主義三位一體的東西。有時教士先進，商人隨去，國旗跟來。更有時商人先進，教士隨去，國旗跟來。更有時國旗先進，敎士隨去，商人跟來。我們中國素來宗教觀念很輕，又沒有什麽極有力的宗教先入爲主，基督教徒看見我們四萬萬化外之民，自然是樂意前往傳教，認爲是一個絕大機會。

然而上面所說的遠因，比較還不重要。最重要的，還是工業革命以後所產生的近因。原來在十八世紀的下期，因爲科學的進步，機器的發明，歐美先進各國，經濟生活上發生一極大的變動：由農業社會展進到工業社會；由家庭生產，展進到工廠生產；由手工製造，展進到機器製造。結果，製造品驟然增加。這大量的產品，一面非本國

市場所能銷盡，他面又受其他國家的關稅保護政策所排拒，於是不能不向外發展，尋求國外市場。此爲推動帝國主義者一。

同時，因爲運用機器，大批生產，須有大宗的原料，爲之接濟；否則，工廠勢必倒閉，工人隨之失業，全個經濟組織必至崩潰。但一國的天然財源，以及一切的原料物品，不但種類有限，而且總額也是有限。有些東西，本國原來就沒有，非得從外面運來不可。有些東西，即使本國出產，有時也不夠供給。於是不得不向外去尋找原料。此爲推動帝國主義者二。

工業化的結果，財富的增加日新月異；資本的積蓄，有增無已。本國因爲工商業發達，投資的機會，逐漸減少，以至於所得利息，幾等於零。在這種情形之下，爲使剩餘的資本，得到有利的運用，自不能不向產業落後的地方去找投資的機會。譬如在英美等國，鐵路的投資，只能得到百分之五的利息，若是投來我們中國，便可得到百分之二十。如此工業先進國的剩餘資本，自然要流向落後的地方去。此爲推動帝國主義者三。

我們中國有四萬萬的人民，自然是世界上一個最大的市場；有三千萬方里的土地，天然財源，素稱豐富，自然有大宗的原料。兼之，我們以前完全是在家庭手工業時代，一切生產事業，都是非常簡陋。凡鐵路的建築，礦山的開採，森林的採伐，航業的創辦，物品的製造，無處不是白人投資絕好的機會。歐美列强，以及後來的日本，看見這塊肥肉，那有不趨之若鶩的道理？

然而，若是我們中國與西洋的交通，與幾百年前一樣，或須由小亞細亞，穿過帕米爾高原，而到我們中國；或須乘木船，橫過那巨波駭浪的太平洋，大西洋，或印度洋，而到我們中國，恐怕大體上，西洋的勢力，還不能與我們作全部的接觸。但是不料因爲汽船的發明，火車的運用，我們與歐美的距離，忽然日益縮近。以前太平洋，印度洋，及大西洋好像是很難越雷池一步，現在有汽船往來，比我們由內地到海口還要便利。兼之，西比利亞鐵路一通，歐洲勢力，又可由陸上進攻。歐美各國，有了這種交通利器，加之有電報等等，做他們的耳目，自然是水陸併進，長驅直入，把我們中國的門戶，搗個紛碎。我們雖欲把他們推出門外，無奈力不從心。結果，以强有力的工業化的

國家，與我們一盤散沙的，產業落後的國家一遇，優勝劣敗，自然是逃不出的公例！

(二) 中西接觸的步驟

西洋古代與我們的接觸，雖有種種的臆說，但無眞實的憑據，我們不可盡信。卽使有之，對於我國，也未發生什麼重大影響。我們可置之不論。初來遊歷我們中國，並且引起白人注意的，要算馬可波羅。馬氏來到中國的時候，正是元朝忽必烈汗全盛時代。那時中國領土，橫貫歐亞，曠古未有，好不威風。所以馬氏在他遊記裏面，替中國說得天花亂墜，西洋人看見，怎樣不想來觀光通商？

最初來的是葡萄牙人，其次是西班牙人，其次是荷蘭人，又其次是英法兩國人，更其次是其餘各國人。同時，由陸路上來得很早的，是俄國人。他們來的目的，最要緊的是通商。但是我們中國自古號稱地大物博的國家，並且素來看不起那些東夷，西戎，南蠻，北狄，更沒有看慣這班黃髮，碧眼，高鼻，直胸的怪物，那裏願與他們去逐什一之利。所以他們雖然到了我們的門口，屢次的請求開門，讓他們進來，但是我們還是

堅決的拒絕。

英國自佔據印度之後，自然認爲中國是牠的『近水樓臺，』曾兩次派遣大使來要求訂立通商條約，都被拒絕。兼之，我們禁絕英人販賣雅片，他們自然是火上加油地更加憤怒。文的方法，不能請我們開門，於是決定用武的方法，來打破我們的門。因此，而有一八四二年的鴉片戰爭。更因此，而有戰敗的南京條約。南京條約是一切不平等條約的基礎，也是開我們大門的鑰匙。因爲除了賠款二千一百萬元，割讓香港以外，還開了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口通商，任英人派領事約束商民，允予秉公議定稅則。一八四三年的附約，更確定協定關稅爲值百抽五，及治外法權。英國既得了這麼許多權利，其他各國，如美、如法、如比，如瑞典、如挪威等等，也都起來援例要求通商權利，中國也沒有拒絕。於是這些國家，不費一兵，不折一矢，垂手而得。

但是鴉片之戰，只打開了我們南方的門戶；不但北部沒有受多大影響，就是中部也沒有大事開放。列強爲進行侵略起見，自然覺得出入還不方便。兼之，因爲言語，風俗，習慣，制度，理想，各方面根本不同的緣故，中外通商，自然發生許多誤會。在我們

方面，本來就不願與他們往來。在他們方面，則非深入我們的堂奧不可。相激相盪，愈演愈烈。到一八五六年，因爲廣西的教士案，與廣東的亞羅船案，於是有英法聯軍之役。結果，我們一敗，而有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其內容大概爲：（一）外國公使可以駐居北京；（二）傳教自由與信教自由；（三）開放鎮江、九江、漢口、宜昌、牛莊、登州、臺灣、潮州、瓊州，及其他各地爲商埠；（四）嚴格規定治外法權；（五）確定子口稅值百抽二·五，關稅十年修改一次；（六）外輪在長江一帶有航行權。

天津條約結下之後，我們中國後悔喪失權利太大，於是拒絕批准。英法聯軍遂於一八六〇年攻入北京，並焚燒圓明園。我們再敗之餘，只有爲城下之盟，而與英法再結北京條約。我們除賠款，道歉，承認天津條約外，又開天津爲商埠，割九龍與英國。俄國乘火打劫，表面自稱調人，實則想奪取我土地。我們中國不察，受其愚弄，終割烏蘇里江以東，黑龍江以北之地與俄，以爲報酬。由是中國的門戶，乃大開矣！

跟着英、法、俄之後，美國、德國、丹麥、荷蘭、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意大利、奧國、日本、巴西、祕魯等等都先後與我們訂立通商條約，其內容與天津條約相差不多。

我們知道在一八四二年以前，外人通商限於廣州一地，而以澳門為根據。北方只有俄國人在沿邊地方，與我們做生意買賣。鴉片之戰，英國只打破了我們南方的門戶。到了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才强迫我們開放長江流域；又兩年，根據北京條約才强迫我們開放天津。至是，我們北方的門戶，也被打破。全國洞開，外人於是可以登堂入室，傾箱倒篋矣！

我們的門戶，既陸續被人打破，我們的藩籬，也先後被人割去。一八八一年，日割我琉球，俄割我伊犂以西地方。一八八五年，法割我安南。一八八六年，英割我緬甸北部。至一八九五年，中日戰爭，日本更割我臺灣，拆離我朝鮮。藩籬盡失，外人更肆無忌憚！

外人進來之後，因為我們中國地大人多，文化最古，懾於向來的餘威，不敢大事搶掠。及至一八九五年一戰，中國竟敗於蕞爾小島的日本，西洋列强，乃知我們中國完全是一紙老虎，毫無用處，於是企圖把整個中國來豆剖瓜分。所謂勢力範圍，即其開端。俄國之於東三省與外蒙，德國之於山東，英國之於長江流域與西藏，法國之於

廣東、廣西、雲南、都是視同禁臠。若不是美國出來主張門戶開放政策，恐怕中國早已像非洲一樣。

列强認清了他們各自的勢力範圍以後，若要去切實經營，第一須有侵略的海軍根據地。所以一八九八年，德國藉口曹州教案，便把膠州灣佔領，迫我租借。其餘各國，羣起援例。俄租我旅順大連、法租我廣州灣、英租我威海衞、甚至意大利也要求租我三門灣。各國有了海軍根據地以後，便須建築鐵路，爲進行侵略的工具；不但運兵要鐵路，壟斷我們的政權要鐵路，就是支配我們的經濟生活更不能不要鐵路。所以各國第二步便是向我們中國攫取鐵路建築權。但是鐵路不能不用煤，同時因爲我們的天然財源，還沒有開發，所以他們進而向我們奪取礦山採掘權。他們有了這些利權以後，一面要拿資本去接濟種種侵略事業，一面要借款與我以爲操縱我政權的媒介，於是不能不有銀行的設立。

這種急迫的侵略，激起了一種反動，於是一九〇〇年有義和團運動的發生。不幸因爲沒有良好的指導，這種排外運動，趨於迷信野蠻，釀成絕大的暴動，引起八國

聯軍之役。結果，又是喪權辱國，如賠償四百五十兆兩，如劃定公使館特別區域，如拆毀北京至海濱的炮臺，如允許各國在京津一帶重要地點有駐兵的權利等等。俄國因為英法聯軍之役得了極大便宜，又想在混水裏面，來玩那套摸魚的老把戲，乘機佔據我們的滿洲。但是新興的日本對於滿洲，早已垂涎三尺，那肯臥榻之旁，讓他人鼾睡，自然起而反對，要求俄兵退出滿洲。俄國不允，於是而有一九〇五年日俄之戰。結果，日本勝利，旅順，大連，以及南滿鐵路，遂由俄國轉移與日本。

日俄戰後，各國侵略我國如故，尤以爭取借款權利為猛烈。至一九一一年，革命發生，把滿清推翻，建立共和，各國乃稍為斂手。但是曾幾何時，各國的單獨侵略，忽變而為協調的侵略。其所以變更策略的理由，有二：（一）因為看見單獨侵略，互相猜忌，釀成種種競爭，對於彼此都是不利。我們知道，經濟方面，一切營業，都忌競爭，所以才有各種托辣斯的組織；國際關係也是一樣。個別的競爭，不但中國可以從中利用各國間的衝突，實行『以夷制夷』的方法，並且有釀成國際戰爭的危險。日俄之戰，即其先例。（二）我們中國以前的借款，除付清日本賠款外，其餘多是用於建造鐵

路，或開辦實業。自民國成立以後，中央政府，因爲各省很少解款，財政極爲支絀，於是不得不向外借款，以作行政費用。外人看見中國有破產的可能，不能不想到中國破產以後的辦法，若是中國眞要破產，那麽照帝國主義侵略的先例，當然要把中國的財政，交給外人去管，但是在各國互相嫉視之中，當然不能讓一國去包辦。既非一國所能包辦，當然只有取協調侵略的方法。

列强採取協調政策的第一步，便是成立所謂英法俄德四國銀行團。後來，又加入了日本美國，變成六國銀行團。又後來，因爲英法德俄各國以借款爲要挾，要求監督中國鹽務債務，美國威爾遜總統看見其勢非共管中國不可，於是於一九一三年，宣告美國政府不贊成銀行團的組織，美國銀行家，遂退出所謂六國銀行團。因此而變成五國銀行團。美國銀行團退出六國銀行之後，列强又恢復其單獨侵略的故態，向中國爭取各種權利。

一九一四年歐戰發生，西洋各國，頃其全力於歐洲方面，不暇東顧。日本於是乘火打刼，於一九一五年，向我提出全國痛恨的二十一條首則要求繼承德國在山東

的權利，而更擴大其範圍；次則要求壟斷南滿東蒙，以保障其絕對優越的地位；繼則要求操縱漢冶萍煤礦，使中國對於近世工業中最重要的煤鐵工業，以後都要仰其鼻息；再則要求擴大其勢力範圍於沿海各地；終則要求我經濟上，教育上，軍權上，警務上，傳教上種種權利，簡直無異以對待朝鮮的辦法對我。我們迫於不得已，除第五部保留外，幾全部承認。

一九一八年，歐戰既終，我國因爲參戰的關係，得以參加巴黎和會。但是英法日意各國，因爲事前有密約的陰謀，終竟拒絕我的要求，而以青島及前此德國在山東的利權讓渡與日本。我們得訊之下，全國同憤，於是而有空前的五四運動發生。西洋各國，自從巴黎和會結束之後，開始移其注意於遠東問題。爲恢復遠東的均勢，及限制海軍計，於是在一九二一年，有華盛頓會議的召集。

華盛頓會議，的確在中外交涉史上，開了一個新紀元。前乎此者，列强都是用野蠻的方法，步步壓迫中國，攫取各種利權；後乎此者，因我國愛國運動的熱烈，民氣的激揚，及列强本身受歐戰的鉅創，一班帝國主義的國家，不能不有所顧忌。華盛頓會

議結果，列强對於各種不平等條約，如關稅，治外法權等等，都有稍微的讓步，或讓步的表示，爲彼時到現在一切外交的張本。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對於各帝國主義者，又給了一個大打擊。一九二六年，國民黨乘此人心憤激之餘，提師北伐，用革命的手段，將漢口九江租界收回。不幸國民黨繼續不斷的內訌：國共分家，寧漢之爭，寧桂之戰，擴大會議，非常會議，一幕一幕的演出，以至政治不能上軌道，國家不能真統一。兼之自一九二九年以後，歐美各國大鬧經濟恐慌，大家都忙着整理內部，沒有力量來注視遠東。日本於是乘着這機會，於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突然進攻，先則席捲我東三省，繼則攫取我熱河，至今華北也岌岌不保。這是空前的大變。其意義不是侵略一部分的問題，而是吞倂全中國的問題。

上面所說，乃是外人進攻我們的歷史，也是西洋及西洋化的日本與我們接觸的步驟。因爲有連接不斷的接觸，才搖動我們的基礎，使中國社會發生劇烈的變化。

（三）中西接觸的方面

歷史的寫法，只能給我們一個線索，有時還不能使我們認清一個問題的輪廓。所以除了上面那種縱的敍述外，我們要從橫的方面來分析。

我們第一要問：中西接觸的工具是什麽？第二要問：中西接觸的東西是什麽？

接觸的工具，有人，有物兩種。人又有商人，教士，官吏，旅行者。最初與我們發生接觸的是商人。他們因爲要做生意，或買我們的東西，或賣東西給我們，都不能不與我們往來。南到廣州，北到遼寧，都有他們的踪跡。其次是教士。他們這班宗教狂者，看見我們這麽許多衆生，沒有得到『上帝的福音，』在他們看來，我們是多麽可憐！同時，他們各派在本國已無大活動的餘地，現在有這麽一個偉大機會，不利用，多麽可惜！所以不管是天主教徒，長老會教徒，監理會教徒，耶穌會教徒，浸禮會教徒，組合會教徒，教友會教徒，聖公會教徒，或是其他種種派別的教徒，都要爭先恐後的來收羅信徒。他們相信『有上帝保護，』奉着『上帝的使命，』比商人還利害。無論智愚賢不

背，他們都要拉攏。不論是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他們都要去傳教。所以他們是中西接觸在人的方面最重要的工具。

又其次，是官吏。因爲商人來了，教士來了，政府不能不派代表來保護他們。關於外交方面有公使，關於商務方面有領事。這些外國代表散布在中國各處，保障僑民的利益，擴張本國的勢力，調查我們的情形。他們不但要與我們一般人民發生關係，並且時常要與我國官吏辦理交涉。至於旅行者，或是爲着要來觀光，或是爲着要來研究問題，有時不遠萬里而來。他們無形中也負有中西接觸的使命。

至於中西接觸物的方面的工具，有汽船、有火車、有郵局、有電報、有飛機、及其他交通的利器。有了這些東西，地球變小了，中西接觸的機會容易了。不怕太平洋那麼遼闊，有汽船可以橫渡牠；不怕西北利亞那麼荒野，有火車可以駛過牠；不怕東西隔那麼遠，有信件電報可以傳達一切。以前我們可以閉關自守，現在關也關不住，守也守不住了。我們現在被這些東西牽連，與外國發生不斷的接觸。誰能逃出他們的網羅？

有了這些人與物接觸的工具，我們可以往下討論所接觸的東西是些什麼了。我們若是籠統說來，接觸的便是兩個不同的文化；分析說來，便是思想，科學、藝術、制度、風俗、習慣以及其他精神的與物質的東西了。

什麼民主主義、個人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國家主義、共產主義等等，都是西方來的產物，現在隨着西洋人來了，在我國思想界發生很大的影響，我們的專制主義崩潰了，家庭主義搖動了，重農主義不行了，一切舊的思想也都受很大的打擊。

以前我們沒有什麼社會科學，更沒有什麼自然科學，我們與西洋接觸之後，賽恩斯（科學）先生乃大駕光臨。於是學校中才有什麼物理、化學、數學、天文、地理、歷史、生物學、心理學、政治學、經濟學等等。一般學生們才把那些四書五經束之高閣，而來研究這些新把戲了。

我們原來也有圖畫，雕刻，音樂那些東西，不過西洋傳來的，不但與我們固有的大不相同，而且比我們的更加進步。因此現在西洋的音樂，圖畫，雕刻等等，慢慢在中國普遍起來。

說到制度，如西洋的民主政體，與我們的君主專制；西洋的工業制度，與我們的農業制度；西洋的工廠機器製造，與我們的家庭手工業制度；西洋的銀行制度，與我們的錢莊制度；西洋的小家庭制度，與我們的大家庭制度；這些，這些，都是根本上不同的東西；這些，這些，都發生了不斷的接觸。

其他和西洋的風俗，習慣，以至於日常用的東西，無不在與我們發生關係。我們以前的結婚，乃是由於『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現在要看見西洋人講戀愛，我們也要講戀愛了。我們以前一般讀書人，都是文質彬彬的；現在也糾糾的學西洋人踢起球來了。我們以前沒有洋房住、洋餐吃、洋衣穿、汽車坐、電影看、留聲機聽、雪花膏搽；現在上海、天津、北平、廣州、瀋陽、漢口那處沒有？只要有錢，你可吃金山的蘋果，渴古巴的咖啡，着巴黎的時裝，飲德國的啤酒，擦俄國的火柴，用瑞士的鐘表。

(四) 結論

總起來說，中西接觸是我們中國空前的一大樞紐。在沒有接觸以前，我們中國

是一個很悠久的農業社會。我們有孔家的傳統思想，可以範圍人心。我們有大家庭制度，可以維持社會秩序。我們有君主專制，可以統系無政府的狀態。我們有種種色色的物產，可以自給。我們有極大的一塊土地，可以居住。我們覺得生活尙稱和平安適，不想什麽進步，我們的祖先，也教我們不必多事。我們所希望的，就是保持這種簡單社會生活，以至萬萬年。誰知我們過得好好的，白人偏要打將進來。自鴉片戰爭，經英法聯軍，中日之戰，八國聯軍，以至於其他種種文文武武的步驟，竟把我們的門戶，搗得一個落花流水。西洋全個文化如潮一般的湧來，把我們一塘的靜水，掀起無限風波。我們起初還想抵抗，到後來抵抗也沒有力量了。西洋的全個文化，跟着他們的武力和商品戰勝了。我們的全個文化，隨着外交軍事的失敗，而根本動搖了。我們不能堅持舊的，其勢不能不變。變的結果，便是像在黑漆一團的紛亂，便是中國問題的發生。

第六章　中西接觸後政治上的變化

政府是最上層的組織，最容易發生變化。而中國與西洋的接觸，又是以政府首當其衝。外國要向我們中國取得什麽利權，當然不便找我們四萬萬人民說話，只有去問代表我們中國的滿清政府。中國政府沒有如意滿足他們的要求，並且甚至於把他們當做以前的匈奴、契丹、土蕃、回紇、等一樣看待。他們用文的外交方法，不能請中國開門，便用武力打將進來。一次不夠，又二次；二次不夠，又三次，四次……。這樣一來，不但把我們中國政府的腐敗，庸弱，無能，簡直暴露無餘；並且把我們中國的全個政治基礎，搖得非動不可。因此，中西接觸以後的變化，第一在政治方面。

（一）　變化的開端與洋務的講究

一八四二年鴉片之戰，我們中國雖然被打敗了，但是我們爲着四面閉塞，向來

很少與外國接觸的緣故，非常自尊自大，保守性成，那肯輕易就瞧得起這些初到中國來的『西洋毛子。』卽是一次戰敗，也不過稍爲失事，並沒有影響全局。我們何必大驚小怪，挫自己的志氣，長他人的威風，把數千年的『文明古國』去學那些『蠻貊之邦。』因此，碩大的中國，還是像一隻睡獅子一樣，懶氣洋洋的，沒有什麽覺悟。

到了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英法聯軍兩次進攻，我們中國兩次都『棄甲曳兵』而走，甚至連京城也不能保住，我們才慢慢的知道西洋各國不易對付，非以前那些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可比。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那班人，因爲在軍事上外交上與西洋的接觸多一點，所以感到西洋勢力可怕的程度也深一點。他們在平定洪楊之亂的時候，便知利用外國軍火，及外國將弁如華爾，戈登等人。及洪楊平定以後，他們便知提倡所謂『洋務。』

但是他們所謂『洋務，』不過是造船、造械、購船、購械、築砲臺、軍港、修鐵路、辦招商局、設電報局、開織布廠等等竊學西洋皮毛的辦法而已。就是興學堂，派留學生，也不過是爲養成軍事，交涉，或翻譯的人才起見。至於根本上，採用西洋的政治，介紹西

洋的文化，他們從來沒有想到。據說德國宰相俾斯麥早就看透中國的辦法不澈底，曾對人說過：『中國和日本的競爭，日本必勝，中國必敗；因爲日本到歐洲來的人，討論各種學術，講求政制原理，謀歸國爲根本的改造，中國到歐洲來的祇問某廠的船砲造得如何，價值如何，買了回去使用就完事。』郭嵩燾在倫敦與李鴻章書，也勸他不要派留學生去單學兵法，應該學各種技能才是。由此看來，我們知道，當時那班談『洋務』的人，只看見西洋文明的皮毛，沒有看見西洋文明的精神，所謂『洋務』不過是些『隔靴搔癢』的辦法罷了。然而假使我們一回想當時大多數的聖子神孫，文人學士，還在那裏閉着眼睛，塞着耳朵，『一聞修造鐵道電報，痛心疾首，羣起阻難，至有以見洋人機器爲公憤者，』我們又不能不佩服那班談『洋務』者是我們的先知先覺了。

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因爲法國掠奪我們的安南，我們又與法國打了一戰，結果又是我們敗績。我們受了這種刺激，民間才發出一種要求根本改革的聲音。孫中山的決志推翻滿清，（一八八五年，）康有爲的上書變法（一八八九年，）便

是這種聲音的表現。但是這種聲音究竟非常渺小，只有極少數人在那裏吶喊着；至於普通一般人，還是不知不覺，『順帝之則。』到了一八九五年，因爲高麗問題，我們再敗於日本，情形才不同了。我們以前的對手都是西洋各國；因爲與他們面生，很難摸到他們的究竟，所以敗於他們，刺激並不深刻。至於日本，則爲我們素來瞧不起的『倭奴』；其土地的狹小，財源的乾涸，與文化的低落，都是我們所熟悉的，徒以效法西洋，『明治維新』之故，不出幾十年功夫，便可把我們偌大的個中國打倒，我們自然不免全國震動起來，發生兩種心理：一爲不滿意滿清政府，覺得實在有改良的必要；一爲覺得外國利害，有些地方有模倣他們的必要。爲什麼不滿意滿清政府？因爲滿清政府，在外交上和軍事上，着着失敗，喪權辱國，日甚一日，終至連區區三島的日本也招架不住。反觀日本政府，維新自强，振作有爲，怎樣不使一班先知先覺們起來要求改革，打破現狀，以西洋做模範？

(二) 戊戌的維新與庚子的反動

同時受了外交屈辱，內政腐敗的刺激，對於當時政府不滿意的人，因爲彼此見解的不同，分成兩大派別：一是主張變法維新，君主立憲，以康有爲梁啓超爲領袖。他們認爲要救中國，滿清不可推翻，推翻以後，恐失卻維繫全國的中心，而釀成絕大的紛亂，不可收拾。所以他們先則擁護光緒皇帝實行變法；失敗之後，梁啓超又主張君主立憲，保存虛君，以鞏固傳統政治的中心，採行憲法，以適應民主政治的潮流。他們主張緩進，而不贊成急進；他們主張改良，而不贊成革命；總而言之，他們是新勢力中的溫和派。還有一派，主張民主革命，以孫中山黃克强章太炎爲領袖。他們認爲滿清政府，腐敗已到十二萬分，不可救藥，更不足與救國；而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非推翻不可。故這派可說是新勢力中的激烈派。

維新派的首領康有爲，與革命派的首領孫中山，都是生於與西洋勢力接觸最早，被西洋勢力壓迫最兇的廣東。他們所受外來的刺激相同，而反應的態度不同者，這又是什麼緣故呢？原來康有爲是生長於仕家，自己又是士大夫階級中人，受中國傳統思想的毒很深，故不敢把皇帝的偶像，丟到毛廁裏面去。至於孫中山，則爲農家

子弟，幼年不但受過新式教育，並且到過檀香山各處，故對於西洋文化的認識，自然比較康有爲進一步。

孫中山在一八九五年組織興中會，康有爲在一八九六年『公車上書』維新運動與革命運動，雖然是差不多同時發軔的，但是在當時的環境看來，維新派比較容易號召。孫中山所領袖的革命派，除祕密聯絡會黨外，沒有什麼人肯來參加。至於康有爲的維新派，因爲對於數千年來的君主制度，並不主張根本推翻；同時對於根深蒂固的傳統思想，也不願完全加以否認，所以對於一部分稍有覺悟的士大夫階級，很合脾胃。這部分士大夫階級，看見中國屢次失敗，實在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同時相信『君臣之義已定，天澤之分難越，』『食毛踐土，誰非臣子？』現在看見康有爲處處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澤，涵濡煦育數百年之恩，』又要維新來雪『聖清二百餘年之大辱，』那有不受他感動的道理？何況他自己是士大夫階級的一員，新由舉人中進士的新貴，說話又是根據六經演繹出來的孔子改制考及新學僞經考呢？無怪乎孫中山的革命派，要讓康有爲的維新派先試一下了。

維新運動到了戊戌年（一八九八）春夏之交，已經是到了最高點了。康有爲得到光緒皇帝的賞識，便挾天子來行所謂新政，如廢止八股，改試策論，辦理譯書局事務，删改各衙門則例，設立工商總局，裁汰冗官等等。不料這種運動竟觸怒了反動派，於是而有戊戌政變六君子被殺的慘劇。

這班反動派認爲康有爲等的政治思想，超出了傳統的範圍，瀆亂了『聖教，』連比較腦筋新鮮的翁同龢，看見他的新學僞經考，也要說他是『說經家的野狐禪』；看見他的孔子改制考，就要向皇帝說『此人居心叵測。』至於因爲變法而被打破飯碗的『數百翰林，數千進士，數萬舉人，數十萬秀才，數百萬童生，』更是怒髮衝冠，要與這班『其貌則孔，其心則夷』的『洋奴』『漢奸』算賬。梁啓超看透了他們這種心理，所以說：『今守舊黨之阻撓變法也，非實有見於新法之害國病民也。吾所挾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變而務實學，則吾進身之階將絕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資格；今一變而任才能，則吾驕人之具將絕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變而覈名實，則吾子孫之謀將斷也。……吾今日所以得內位卿貳，外擁封疆者，不知經

若干年之資俸，經若干輩之奔競，而始獲也，今既……不辦一事，從容富貴，窮樂極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謚文端，家財溢百萬之金，兒孫皆一品之蔭。若一旦變法，則凡任官者皆須辦事，吾將奉命而辦事耶？則既無學問，又無才幹，何以能辦。將不辦耶？則安肯舍吾數十年資俸奔競千辛萬苦所得之高官，決然引退，以避賢者之路哉……』

維新運動本來是一種自上而下的改良運動，抓住了庸弱無能的光緒皇帝，而沒有抓住陰險毒辣的寡婦慈禧太后；吸引了少數有點覺悟的智識分子，而得罪了大多數的統治階級。其失敗自然在意料之中。不過這種運動雖然是失敗，卻發生了兩種嚴重的影響，我們不能不注意：一是使反動派，看見變法的危險，更趨反動；一是使急進派看見和平方法的失敗，更趨激烈。於是前者便演出義和團之亂，後者便演出辛亥革命。現在再讓我們說出戊戌變法維新所激出的反動運動來。

康梁的變法維新運動，雖然開口『公羊，』閉口『孟子；』不說『通三統，』便說『張三世，』其實老實說，他們不過是『託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實，』借至聖先師孔子的神位，去鎮服反對變法的迂儒。真是『其貌則孔，其心則夷。』這

種運動，雖然比較革命派可以號召一部分人士，但是究竟有傷我們自尊的心理，保守的習慣。大多數的士大夫階級，做慣了家奴走狗，裝滿了『詩云』『子曰』眼光有如老鼠，膽量更像鴕鳥，以爲碧眼金髮的西洋人，還是以前的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康梁不去用『夏變夷』已是可惡；反而主張自『變於夷』更是可殺。這是反動派要反動的第一個原因。

加以，外國着着進攻，重重壓迫，中日之戰以前，已經把我們的門戶，打得洞開；中日之戰以後，更是生吞活剝，想把中國豆剖瓜分。德租膠州灣、俄租旅順大連、英租威海衞、法租廣州灣、英又租九龍、這都是我們受帝國主義鐵蹄的傷痕。以自尊自大的民族，受這種空前的恥辱，自然是全國同憤，上下切齒。何況這班『吃教』的基督教徒，到處狐假虎威，驕橫跋扈，怎樣能叫一般人民不發生排外的心理？

還有，自五口通商以後，外國的經濟侵略，無微不入。他們以科學的方法，機器的製造，工廠的制度，雄厚的資本，大批的生產，來與我們的家庭手工業競爭，自然是『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把我們的生產制度，着着破壞，把我們一般平民，逼進失業

一途。兼之，對外對內用兵，軍費賠款，取之於民；橫征暴斂的結果，更是民窮財盡。軍事完了之後，兵勇的解散，潰卒的流亡，又是社會上多一寄生階級，經濟上多一種嚴重負擔。並且人禍之外，復有天災：自光緒卽位以來二十餘年間，年年不斷，不是水災，便是旱災，尤以北方幾省爲甚，間接直接無不是擴大失業的民衆，增加經濟上的恐慌。握有權力的親貴，搾取了人民的膏脂，自然不感覺生活的壓迫；就是一班士大夫，上而仰拾親貴的牙慧，下而俯吸人民的血汗，也可以安然過去，感到經濟壓迫的很少。只有一班失業及窮困的老百姓，不能聊生，才感覺十分痛苦。他們沒有受過教育，愚昧無知，認爲他們所受的厄運，都是外國人所賜與。修鐵路，開礦山，把我們的風水挖斷了。設教堂，奉上帝，把我們的祖宗得罪了。如果我們要逃出這種厄運，那麼非把這班跑到中國來搗亂的『洋鬼子』驅逐不可；把那班勾結洋人，信奉洋教，提倡洋學的『二毛子』殺盡不可。

但是怎樣去『滅洋』？『洋』不是容易『滅』的。洋人有鎗、有砲、有兵艦、屢次對我們表演過他們的利害。我們沒有他法，我們又素來極端迷信，於是我們只好借

封神西遊那些通俗小說上的法寶神怪，來欺騙自己，愚弄人家；經過羣衆心理的作用，便釀成義和團的運動。慈禧太后及一班反動派，自戊戌維新運動以後，不但痛恨康梁，並且遷怒外國人。因爲康梁所謂變法，乃是效法西洋，康梁所謂維新，乃是要學西洋。慈禧太后等既然反對變法維新，自然對西洋沒有什麼好感。何況康梁的逃亡，有外國爲之保護，使慈禧太后欲求之而不得呢？無怪義和團的『扶淸滅洋』的口號，打動了慈禧太后及一班反動派的心懷了。

於是，慈禧太后垂簾聽政之日，便是反動局面展開之時。戊戌百日的新政，無不一一『壽終正寢』。裁去的衙門官職，仍復原位。廢止的八股文章，仍須復活。學校改回書院。新政一齊掃除。甚至變本加厲，禁止上書言事，禁止結會辦報。而獨對於義和團運動，放任之，獎勵之，以至造成八國聯軍的滔天大禍。董福祥的甘軍與若干萬的『義民』拿着火牌，飛劍，雷火扇，陰陽瓶，九連環，如意鈎，引魂旛，混天大旗，八寶法物，僅僅殺了一個毫無防備的德國公使，竟不能攻破東交民巷的公使館。而聯軍卻由渤海佔大沽，陷天津，搗北京，有如秋風掃落葉，打來毫不費力氣。反動禍首慈禧太后

也只好溜之大吉了。這幕反動活劇的結果，中國所得到的處罰，又是『割地賠款，喪權辱國』八個大字。不過從此以後，我們上上下下對於外國，只有『甘拜下風』了。

(三) 君主立憲的失敗與民主革命的成功

義和團之亂與八國聯軍之役，把中國的弱點，淸廷的腐敗，又暴露一次，而且暴露得無遺。保守派就是要守舊，反動派就是要頑固，也覺得實在無理由可說了。所以反動罪魁的慈禧太后，在逃走的路上，便下詔罪己，並求直言；到了西安，又下詔變法；回到北京，更逐漸把戊戌百日的新政，重新一樣的一樣的搬了出來。中國到了這時，確實承認自己不如西洋了。

在義和團之亂以前，大多數人雖然是痛恨外國，但對於滿淸政府，還不敢藐視。自經這次滔天大禍以後，政府的腐敗昏庸，都已現出原形，大多數人慢慢的把痛恨外人的心理，移到淸廷身上去了。越感覺外人的可怕，越感覺淸廷的無能。滿淸政府的信用，至是掃地盡矣。在庚子以前，還有許多人，反對變法維新；在庚子以後，再也沒

有人敢出來反對了。現在所成爲問題者，就是看怎樣『變』法而已。

維新派自從戊戌政變以後，首領亡命外國，暫時銷聲匿跡。到了此時，梁啓超又崛起主張君主立憲，風行一時，凡傾向於溫和手段的人，多半站在他的旗下。戊戌的維新運動，自然是康有爲的首領，但是庚子以後的立憲運動，我們不能不推梁啓超是最有力的代表了。尤其是到了日俄戰爭，日勝俄敗，立憲運動，更受了很大的感動。你不看嗎？日本以前和我們一樣受西洋的壓迫；因爲政治上採行了君主立憲的制度，居然一戰打倒了碩大的君主專制的中國，再戰打敗了碩大的君主專制的俄國。這非立憲的效用如何？於是『立憲』『立憲』之聲盈天下。

就是統治階級裏面，握有大權的要人也有奏請立憲的。一九〇五年，清政府便派了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以爲立憲的準備。一九〇六年，這幾位考察大臣，『走馬看花，』在各國溜了一場回來，也奏請立憲，於是御前會議，決定下詔預備實行憲政，先從改良官制入手。若是這時清廷確有誠意，那麼或者還可挽救於萬一。無奈慈禧太后並無真正悔禍的決心；她不過想借預備之名，行遷延之實罷了。至於滿清貴族，

及漢人大官，也各有各的鬼胎。滿清貴族，想乘改革官制的機會，排斥漢人，集權中央，以免尾大不掉。漢人大官也想用立憲政治，限制滿人的特權，增高自己的地位。所以這種御用的立憲運動，與民間梁啓超所主張的立憲政治，毫不相關。梁啓超的立憲派，就是想要在國內公開活動，也無機會。其受政府的壓迫，與孫中山等所領袖的革命派，不相上下。

滿清政府既沒有立憲的誠意，而所頒布的大綱，又給君主無限制的權力，並且對於民間的運動，絲毫不放鬆壓迫的手段，人心自然大失所望，相率傾向於革命一途。加以一九〇八年慈禧太后與光緒皇帝一死，政治失卻中心，大權旁落權臣，革命潮流，於是愈演愈急。君主立憲派，一面既不能得到統治階級的垂顧，反受當局的壓迫；他一面又受革命派的攻擊，沒有羣衆作後盾。在這雙方夾擊，兩面不討好的情形裏面，只有歸於失敗。

反之，革命派雖然是歷盡困苦艱難，但是勢力的飛騰，與滿清的腐敗，及西洋潮流的來到，成正比例。清政府愈失政，革命派愈發達；西洋潮流愈湧來，革命勢力愈增

加。到了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便使清廷不能收拾了。袁世凱從小站練兵所養成的實力派，從旁加以一推，推二百六十餘年的清代天下，便宣告『壽終正寢』數千年來的君主偶像，便倒在溷廁裏面。從此『真命天子』不臨朝；萬里江山改顏色。這是多麼大的一個大變化！

（四）民主共和的虛僞與軍閥制度的演成

辛亥革命，把滿清推翻了以後，便發生一個空前的問題，卽是政權的轉移。在我們過去的政治看來，所有政權，都屬於皇帝一人，老百姓不能過問。就是更朝換代，也不過是這家的天下，被那家奪去；這個皇帝的江山，被另一個好漢搶走。皇冠的誰戴，與寶座的誰坐，與我們一般人民是毫不相干的。我們的傳統思想，把我們的腦筋，緊緊的桎梏，不但是不要我們去干涉政治，並且要我們擁護君主專制。所以只要有一個大蟲出世，把其餘的小蟲吃掉，稱孤道寡起來，那麼我們便可誠惶誠恐，服從一切。

但是辛亥革命，卻與從前更朝換代的老把戲有點不同了。辛亥革命在政治上

的意義，是要把君主專制政體，改變到民主共和政體，所以中華民國臨時約法的第二條，便說『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在武昌沒有起義以前，革命派與維新派，因爲受了西洋民主主義的影響，對於中國從前不可侵犯的偶像，已經破壞到相當的程度。在武昌革命成功以後，滿清一倒，連主張保皇的梁啓超，也說君主的偶像，已經被丟在溷廁裏面，再也沒有號召的力量了。

我們知道，中國以前的全個政治組織系統，完全以君主爲中心，而且君主專制政體，到了滿清，更是進化到了極點。現在我們一旦把君主踢倒，政治的中心，當然隨之失落；中心一失落，又無新的民主中心勢力起來代替，結果，當然要釀成二十年來，掛名共和，軍閥混戰的怪現象。

原來，君主政體這個東西，在中國經過幾千年的歷史，並且有傳統思想爲之辯護，所以發生了一種神祕的力量。人民對牠，認爲是天經地義，好像迷信菩薩一樣。菩薩本來是泥塑木雕的，一經香花蠟燭供奉，便變成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以前政府能夠維繫社會人心，就全靠這個紙老虎嚇人。若是前清不是滿族，而是漢族的天下，

君主立憲運動，比較民主革命運動，或者成功機會要多。因爲那時革命的對象，多是注重在排滿。一般革命人物，大都只知滿清是異族，非推翻不可；而不大注重君主與民主在制度上的分別。其所以反對君主，也多由於排滿的聯帶關係。假使前清不是滿族，而是漢人，恐怕民主革命運動沒有那麼大的號召力量。君主立憲派之所以失敗，也就是沒有看透這一點。他們不知道君主與滿清是分不開的：擁護君主，便是擁護滿清；擁護滿清，便是擁護異族；擁護異族，便是根本違反漢人的心理；根本違反漢人的心理，而要漢人起來贊助這種運動，當然是要失敗的。反過來說，推翻了滿清政府，無異推翻了君主政體。因爲滿清一倒，君主的偶像，也連帶的拖下廁所裏面，失卻所有的尊嚴與神祕作用。並且西洋民主主義的潮流，日益川流不息的奔來；人民政治智識漸漸開展；不但對於君主的傳統思想慢慢在那裏洗掉；而且民主觀念，也在那裏日積月累。所以袁世凱想做皇帝，張勳想復辟，都沒有成功。

破壞一件事比較容易，建設一件事比較困難。君主專制政體雖然已經打倒，民主政治卻是很難實現。在此靑黃不接的時代，當然產生一種『君不君』來『民不

民』的怪政治現象。這就是軍閥制度及其紛亂的最大原因。一班軍人，因爲武力是一切問題最後的解決，變成了時代的驕子，既沒有君主的偶像來節制，又沒有傳統的思想來約束，（因爲漸失效用）人民參政能力沒有養成，民主政治不能樹立，那有不成『閥』的道理？

且看滿清倒了之後，民主革命勢力不能自身起來組織政府，而必須讓政權於袁世凱，便可知道民主共和的制度，是沒有深厚的基礎了。袁世凱本來就是具有最大野心的一代梟雄。小站練兵，便是他埋下的武力基礎，也卽是北洋軍閥的胚胎。在戊戌政變的時候，他便騙過君主立憲派，以致變法失敗，六君子流血。到了辛亥革命，他自己雖稱病在彰德故鄉，但是他的部下已握有兵權，清政府環顧國中，要壓平亂事，非請他出山不可。他認爲機會已到，故作忸怩，要求大權。及大權到手之後，他一面逼滿清退位，一面逼革命派讓渡政權，於是不費多少力氣便爲民國第一任總統。

袁世凱雖是『謹掬誠悃，誓告同胞，』『竭其能力，發揚共和之精神，滌蕩專制之瑕穢，』但他是沒有受過民治與法治洗禮的人，腦筋裏面還是充滿了封建思想，

與帝制自爲的野心。所以他『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根據人治的封建辦法，佈置他的部下軍人，好像以前的開國君主一樣。這樣一來，便成了所謂北洋派。我們知道北洋派，沒有公開的政綱，沒有正式的組織，當然不是一個政黨。牠的基礎，完全建築在個人政治的關係上。袁世凱是北洋派的首領。他對於其餘的部下軍人，是封建的關係。其餘的軍閥，多是從他在小站練兵練出來的，也是他一手提拔出來的，所以他們只知效忠於袁氏，而不知效忠於民國。換句話說，他們只知向袁氏負責，不知對國民負責。

袁世凱壓平了二次革命之後，以爲個人統治，已經穩定，於是而解散國會，於是而毀棄約法，於是而宣布洪憲，要重新回到君主專制的路上去。但是我們知道，中西接觸以後，中國的君主政體，已受西洋民主主義的痛擊；中國的人治主義，也受了西洋法治主義的影響。凡所以維持以前那種君主的人治的，封建的倫理思想及道德觀念，都已被西洋潮流所浸潤毀壞。一班軍閥雖不相信民主，不相信法治，不相信西洋的政治道德，但同時不能像以前那樣的忠於一人，忠於一家，如家奴走狗一般，所

以雲南一起義，北洋軍閥也相繼的衆叛親離。袁世凱料不及此，終至氣死。

袁世凱一死，北洋派便羣龍無首，好像一串珠子，斷了線索一樣。於是其中分成直皖兩派。直皖兩派的系統，又是如以前北洋總派一樣，建築在個人封建的政治關係上面。直派先以馮國璋爲首領。後以曹錕吳佩孚爲首領。皖派則以段祺瑞爲首領。同時在全國全體看來，因爲北洋派本身的分化，政治失卻了重心，於是東北的奉派，與南方各省的小派，漸成了獨立的狀態。全國遂日趨分裂，而不可收拾。

有了幾派勢力，而各派勢力又都建築在個人封建制度之上，其間又沒有法定的關係爲之維繫，結果各派因爲爭取政權，擴張地盤的關係，只有訴諸武力，互相斯殺。南與南爭，北與北鬬；合縱連橫，毫無忌憚。不但全國政治，失掉了重心，即是南北兩方，也都失去了中樞勢力，於是從此而入於南北各軍閥的混戰時期。兼之，西洋的民主潮流愈是奔來，個人統治的系統愈靠不住。各個軍閥，一方面受了傳統思想的遺毒，本人野心的驅使，對於部下總想用封建的方法去維持他們的系統，擴張他的勢力；一方面又受了西洋新思想的鼓動，對於長官又不願效忠一人，並且時時刻刻想

進一步取而代之。這種思想上的矛盾，表現在政治上，便是對上面倒戈，對下面仍舊施用封建統治的方法。所以越到後來，叛變越多。旅長倒師長，師長倒督軍，督軍倒巡閱使。軍閥的系統，越趨越小；時局的分化，愈演愈烈。殘缺際留的封建勢力，與幼稚成病的民主勢力，交相醞釀，遂造成混沌的軍閥相爭相打的局面。

加以帝國主義者利用軍閥以攫取利權，軍閥利用帝國主義者以借款買械，互相勾結，內亂愈烈。每個大軍閥，都有帝國主義者做他的後援。每個帝國主義國家，都有軍閥願做牠的爪牙。有時因爲國際間利害的衝突，影響到國內軍閥的衝突。相爭相殺，如鬬蟋蟀。所可憐者，便是一班孤苦無告的人民，不斃於槍彈之下，即死於溝壑之中耳。

（五） 國民黨的專政與共產黨的暴動

由上面看來，我們知道，中國因爲君主遺毒沒有消盡，民主觀念沒有養成，所以名爲共和政體，實爲軍閥專政。而所謂軍閥，又因爲受了新思想的影響，不受舊倫理，

舊道德的約束，於是日趨分化，而成爲軍閥割據，互相砍殺的無政府狀態。

到了一九一七年，一個新時期在中國發動了。我們知道，自戊戌維新運動以來，一班救國之士，都着眼於政治，以爲政治一好，其他都好，所以他們在辛亥革命以前，不曰君主立憲，便曰民主共和；及辛亥革命以後，不曰總統制，便曰內閣制，所有的政論與政黨的活動，很少與一般社會發生關係。到帝制運動的終了，護法運動的開始，中國軍閥混亂最劇烈的時候，有少數智識階級，看見中國問題，如單從政治方面着手，如理亂絲，愈理愈亂，不如從別方面給牠一個澈底解決。所以先則主張文學革命，次則提倡新文化運動。文學革命的結果，把文言文的權威打倒了，白話文的用處普遍了，在文體上的確是一種解放，一種改良。不但發表自己的思想，用白話比較容易；並且了解人家的思想，看白話也比較方便。於是由文體解放，進展到思想解放；由文學革命，進展到新文化運動。舊的觀念、思想、及標準都被根本的搖動，而趨於崩潰；新的思想，便如潮水一般的湧來。中國那時真像餓老虎一般，急不暇擇，見到東西便拿來吃。於是各種思想及主義，便如雨後春筍，表現一種蓬蓬勃勃的生動氣象。

適當其時，俄國革命成功，把世界上最專制的政府推倒，把現行的社會制度，一概否認。其影響於人類的歷史，當不在法國大革命之下。我們中國地勢上與俄國相接，並且是蘇俄東方政策的對象，尤其是容易受此種革命潮流所波及。何況接着就是德國的革命，以及其他各國的政變。所以，在歐洲大戰終止的時候，全世界無處不充滿了革命空氣。我們中國思想界正在變動，際此時會，那有不風雲變色的道理？

思想上一解放，自然要影響實際的社會活動。所以到一九一九年，北京學生因爲山東問題，便起來打倒曹章陸三個賣國賊，鬧到全國學生罷課，商民罷市，工人罷工。這就是所謂『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直接効果，不過是罷免了曹章陸三人，拒絕簽字凡爾賽條約；但是牠在中國歷史上，的確有重大的意義。別的方面，姑置不說，且說牠給予中國政治的影響。第一，五四運動，激起了比較普遍的愛國運動。從前的維新運動，不過是一部分士大夫階級的運動；以前的革命運動，不過是一部分留學生華僑的運動。現在的五四運動，則普及到學生工人，商民各階級；牠的打倒曹章陸，便是反抗軍閥的賣國外交；牠的反對簽字凡爾賽和約，即是反抗不平等條約，也即

是反抗帝國主義。第二，五四運動激起了民衆參加政治運動的興趣。以前的政治，都是少數政客軍人的特殊把戲。他們玩來玩去，總脫不了一個很小的範圍。五四運動表現了民衆參加政治的力量，居然可以挾迫當時的政府，拒絕簽字和約，罷免曹章陸三人。於是從此以後，每遇外交問題發生，學生團體，即有一種表示。第三，五四運動激起了民衆大規模的組織。從五四以後，全國各省，各都會，都有學生聯合會，而且又有一個全國總會。其他如工會，商會等等，也有長足的進步。

因爲文學革命，宣傳便有了白話的工具；因爲新文化運動，思想上便開了一條大路；因爲民衆有了組織，政黨可以找到新的基礎。同時俄國赤化政策在西歐失敗的結果，於是傾其全力來經營遠東。優林越飛等相繼來華，第一步是利用中國少數智識份子及青年學生作共產主義的宣傳；第二是組織中國共產黨。那時候，中國內有軍閥的混亂，外有帝國主義的壓迫，民不聊生，正是想找一條出路。共產黨自能很快的發展。

那時候，國民黨的領袖孫中山，一面看見國民黨本身的暮氣沉沉，一面看見五

四運動以來的新政治趨勢，再一面看見共產黨都是一班青年，有很好的組織，爲擴張本黨勢力起見，於是有容共的主張。

還有一層，孫氏以前雖時常想與歐美以及日本各國聯絡，但總是被這班白色帝國主義的國家拒絕；憤慨之餘，看見蘇俄派人來與他表示親善，他自然認爲是最好的朋友。於是有聯俄的主張。

我們知道共產黨的策略，是階級爭鬬，階級革命，階級專政。共黨當然是要抓住工農階級，去打倒資本階級，所以農工運動，是共產黨所必取的政策。國民黨既決定聯共聯俄，而又想找新路去走，當然不能拒絕共產黨從事農工運動的辦法。於是國民黨所謂聯共聯俄，聯農工三大政策，便成了『三位一體』『連環性』的東西：要這個，便不能不要那個。舍這個，便不能不舍那個。

同時在共產黨方面看來，因爲牠本身在中國根基沒有穩固，而又知道共產主義在中國不易進行。現在有一個歷史比較長久的政黨，來做護身符，一面可避外間的攻擊，一面可赤化國民黨，又何樂而不爲？況且蘇俄與孫中山已接洽妥當，中國共

產黨更無反對餘地。

因此，民國十二年國民黨在廣州改組的時候，正式允許了共產黨加入。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又是中國政治的一個大關鍵。牠的起源，是因爲上海有十幾個工人、學生被英國巡捕開鎗打死，於是全國同憤，充滿了愛國的情緒，與排外的心理。國民黨共產黨以及各種青年團體，都乘機積極活動，雖然大家叫的是打倒帝國主義，但是各派有各派的解釋，各派有各派的用意。國民黨更乘五卅運動的餘波，於民國十五年出師北伐。

當時一般人民受久了北洋軍閥的壓迫與紛亂，又受了外國的侵略與欺侮，早已不勝其憤慨，所以對於國民黨的北伐，表示歡迎。國民黨的軍隊，因爲人心所向，而又富有朝氣的關係，到處勝利，把吳佩孚孫傳芳兩大軍閥，先後敗走，到了民國十六年春季，長江流域，都是國民黨的天下。但是我們要知道，那時國民黨的軍隊在前方打仗，共產黨便在後方包辦各種民衆運動。所以凡國民黨軍隊所到的地方，也就是共產黨勢力所及的地方。結果下層組織，都落到共產黨手裏面去了。

國民黨有一部分領袖，不堪共產黨的壓迫，於是起而作反共的運動，在南京建立另外一個政府。其後武漢派的國民黨，也不勝共產黨的壓迫，而與共黨分家。於是國共兩黨，乃完全斷絕關係，各走各路，而成爲『不共戴天之仇。』

共產黨自與國民黨分家之後，失卻活動的憑藉，於是挺而走險，採取暴動政策。星星之火，成爲燎原。加以內亂層見迭出，天災時常流行，人民『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蓄妻子，』連自己也『不免於死亡，』於是逼進共產黨者日多，而共產黨滋蔓難圖矣！

至於國民黨，則從打倒北洋軍閥以後，卽根據訓政的『遺教，』實行一黨專政，將異己的思想，團體，及個人，概行壓倒。不過自『九一八』國難發生以後，因爲對外關係的緊迫，國際間法西斯主義的流行，及國民黨內部的演變，一黨專政的局面又有轉入個人領袖政治的趨勢。

（六） 結論

中國的君主政體，行了幾千年不成問題，忽然打開門來，遇見了西洋民主主義的潮流。若是我們的專制政體，能夠抵抗得住，那麼還不礙事。那知道我們一戰而敗，再戰而衰，三戰而氣餒，四戰便不能不變法了。起初我們原想調和中西，採行君主立憲，一面顧到中國過去的政治背景，一面適應西洋的民治趨勢。但是自從戊戌維新運動失敗以後，此着便走不通了。因此，我們想另外走過一條路子，用革命的方法，去建立共和的政體。不幸專制的遺毒未消，民主的勢力未成，雖辛亥推翻了滿淸，然民國仍不成其爲民國，於是而有軍閥制度，於是而有一黨專政。凡此種種，都是有靑黃不接的現象，也或者是過渡時期不可逃避的現象。我們旣不能立刻趕上西洋的路，又不能回到我們原來的狀態裏去，在此時會也許免不了種種奇奇怪怪的現象。

這種從君主專制到民主共和的變化，若沒有外國從中搗亂，恐怕還不至發生這樣大糾紛。但是在此交通便利的世界，我們地大物博的中國，怎能避開帝國主義的注意？因此，在我們演變的政爭裏面，外國總要來玩玩把戲。遠的歷史我們且不去說，試看民國成立以後，那次大的政爭沒有外國勢力在後面？因爲爲五國銀行團的

大借款成功，於是袁世凱不惜破壞國民黨，帝制自爲。因爲日本乘歐戰的機會，想推倒袁氏，宰制中國，於是反袁各派得着援助，能夠將洪憲打倒。因爲日本援助段祺瑞，於是有護法的長期戰爭，南北的對峙局面，軍閥的割據形勢。因爲蘇俄利用國民黨與共產黨，於是國民黨有聯共、分共、反共的種種紛擾。總而言之，中國政治一旦從君主變到民主，本來困難，不免糾紛；現在又再加上帝國主義的勾結利用，於是紊亂得更不堪言狀了。

並且政治與經濟是分不開的。我們中國原來是農業社會，生產非常落後，資本非常缺乏；加以人口太多，僧多米少，就是外國不來搗亂，恐怕自己也要砍殺一場。何況西洋與我們通商之後，他們挾科學的智識，機器的發明，雄厚的資本，工廠的制度，來製造物品，與我們的家庭手工業競爭，那有不勝利的道理？結果，我們的手工業，一天一天的崩潰；失業的人數，也隨之一天一天的加多。政府不但不能保護本國的生產事業，並且橫征暴斂，無所不爲。兵災之外，又有天災，禍亂相循，民不聊生。於是一般失業窮困的人民，便成爲軍閥政客政爭的工具。我們且拿軍閥政治來分析，便知牠

與社會窮困的關係。

軍何以能成閥？武的方面，必定要有丘八大人；文的方面，定要有官僚政客。俗語說得好：『好鐵不打釘，好人不當兵。』我們民間既有這種反對當兵的心理，爲什麼那班軍閥，可以用白旗一搖，招得成千成萬的丘八，來替他們衝鋒，陷陣，爭地盤，搶政權？這班弟兄們，一月賺幾塊大洋，還時常幾個月不發餉，難道願意做這種殺人的勾當，或被殺的緜羊嗎？無奈迫於生活，沒有他事可做，不得已而把肉血獻於軍閥的刀俎之前而已。文的官僚政客，生活似乎比武的傭兵好得許多，但是生活上沒有出路，同是失身於軍閥的可憐蟲，那是沒有兩樣。他們之所以喪心病狂，不顧國家的利益，人民的痛苦，爲軍閥畫策，奔走，挑撥，離間，發宣言，打電報，做代表，無非是靠所依附的軍閥吃飯而已。

從前中國的政治，雖然是腐敗，但是還有舊道德，舊倫理，舊禮教，爲之限制。到了現在，舊的東西，都被西洋來的潮流，衝得粉碎，而新的道德紀律又沒有成立，於是自私自利，專制橫暴，更加盡形畢露了。

最後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因。爲什麽中國與西洋接觸，失敗幾次，便鬧到這種地步？爲什麽法國在一八七〇年，被普魯士打得落花流水，割地賠款，不久又爬起來了？爲什麽最近的德國被協約國打敗，受了嚴重的處分，並且發生過很大的革命，不到十年，又是一個强國？這又是什麽緣故？於是我們最後不能不承認我們全個文化的落後了。法德之所以蹶而復起者，乃是因爲他們的文化，有鞏固的基礎。儘管他們在軍事上，外交上，受了挫敗；這不過是暫時的挫敗，表面的挫敗。他們仍可運用他們文化的基礎來重新建築他們上層的組織。至於我們中國。雖自稱『文明古國，』但是與近代西洋一比，我們實在不能不承認野蠻了。胡林翼是中國智識階級的第一流人物，看見兩隻洋船衝入長江，駭得『變色不語，勒馬回營，中途嘔血，幾至墮馬，』除了『搖手閉目，神色不怡』的說，『此非吾輩所能知也』以外，別無辦法。到了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之亂，大多數的智識階級領袖，翰林，學士，御史們，還相信『八寶法物』可以抵鎗砲，『洪鈞老祖，已命五龍，守大沽，夷兵當盡滅。』就是到一九三五年的今日，還有朝野要人在那裏提倡唸佛誦經『阿彌陀佛式』的救國！然則，中國政

治上的一筆糊塗賬，從昔日的皇帝時代，到今日的流氓世界，又不能算在那一黨一派人的身上了。

第七章　中西接觸後經濟上的變化(上)

(一)　經濟侵略的動機

政治革命鬧了幾十年，鬧得昏天黑地，三個打出，四個打進，只殺得血流成河，白骨遍野；而結果呢？固然大清帝國的招牌，表面漆上了中華民國的字樣，但是除此而外，又有多少意義？何況以前的宣統，又變成了現在的康德？

倒是不令人注意，沒有機關鎗大砲對打的經濟革命，革了許多新花樣出來。你看大都市的出現；人口的集中；農村的崩潰；由家庭工業到工廠工業；由手工製造到機器製造；由鎖國經濟到世界經濟；由小商店到大公司；由錢莊、票號、到銀行；由轎子、驢車、單輪車、木船，到汽車、輪船、火車、飛機、電報、電話；由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簡單生活，到洋樓、大菜、電影、跳舞、無線電、留聲機的享受。那一件不是顯著的變化？那一件不

是在改變人們生活的方式與思想?那一件的影響不是由沿海一帶逐漸深入內地的民間?

然而，我們要知道，這些新花樣並不是我們自己發明的，乃是中西接觸以後西洋人帶來的禮物。

西洋人跑到我們中國來，說來話長，但決非產業革命以後的事。他們因為地理的發現，民族國家的向外發展，宗教革命所激起的競爭傳教運動，以及夢想我們東方的絲、繡、香料、珠石、象牙、雕刻之類，早就不遠萬里而來。不過起初他們與我們通商，能供給我們的東西很少，要買我們的東西倒很多。在十六世紀的時候，我們的絲、絲織品、棉織品、銅器、漆器、瓷器、及皮貨，都被大宗的販去。後來茶葉更是中外通商的主要物品。反之，他們能供給我們的東西，只有些金屬品，洋參、毛皮、銀元、以及後來的鴉片而已。這些都非我們所必需，所以我們很不願意與他們通商：第一，制定了許多規則，限制他們；第二，只開放了廣州澳門做中外通商的地點；第三，凡外國商人與中國商人的來往，都須經過行商。

西洋各國，因爲與我們通商有利可圖，所以不管我們願意不願意，總要跑來。尤其是十八世紀末期產業革命發生以後，他們利用機器大批製造的結果，逐漸要向國外找市場，以暢銷剩餘的物品；找原料，以供給工廠制度的需要；找投資的機會，以利用剩餘的資本。產業革命先進的英國，當然特別着急，所以不惜三次派代表來要求締結通商條約。第一次在一七九三年，以馬卡萊 Marcartney 爲領袖；第二次在一八一六年，以愛母赫斯脫 Amherst 爲領袖；第三次在一八三四年，以納皮爾 Napier 爲領袖。三次都帶了許多禮物而來，三次都不幸碰着釘子而去。

西洋各國，看見我們不願意與他們通商，只好強迫與我們做買賣，經過屢次的戰爭，把我們全國的門戶，由南而北，打個粉碎。他們的工業製造品與剩餘資本，遂如排山倒海的湧來，把我們全個自供自給的經濟逐漸破壞。

(二) 不能抵抗的原因

爲什麼我們的經濟組織經不起歐風美雨？爲什麼我們的工業不能與西洋的

工業對抗？這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我們的生產制度本身不如人家；二是他們有不平等條約來做經濟侵略的護符。

我們原來的工業制度，與他們的工業制度比較，簡言之，有下列幾個差點：（一）我們的工業是用手工製造的，他們的工業是用機器製造的。機器一點鐘所做的工，等於數十百人一點鐘所做的工。其效率，兩相比較，何啻數十百倍。因此手工業不但產額很小，並且成本很大。以產額小成本大的手工業，與產額高成本小的機器工業競爭，那有不失敗的道理？（二）我們的工業總是遵古法制，憑着傳統的經驗，不知改良；製出來的東西與數百年前一樣的粗笨簡陋。西洋的工業，則利用科學，日新月異，精益求精，相形之下，一般人自然歡迎洋貨，厭棄土貨。土貨便逐漸被擠出市場，不能立足。（三）我們的工業，不過是農業的附屬品，範圍很小，與商業時常混合一起。我們沒有雄厚的資本做工業的基礎；沒有敏捷精密的商業組織，去發售製成的貨品；沒有普遍動人的廣告，去引起消費者的注意。反觀西洋工業，實際支配全個社會生活。他們有各種銀行去活動資本，並且可以根據公司營業的組織，招集雄厚的資

本；有了資本，製出貨品以後，有極靈敏的商業組織去推銷；有輪船火車去轉運；有精製的廣告去引人注意。總而言之，西洋的生產制度，不但效率高而且貨品好；我們的生產制度，不但是出品有限，並且很不雅觀。兩者相遇，當然是『優勝劣敗，適者生存』。

若是我們中國是個强國，我們還可以用政治的力量，提高關稅，阻礙洋貨的侵入，保護自己的產業，但是屢戰屢敗所結下來的不平等條約，不但不能保護國貨，而且是保護洋貨。於是洋貨的奔向中國，更『沛然莫之能禦』了！

何以見得？且舉出列强由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幾種重要特權爲證。經濟上，如關稅協定，商埠開放，沿岸貿易，內河航行，外國在華設立工廠等等；政治上如租借地，租界，領事裁判權，外國軍隊駐紮權，及外國軍艦出入權等等，無一不是直接間接推進洋貨，打倒國貨的。

原來規定關稅的原則有兩種：一種是自由貿易，一種是保護政策。若世界各國都是採用自由貿易政策，以己之所長，補人之所短，原是大家有利。但是照現在的情形，列强都採取保護政策，就是英國，也放棄了自由貿易。若有一個國家，尤其是工業

未發達的國家，不能保護其工商業，仍舊採取自由貿易，那一國便變成列强競爭的商場，那一國的工業便永無發達的時期。中國的情形，正是如此。但是中國爲什麼一向不能保護自己的工商業呢？因爲中國的關稅在過去均由列强協定。列强協定中國的關稅起於一八四二年與英國訂的南京條約。一八四三年的附加條約，雖然已經大致規定值百抽五的稅率，但是還有值百抽十的事實。到了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才明白確定不管輸出輸入一律值百抽五的辦法。後來雖然改訂了幾次貨價，但是因爲實際的貨價騰漲不已，結果所謂值百抽五者，可憐不過值百抽三四而已。

這種關稅，既不分輸出與輸入，又不分奢侈品，必需品，及原料品，都是同樣的從價課稅。以致本國需要的洋貨無法表示獎勵；不需要的洋貨，無法實行抵制；本國落後的工業，更得不到絲毫的保護；若是中國的貨品到外國能得到同樣的待遇，倒也罷了。但是事實上，外國對於中國貨品的輸入，絲毫不予優待。

不但如此，根據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洋貨除交值百抽五的關稅外，祇要再納百分之二·五的子口稅，便可以通行全國，不受釐卡的留難與剝削。反之，中國自己

的土貨，運輸各處，不知要經過多少關卡，繳納多少稅金，歷盡多少阻礙。在這種情形之下，兩者在市場競爭，國貨自然要受淘汰。

海路如此，陸路更有所謂特惠關稅的協定。一九二八年國民政府雖與各國有新關稅條約的簽訂，在原則上得到了關稅自主的承認，但是在實際上還是有名無實。洋貨因此水陸並進，雙方夾攻，每年入超，少則幾千萬兩，多則幾萬萬兩。

至於海關管理權，原來是完整無缺。時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國軍佔領上海的時候，中國官吏逃入租界，海關無人管理，乃由英法美三國領事暫行代管。那知後來這種創例，竟變成了定制，海關管理權便落在外人手中了。外人管理海關雖屬認真，但華洋待遇不平，則爲顯然的事實。據馬寅初說，（見馬寅初演講集第三册第二百二十一頁）第一是驗貨估價之不平。洋商貨物，僅憑發貨單征稅，多不開驗。而華商所辦貨物，便不能享受這種免驗的權利，並且時常被誣爲少報物價，科以偷稅的罪名，輕則受罰，重則沒收。第二是報關待遇之不平。洋商每遇困難，到關一言，便可解決；華商因爲言語不通，種族不同，屢經聲訴，仍無結果。各種貨物，或因行市的漲跌，或因船

舶的多少，往往有提前放行的必要；在洋商，可以到關一言卽去，在華商非挨次不能放行。第三是海關用人之不平。自總稅務司以下，各關高級洋員，以英人居多數，重要職務完全在洋員手中；中國人都是充當下級職員。

照世界各國的慣例，外國船舶，只能在海港貿易，不但內河不開放，就是沿岸貿易也在禁止之列。列强在中國便不然。在一八五八年的天津條約裏面，我們就承認了英國船隻在長江一帶口岸可以通商，後來又因爲其他條約（如一八九五年的馬關條約）的新規定，內河與內地解釋相混，外國商船不但能航行於長江各口岸，並且能遠至長江上游及其他的內河。其後海關定有內河航行章程，外國商船只要在海關註册，卽可在內河航行。於是中國所有一切可以航行的河流，各國商船都可以通行了。至於沿海貿易的喪失，初時並無條約的規定，不過因爲稅收關係，演成習慣，到一八六三年中丹條約成立，才確定外人在中國享有沿海貿易權。

平常，各國都用本國的輪船，運載本國的貨物，到外國去銷。但是中國沒有出航外洋的輪船，所以中國出口貨物都要用英日等國的輪船運輸。不但如此，就是中國

沿海各埠以及內地各埠的貨物，大概都是歸外國輪船運輸。列强有了這種權利，便可以直接把他們的製造品推銷到中國的窮鄉僻壤，把中國的窮鄉僻壤的原料滿載歸去，供給他們的工廠。至於航業的利權外溢、與內國貿易的內容洩露，尤其是餘事了。

這樣，他們仍以爲不足。在一八九五年馬關條約成立之後，還要直接跑到中國來設立工廠。他們挾其鉅大的資本，新式的機器，專門的智識，來利用中國便宜的勞工，就近的原料，成本既然很輕，又有不平等條約保障，使得他們製造出來的貨物，可以不受一切苛捐雜稅的騷擾，比我們的國貨自然容易暢銷。我們的民族資本，因此便不能發展，只有被他們壓倒。

領事裁判權在表面上看來，好像是政治上的侵略，其實影響我們的經濟很大。所謂領事裁判權，乃是外人在某國國境內不受所在國法庭的審判及法律的支配，而受其本國法庭的管轄。外人在中國享有這種權利，起於一八四三年的五口通商章程。一八四四年中美，中法等條約也有此項規定。到了一八五八年天津條約，更加

定得明明白白至一八七六年的芝罘條約，則連觀審制度都有了。外人恃有這種領事裁判權，不服從中國法律的制裁，可以胡作亂爲。他們發行紙幣，我們不能干涉；他們設立工廠，我們不能取締；他們不向中國政府納稅，我們不能强制執行；他們甚至於幹種種不正當的營業，我們不能禁止；並且他們如果身體或財產方面受了損害，中國官吏還須負保護的責任。現在雖有許多國家的領事裁判權已經取消了，但是最重要的國家如英美法日等仍然沒有答應。

中外通商因爲時常發生困難問題，中國官吏特劃出一塊地方，許外人在那裏居住貿易，以免與中國人民時常發生衝突，於是而有租界的產生。早在十六世紀，葡萄牙人便在廣州、寧波、澳門等處置有居留地。不過現在通商口岸的租界，乃起於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而明白規定於一八四三年的附加條約。原來無論什麼性質的租界，中國並沒有放棄自己的主權；在法律的意義上，除了居住通商以外，中國並沒有允許外人任何權力。可是在實際上，現在一般租界的行政權，都在外人支配之下。他們有警察，他們要租界內的居民納稅，他們定出規則叫人遵守，並且根據領事

裁判權，我們的司法權在租界內不能完全對外人發生效力。

租界一來是通商口岸，二來因爲比較內地安全，中外資本都集於此，於是特別發達繁榮。至於內地因爲資本流入租界的緣故，日趨乾枯，而形成全國畸形的經濟發展，一部分太快，一部分太慢；在內地，依然閉塞；在租界，資本太多，難得正當運用，只好去做投機事業。總而言之，租界可說是經濟侵略的大本營。你看外國銀行在此，外國商鋪在此，外國工廠也在此，吸收中國的原料，吸收中國的資本，吸收中國的勞工，好厲害的所在！

列强侵略的根據地，除租界以外，還有租借地，乃是指一特定地方，以一定的期限，租給外國；在那期限之內，承租國在租借地內行使治理權。租借地與租界有兩點不同：（一）第一是租借地有期限的，大概多是九十九年爲期；第二是承租國有治理權，而主權在表面上仍屬於中國。

除澳門以外，各國在中國的租借地，如德之於膠州灣，（華盛頓會議轉讓與日本，後來由日本有條件的退還中國，）俄之於旅順大連（日俄戰後，轉租與日本，）

法之於廣州灣，英之於九龍及威海衛（威海衞後來有條件的退還中國，）都是一八九八年成立的。他們爲保障已得的利益，爲繼續對華的侵略，不能不有軍事根據地。有了這些租借地做軍事根據，他們便可以挾其武力，壓迫中國。加以他們在中國取得有軍事駐紮權及軍艦出入內河權，更可肆行其經濟侵略政策。

列强不但要侵略，並且要獨佔的侵略。如一八八五年的中法天津條約，規定中國在越南邊界造鐵路時，須向法商商辦。一八九八年的中德條約，承認在山東全省，德國有經濟的優先權。一九一五年中日換文，規定南滿與東部內蒙建築鐵路需要資本時，須向日本商借。因爲這些優先權便生出了所謂『勢力範圍』。外人在中國境內劃定勢力範圍，起自一八九七年中國允許法國海南島不割讓與他國的要求。其後各國效尤，不能拒絕。一八九八年，中國對英聲明長江一帶不割讓與他國。同年，日本又約定福建不割讓與他國。法國以保持均勢爲名，接着又要求廣東廣西雲南三省不割讓與他國。一九一五年日本更要求山東及沿海島嶼不得割讓與他國。這些都是勢力範圍的根據。列强有時竟至相互協定，不徵求中國同意：如一八九六年

英法關於雲南四川的協定；一八九九年英俄關於長江流域及長城以北的協定；一八九八年英德銀行團關於長江及山東的協定。

『勢力範圍』與『優先權，』在一方面看來，可以妨害中國經濟的自由發展，我們不能利用各國投資的競爭，得到低廉的資本與原料；有時甚至自己開辦事業，也要受人家的限制。如日本在東三省不許我們建築與南滿鐵路平行的路線；『九一八』的事變，平行線就是其中一個重要原因。同時在他方面，外人根據這種權利，可以壟斷中國的經濟：材料須由他們供給，資本須由他們出借，舉辦大的經濟事業有時須先取得他們的同意。

上面舉列强在中國所取得的種種權利，只要一國得到，別國根據最惠國的條款，援例要求，沒有不成功的。原來所謂最惠國條款在國際上有『片面的』與『相互的』之別：相互的最惠國條款，乃是締約兩國，彼此都用最惠條例相待；如甲國允許乙國以某種特惠，乙國同樣的以這種特惠允許甲國。片面的最惠國條款，乃是甲國雖以最惠條例待乙國，乙國並不以這種最惠條例待甲國。中國與外國在條約上

所規定的最惠國條款，都是片面的，因此聯帶所受的損失，不可勝數。

(三) 產業革命的性質

我們不能抵抗列强經濟侵略的結果，我們原有的工業只有趨於崩潰，發生劇烈的變化，而成功西洋史上所謂產業革命。

不過，中國的產業革命與西洋的產業革命是不同的。西洋的產業革命，大都是自動的。因爲科學的進步，機器的發明，於是有生產方法的改變。由生產方法的改變，便改變了全個經濟生活。至於我們中國的產業革命則是被動的。我們以農立國，自供自給，我們有了家庭手工業制度，並不想進一步去根本改變我們的生產方法。到了中西接觸之後，我們因爲屢次對外戰敗的結果，不免有點覺悟，想要富國强兵，以救危亡。但是，怎樣强兵？當然是要整軍經武。怎樣富國？當然非改變向來生產的方法不可。換句話說，就是要產業革命。所以說，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中國的產業革命的原因；中國的產業革命，是被動的，不是自動的。

惟其因爲中國的產業革命是被動的，是帝國主義逼出來的，是在帝國主義鐵蹄之下進行的，所以不但革命的歷程與西洋不同，就是所遭遇的厄運，也就夠慘了。帝國主義既然逼牠出來，又挾其政治上經濟上的優越勢力，不平等條約所給予的地位，把牠大肆踐踏。結果，中國經濟到現在還沒有走出一條出路；影響到政治及其他各面，便是失却平衡的發展。全國只有鬧得亂七八糟。

所謂中西產業革命所經過的歷程不同，我們的意思有兩種：第一，西洋的產業革命，大都由民用工業到軍用工業；第二，大都由民辦到官辦。中國的產業革命則剛剛相反。

爲什麽西洋的產業革命是由民用工業到軍用工業，而中國的產業革命是由軍用工業到民用工業呢？原來因爲他們先有科學的進步，機器的發明，才有生產方法的改變；有了生產方法的改變，才有大批的生產；有了大批的生產，才有剩餘的貨品。剩餘的資本要找地方投資，剩餘的貨品要找地方出賣，於是不得不擴張海軍，製造軍備，去掠取殖民地，爭奪市場，及保護他們海外的貿易。所以他們是因爲民用工

業過分發達的結果，走到軍用工業的一條路上去。由軍用工業所造出來的武器，去保護民用工業剩餘的生產。至於我們中國既無大批的生產，自無剩餘的貨品；既無剩餘的貨品，自無海外貿易的保護與國外市場的需要。擴充軍備，在這方面，自是毫無意義的。我們之所以要先創辦軍用工業，乃完全爲着要抵禦外侮。蓋自鴉片戰爭以後，我們對外，戰無不敗，敗無不割地，賠款，喪權，辱國。而推其所以致敗的直接原因，就是因爲外國有鎗，有礮，有軍艦的關係。我們若是要挽救危亡，洗雪國恥，切近之計，自非整軍經武不可；而整軍經武，又非改良軍備不可。因此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諸人乃極力倡辦軍械所，製礮局，造船廠等等。但是結果怎樣呢？倡辦軍用工業的目的，原來爲的是要造出新式軍械來抵抗外國，然而經中法之戰，中日之戰，八國聯軍之戰，我們又無不戰戰敗北，陣陣潰逃。可見祇是創辦强兵的軍用工業，是沒有用的。於是一班士大夫階級又慢慢覺得强兵之外，還不能不富國。怎樣富國？煤鐵不能不有，鐵路不能不修，其他民用工業不能不辦。此中國的產業革命，從軍用工業發動，與西洋從民用工業發動，不同者一。

爲什麼西洋產業革命由民辦到官辦，而中國乃是由官辦到民辦呢？第一，因爲民用工業，比較宜於民辦，軍用工業比較宜於官辦。軍用品如鎗砲等等，若用民辦，則人民專以營利爲目的，散佈民間，其勢有擾亂秩序，釀成內亂的危險。民用品，如布帛等等，若由官辦，則不但妨礙國民經濟自由的發展，而且是急其所不當急。因此，從工業的本性看來，西洋的產業革命，既是從民用工業到軍用工業，那麼經理方面，當然是從民辦到官辦。反過來說，中國的產業革命，既是從軍用工業到民用工業，那麼經理方面，當然也是從官辦到民辦。第二，中國的官，大權在手，是容易籌到大款去舉辦新工業的。外國政府的財政，間接直接須對國民負責；籌用款項，就沒有中國當局那麼容易，那麼自由。因爲中國的官容易要錢，而人民又是很窮，所以新工業是由官辦推到民辦。因爲外國政府，不容易要錢，人民可自由集資，所以新工業是由民辦推到官辦。第三，中國的官都是所謂智識階級出身的，眼光自然比較普通一般目不識丁的人民遠一點，所感到西洋潮流的刺激也多一點，自然應該先起來發動產業革命。至於西洋社會，智識階級不一定都在政府裏面做官，並且人民的程度也不像我們

這樣低落，所以沒有官方的督辦，人民也自己會發動。這也是中國由官辦到民辦，西洋由民辦到官辦的一個原因。

（四） 商業轉變的現象

中國工業發生變化，商業也在那裏變化。中國商業變化與別國比較起來，也有兩種不同的現象：第一，是中國商業的變化是被動的，不是自動的。我們以前是一個鎖國，在經濟上是自供自給的。就是恰克圖中俄的互市，也是因爲我們的乾隆『大皇帝普愛衆生，不忍爾國（俄國）小民困苦。』（見一七九二年恰克圖互市條約第一款。）我們允許英人在『澳門開設洋行，發賣貨物，』也是因爲英吉利『爾國王遠慕聲教，嚮化惟殷，遣使恭齎表貢，航海祝釐。』『其實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見一七九三年乾隆帝與英王的勅諭。）可見中外的通商，不是我們去找別人，乃是別人找到我們。所有的商埠，大概都是戰敗以後，列强迫着我們開放的。一八四二年的南京條約，開放了上海、寧波、廣州、福州、廈門。一八

五八年的天津條約，開放了長江沿岸的漢口、九江、鎭江三處。同治光緒以後，海陸商埠開闢日多，有些出於自行開放的，有些出於條約的，水路自沿灣以至江河，陸路自邊境以入腹地，全個中國，南北七千餘里，東西九千餘里，差不多已經完全開放了。

第二是中國商業的發達並不是工業發達的結果。在外國，工業的變化與商業的變化是有密切關係的，工業發達，生產增加，便不能不有較完備的商業機關去暢銷。在中國，最初商業的變化與工業並無十分關係。新式工廠還沒有開設的時候，外國的工業品早已大批的在中國市場上出現了。原因是西洋的產業革命早已完成，而中國的產業還停滯在家庭手工時代，等到門戶一開，外國的商品便像潮水一般的湧來了。到現在，你到各通商口岸的街上去看，你到上海先施永安等公司去調查，玻璃窗裏所擺着的，或是店裏面所陳列的，無處不是洋貨。公司愈大，洋貨愈多；洋貨愈暢銷，市面愈繁盛。

外人不但運貨來賣，並且進一步跑來中國設立公司。我們在各大商埠所看見那些高大洋房公司，有許多便是外國資本辦的，或是有外國資本參加的。他們一則

有政府的保護，二則有通商的特權，三則有雄厚的資本，四則有完備的組織，自然是所向無敵。我們的商人，只能仰承他們的鼻息，拾取他們的牙慧，一面替他們分銷製造品，一面替他們收集內地原料。外國的製造品銷售愈多，本國的製造品銷售愈少；本國的製造品銷售愈少，本國的手工業崩壞愈快；本國的手工業崩壞愈快，本國從事手工業或販賣手工業品者失業愈多。

外人收買我們的原料，也有同樣的影響。他們收買我們的原料愈多，我們自己的工業愈不能發達，我們失業的民衆更少勞働的機會。他們把原料拿回本國去製造，製成貨品之後，拿來賣給我們，不但他們的資本家賺錢，就是他們的工人也增加不少作工的機會。

上面所說商業的變化，由販賣手工業品，逐漸變爲外國機器製造品的經紀人，乃是從物品方面觀察的結果。若我們就商業的組織而論，也有顯著的變化。我們以前的商業組織，可分兩種：一是獨立經營，一是合股經營。合股經營在資本上可以集合兩人以上的資本，在才力上可以集合兩人以上的才力，比較獨立經營，可算進了

一步，但是與西洋的公司營業比較，我們自然落後。

西洋公司營業的優點如下：

第一，個人經營只有一個人的資本，合股經營只有極少數人的資本，公司營業則可集合無數的資本。因此個人經營與合股經營，爲資本額量所限，營業範圍很小。公司營業則可隨時招添股本，擴張事業範圍。股東人數可以增加到數十百千萬。

第二，個人經營與合股經營，都建築在人的關係上面。中國商店，往往老闆一死，便要倒閉。合股經營，若有股東去世，或有什麼不正當的行爲，全個營業便要大受打擊。所以，中國商店，多是人存俱存，人亡俱亡，很難持久。至於公司營業，則完全根據於法律，本身便是法人，其義務與權利，在法律上都有規定，經理儘可更換，董事儘可改選，全個營業仍可照舊進行。比較起來，西洋的公司營業有永久性與固定性，所以有長久的發展計劃，使社會上對之發生信任。

我們與西洋接觸之後，一方面因爲看見西洋的營業組織比較我們原來的完備，再一方面因爲非效法西洋，不能適應大規模的營業，與西洋競爭，所以在通商口

岸，漸次也有公司的組織。這種變化，正在進行。獨立經營的小商人就不免漸被淘汰。

（五）民族資本主義的命運

因爲帝國主義的侵略，所以發生了產業革命，因爲產業發生了革命，所以有民族資本主義的萌芽。如果民族資本主義像歐美日本各國一樣，能循序漸進的完成牠的任務，那麼中國經濟也有一條出路，雖不一定是理想的出路。無奈有種種關係，民族資本主義的命運總是凶多吉少。

第一，是國際資本主義的壓迫。國際資本主義有政府的保護，有不平等條約的根據，有雄厚的資本，有先進的技術，除了以剩餘貨物向中國傾銷外，並在中國設銀行、辦工廠、修鐵路、開礦山、做買賣，差不多把全個市場都壟斷了。民族資本主義沒有獨佔的市場，比較起來又是一個嬰孩，那能與已經成年的國際資本主義角力賽跑？

第二，是政治勢力的摧殘。本來無論那個國家的工業，在幼稚的時候，非有政府的保護不可。保護的辦法，對外如實行保護關稅政策，以排斥有競爭性的洋貨；對內

如對於某種工業特別予以提倡，獎勵，甚至於津貼。中國的工業則不然。關稅早被列强協定了，到如今自主還是一個空名；牠不但不是保護國貨，而且是保護洋貨的。這點或者還可以歸咎以帝國主義的不肯放手。但是內政的政策是不是保護幼稚的工業呢？不、決不。除了以苛捐雜稅的方法對民族資本加以剝削，或因混戰的關係予以重大的破壞外，我們看不見別的設施。

至於技術的落後，管理的不良，人才的缺乏，及資本的不充足，尤其是餘事了。以最重要的紡織業爲例，便可知其他一切工業的前途，民族資本主義的命運。一九一四年，歐戰開始，素以棉織業稱霸的英國，因爲加入歐戰的關係，自難保持以前那樣巨量的生產。英國棉貨進口既然日少，價格自不能不逐漸抬高；兼之，因爲二十一條要求而起的抵制日貨運動，日本紗布很受打擊，正是國貨暢銷的機會。於是一九一六年以後，新設紡織工廠有如雨後春筍一般的發達起來。總計自一九一六年至一九二二年，七年之間，中國棉織工業，紗錠由七十餘萬突增至二百餘萬錠，紗廠財產由二三千萬兩突增至一萬萬兩。但是歐戰停止以後，各國逐漸恢復其

對中國的經濟地位，尤以日本紡紗業者在中國特別活躍。一九一八年，日商在華紗廠共有二十九萬四千錠，至一九二一年增至八十萬七千錠，以後繼續增加，卒至有完全壓倒中國紗業之勢。中國紗廠，與日英劇烈競爭之下，又遇到層出不窮的內戰，與統治者的榨取，到現在幾乎有全體不能維持的樣子了。

（六）全個經濟的危機

在這種殖民地經濟情形之下，民族資本主義當然不能成功，而以前自供自給的鎖國經濟又已被破壞，於是發生了最嚴重的危機。

自一八六四年發表海關冊以來，除該年，及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六年爲出超外，無一年不是入超；而入超的數目，每年平均又在兩萬萬左右。最近實業家穆湘玥氏發表中國經濟上的危機一文（見民國二十一年六月十五日申報）對於這點很沉痛的指出道：

『民國元年以來，海關進口洋貨之數量，年年超過土貨出口之數量。自元年至

二十年，最少爲民國八年，進口超過出口爲一千六百餘萬兩；最多爲二十年，進口超過出口爲五萬五千九百餘萬兩。總計二十年中，進口超過出口爲三十九萬一千二百餘萬海關兩，合上海銀四十三萬五千八百餘萬兩，照現在市價合國幣六十萬萬元以上。試問二十年之短期間，因國人喜用洋貨，使金錢外溢，達六十萬萬元以上，我國安得而不窮？全國經濟狀況安得而不發生恐慌？』

巨商聶雲台氏也早已看見這種危機，所以他說：『試觀近五十年來，吾國與他國國際貿易之差額，常處不利之地位，以致輸金出口，駸駸乎有竭吾國現銀之趨勢。於是國庫空虛，蒼生塗炭。以吾地大物博之國家，不特不能執世界商業之牛耳；而國家之商業大權，反落於外人之手，此足以爲吾國悲也。』（見最近五十年中五十年來中國之商業一文。）

中國不利的地位，尚不止此。各種出入商品，性質不一，若我們研究各重要商品之出入，便更可了然於中國危機的所在。

第一，我們穿的東西有賴外人。棉貨與棉花佔進口貨品最重要的地位，計一九

二九年爲二萬萬七千九百餘萬兩，佔進口總額百分之二二·〇九；一九三〇年爲二萬萬八千二百餘萬兩，佔進口總額百分之二一·五四；一九三一年爲三萬萬零一百餘萬兩，佔總額百分之二一·九四。若再加上毛織品及人造絲織品，更可見我國人民在穿的方面，是如何不能自給。

第二，我們吃的東西，有賴外人。米、小麥、麵粉是最重要的食糧，也是最重要的進口貨品。以米而論，一九二九年達五千八百餘萬兩，佔進口總額百分之四·六六，居進口貨中第六位；一九三〇年達一萬萬二千一百餘萬，佔進口總額百分之九·二六，升居進口貨中第三位。小麥在一九三一年，進口達八千七百餘萬兩，佔進口總額百分之六·一一。麵粉每年輸入，也在三千萬以上，約佔進口總額百分之二以上。三項合計一九三一年值一萬八千二百餘萬兩。若以海關冊內所謂『糧食等』（包括菓品，藥材，子仁，香燃，菜蔬等，）一總歸入，數目更大。這些都是重要的糧食，以農立國的中國，竟要仰給外人，一面固然可見外人在華經濟勢力何等的偉大，一面可見中國農村的破產到了怎樣一個程度！

第三，重要的原料，也有賴外人。棉花一九二九年進口值九千一百餘萬兩，佔進口總額百分之七・二〇；一九三〇年值一萬萬三千二百餘萬，佔百分之一〇・一〇；一九三一年值一萬萬七千九百餘萬，佔百分之一二・四九。燃料內煤及煤油兩項在八九千萬兩之間。其他，如木料有二三千萬兩，製造火柴原料也有幾百餘萬兩。

第四，生產工具的機器，在進口貨品中，倒不甚重要。一九二九年進口值二千九百餘萬兩，佔進口總額百分之二・三六；一九三〇年值四千四百餘萬兩，佔總額百分之三・三八。一九三一年值四千三百餘萬兩，佔百分之三・〇四。中國實業之不發達，民族資本之被壓迫，在此可得一左證。

總之，我們生活所必需的東西，無論吃的，穿的，都有賴於洋貨。這不但利權外溢，並且非常危險。萬一世界發生戰爭，交通阻滯，洋貨不能進口，或減少進口，那麼我全國人的衣食住，豈不是要發生缺少供給或斷絕供給的危險？

至於出口貨品，也可以看出一國的經濟情形，不可不加以分析。

一九二九年，豆及產品居出口貨第一位，值二萬萬二千九百餘萬兩；絲類值一

萬萬六千五百餘萬兩；蛋及產品值五千一百餘萬兩；皮貨生皮熟皮值四千五百餘萬兩；茶值四千一百餘萬兩；五金等值三千三百餘萬兩；子仁子餅值三千三百餘萬兩；煤值三千餘萬兩；棉花值二千九百餘萬兩；糧食值二千六百餘萬兩；桐油值二千三百餘萬兩；髮毛、毛羽、絨毛、值二千二百餘萬兩；綢緞值二千一百餘萬兩。一九三〇年，豆及產品仍居第一位，絲類次之；蛋及產品仍居第三位，花生及產品，子仁子餅，皮貨生皮熟皮又次之。一九三一年，花生及產品，躍居第三位。蛋及產品退居第四位，其餘亦有些變動。

按上面所列十四種重要出口品中，屬於飲食物及原料品者多，屬於製造品者很少。

這些事實告訴我們：第一，出口貨以原料食物佔多數，製造品佔少數，與進口貨以製造品居多數者剛成一對照。第二，原料食物的出口有增加的趨勢，製造品有減少的趨勢。原料是生貨，製造品是熟貨，『生貨價廉，熟貨價昂，以廉易昂，外人即藉此以飽其私囊，而吾國經濟漏卮，遂不堪聞問矣！』（聶雲台氏語）

第八章　中西接觸後經濟上的變化(下)

帝國主義逼出了中國的產業革命，卻同時又給牠以殘忍的蹂躪，使牠不能健全發展。於是中國經濟的遭遇，更加慘痛，至今還沒有出路。我們且看這種經濟變化所發生的幾種比較重要的影響。

(一)　都市的發達

一座古老的城牆，帶着淤塞的城濠，緊緊的圍着叢密的矮屋，中間開着若干縱橫而又窄小的街道；在北方，下起雨來街道泥濘，房屋霉濕；天晴起來，又是刮風刮土，灰塵飛揚；在南方，街道高低不平還是小事，陰濕垃圾，那才使人討厭。街道的兩旁，排立着各樣各色的商店，由油鹽雜貨，綢緞布匹，以至於中伙安宿。有些商店不僅是發賣貨品而已，而且是手工業品製造的所在；一面做，一面賣，一面還住家，這是很普通

的現象。若是你在城中看見幾所大房子，戒備森嚴，門口掛着什麽『官署重地』『閒人免入』或對面牆上貼着許多佈告，這大概就是行政官署所在。雖然省府縣的都市大小不同，但這的確是城市的典型，現在還大體存在着，除了衙門的前面，虎頭牌換了藍底白字的標語以外。

在農業社會裏面，這樣的城好像是沙漠中的綠洲。牠是商業的中心點，是手工業的中心點，同時也是政治的中心點。牠沒有現代都市的繁華，的熱鬧，的偉大；比較起來，一切都是小規模，簡陋，寂寞。若沒有外力的侵入，誰也不覺得要有什麽變動。

但是中西接觸之後，對外失敗一次，便訂一次條約，開一次商埠。商埠開放了，列强便有了經濟侵略的根據，一面儘量把自己的工業品向中國輸送進來，一面把中國的農業品儘量的吸收出去。這一來一往的貿易，由沿海或陸路邊界向內地推移，一步一步的在那裏建築新都市的基礎。對外貿易愈增加，這些商埠愈發達。反之向來的舊都市，若是得不到對外貿易的惠顧，便要沒落下去。例如，上海，九十年前不是漁夫聚集之所嗎？現在洋場十里，看不盡的豪華，儼然是中國第一個大都市，握着全

國經濟的動脈。又如湖南南部的郴州，歷來是廣東的手工業品與湖南的農產品互相交換的一個重要地方，所以在海禁未開以前，異常繁盛。但自海禁打開以後，對外貿易一天一天的發達，洋貨的進口一天一天的加多，每年由上海進口的洋貨，大批的運到漢口；由漢口運到長沙；再由長沙，分銷到各縣。中產以上人家看見洋貨可喜，於是手工業品逐漸減少銷路；而以販賣廣東手工業品的郴州，便跟着零落下去，到如今，真有不堪回首之感！

我們原來的手工業，產額很小，範圍有限，生意不大，所以都市就不十分發達。自從洋貨輸入以後，商品交換的程度加速，買賣的範圍擴大，中國的都市乃循着兩極端變化：舊的固然日就沒落；新的更日趨繁榮。

但是新都市繁榮的原因，尙不止此。新工業的發展也極有關係的。不管牠是中國資本辦的也好，或外國資本辦的也好，新工業總是促進都市發展的一個重要元素。第一，工廠制度的大批生產，需要許多工人聚集一處作工。手工業與農村崩潰之下的失業民衆，只有成千成萬的趕來都市找工作機會。第二，工廠大批的生產，自然

要批發出去；於是工業所在的地方，同時大概也就是商業發達的地方。第三，工商業繁榮了，人口集中了，生活也就隨之豐富了，機會也隨之增加了。鄉村沒有都市那麼多娛樂機會，無論是新戲、舊戲、電影、跳舞、音樂都可在大都市裏面看到，聽到。鄉村沒有都市那麼好的教育機會，各種學校或研究，只能在都市裏面找着。生活的舒服與興趣的多方面，無一不是都市引誘人們的地方。況且人又是好羣的動物，要看熱鬧，自然不甘鄉村的寂寞。往都市，運氣好，窮漢忽然之間可以變做富翁。在鄉村，窮想變富很難，富變爲窮也不容易。因此，年富力强，勇於進取的人，一遇機會，便要離開生活單調的鄉村，來到豪華活動的都市，好像飛蛾見着燈火一般，成千成萬的奔赴着。

除此以外，交通也是與都市發展有密切的關係。誠然，都市所在地的選擇，原來就離不開天然所賦予的交通便利的條件。如上海不在黃浦江畔，揚子江口，決不能成其爲上海。如天津沒有大沽河與海口的便利，也決不能成其爲天津。其他如廣州，漢口等埠，也莫不有好的天然地勢。既有都市的資格，工商業又發展到相當程度，其勢於是不能不有火車，輪船，馬路等等的交通工具，以爲輸出輸入之用。因此，凡是都

市所在的地方，交通也必然比較便利；同時交通便利之後，人口比較容易集中，工商業比較容易活動，該地也必然愈趨發達。

現代都市發達的結果，已經把以前的自供自給的鄉村經濟打破了。大都市，尤其是上海，居於提綱挈領的地位：由大都市，而小都市，而城鎮，而鄉村，全國的經濟現在一個系統內逐漸的連繫起來了。各個地方決不能像以前那樣可以在鎖閉的狀態中過活，猶之全國對外現在不能維持鎖國經濟一樣。上海的金融一有變動，遠在西陲的四川，馬上就要發生反應。

(二)　手工業的衰退

產業革命對於工業有兩種顯著的現象：一是機械工業代替手工工業；一是工廠工作代替家庭工作。機械工業愈發展，手工工業愈崩潰。在中西接觸以前，中國的工業，大體都在家庭手工業時代；中西接觸以後，產業革命發生，家庭手工業便逐漸被外國的與本國的機器製造品所破壞。

譬如紡織，在從前，完全是一種家庭手工業，每家人家，男人在外面做事，女人便在家紡紗織布，出品雖然很少，全家差可自給。自門戶打開，洋貨輸入之後，原來的家庭手工紡織業，便受三方面的夾攻。

第一，是棉布棉紗的進口，逐年增加，在進口貨中，佔極重要的位置。一九二五年，棉布棉紗進口共值一萬萬千餘萬兩；一九二六年，共值一萬萬九十餘萬兩。國人用了這麽多洋貨，反面就是不用了這麽多國貨。所以這大批的進口貨的生意，乃是從家庭手工紡織業奪來的。

第二，自從李鴻章張之洞提倡倣效西法，使用機械以後，新式的紡織工廠，逐漸開設，至今日，已成爲國內產業中最發展的工業。據最近調查，一九二八年，華商紗廠有七十；紗錠有二、一四五、三〇〇；布機有一五、六四二。由此，可見中國紗廠的發達；也由此，也可見中國家庭手工紡織業的崩潰。

第三，不但外國的機製品與本國的機製品壓迫家庭手工紡織業，還有外人在中國辦的工廠，也有同樣的影響。自一八九五年中日之戰結了馬關條約以後，日商

得自由設廠於上海，其他各國也援例要求。據一九二七年華商紗廠聯合會調查日本紗廠有四二，佔國內紗廠總數百份之三五・三；紗錠有一、二九二、〇〇〇，佔紗錠總數百份之三四・八；布機有九、六二五，佔布機總數百份之三九・五。英商紗廠有四，佔紗廠總數百份之三・三；紗錠有二〇五、〇〇〇，佔紗錠總數百份之五・六；布機有二、三四八，佔布機數百份之九・六。

我們又從棉紗消費的情形，也可看出家庭手工紡織業崩潰的速度。一九一二年，本國紡出棉紗八〇〇、〇〇〇擔；輸入棉紗二、三〇〇、〇〇〇擔；消費總額三、一〇〇、〇〇〇擔。一九二一年，本國紡出棉紗四、五〇〇、〇〇〇擔；輸入一、二〇〇、〇〇〇擔；消費總額五、七〇〇、〇〇〇擔。這些數目，一面證明機製棉紗的需要逐年增加；一面反證手工紗的用途逐年減少。機製棉紗的需要增加，自然促進新式棉紗業的發達。手工棉紗的用途減少，自然促進舊式手工業的崩潰。

棉紗如此，其他可知。凡是新工業品所到的地方，即是手工業品要退讓的地方。帆船遇見輪船，土車遇見火車，油燈遇見電燈，土布遇見洋布，旱煙遇見紙煙，沒有不

失敗的，特別是因爲中等以下的人家，爭用洋貨的關係，手工業品，更沒有出路，中國的商業資本，在中西接觸以前，始終在農業品與農業品，農業品與手工品，或手工品與手工品之間流動。牠的功用不但不破壞手工業，並且扶助手工業；手工業因爲牠的繁榮，很有賴於手工業的繁榮。到中西接觸以後，中國商業資本便逐漸的拋開手工業的土貨，來販賣外國的機器製造品，代替帝國主義者來破壞中國的手工業，代替外國資本家來壓迫中國的手工業者。於是手工業更不能不崩潰。

手工業一崩潰，於是凡從事於手工業的人，不能不漸隨之失業。第一，是因爲機器漸漸代替手工，可以減少若干倍的勞工。譬如以前在手工業制度之下，某都市以容納一千人做成衣匠，現在因爲利用機器，只可容兩百人，那麼就有八百人被迫失業。若是中國所消費的製造品，都在中國製造，那麼雖然減少了八百人的勞動機會，工廠至少還可吸收兩百人的勞工。不幸我們所消費的製造品，大半都是洋貨，都是從外國運進來的。其製造，自然在外國。依上面所舉的例，連那兩百人的勞動機會，大半也要落在外國人手裏。外人不但賺了我們的錢，並且奪了我們的勞動機會，給他

們本國的工人。因此，我們的失業問題，比他國在產業革命期中的失業問題，更加嚴重。外國進口貨愈多，外國工廠生意愈好，結果外國工人勞働機會愈多，工價愈高。在我們方面，影響剛剛相反。外國進口貨愈多，我們自己的工業農業愈崩潰，我們的勞働機會愈少，工資也愈低，失業數目也愈大。我們雖然有新興的工廠，但因爲不能與外國工業競爭，及受黑暗政治的影響的緣故，爲數極少，勢力極微，不能吸收手工業與農村所擠出來的浩大失業民衆。此種慘刧，在西洋各國產業革命期中是沒有這樣慘的。因爲他們的產業革命，沒有外國貨物壟斷全國市場；勞働機會，不至外溢；失業的人民，雖失之於手工業與農業之中，還有機會求之於工場之前。

失業的人加多了，就全社會而論，則生之者寡，食之者衆，經濟日益窮困，生活日益艱難。就失業者而言，則人無恆產，便無恆心，生活所迫，無所不爲。有些流爲流氓，魚肉鄉民；有些流爲土匪，打家刧舍；有些流爲兵士，爲軍閥的刀俎；有些流爲乞丐，沿門討飯；有些流爲娼妓，倚門賣笑。有此一大部分失業的游民，野心者可以隨時乘機利用。於是中國從此多事，於是內亂輪迴不已。每次戰爭，破壞許多產業，打破許多飯碗，

增加許多游民。游民愈多，戰爭的材料愈多，戰爭的輪迴也愈快。

(三) 農村的崩潰

我們已屢次的說過，中國本是一個農業國，在中西接觸以前，大都取之於土地以自給，中西接觸以後，這自給的農業經濟就漸被破壞。原因是有經濟，政治兩方面：經濟方面可以分做幾點來說。

(一)賠款及外債的負擔　從一八四二年鴉片之戰到如今，中國對帝國主義國家所認的賠款及向他們所借的外債，合計總在二十二億以上，都是直接或間接取之於農民或由農民擔負的。

(二)洋貨的侵入　農民所消費的東西，除了農產物與一部分的家具之外，其他服用物品有許多便是船來的東西。我們應該還記得二十年前在鄉下穿洋布，點洋燈，用洋面盆，及洋手巾的，只有上等人家；中等人家多是穿土布，點油盞，用木面盆，及粗布手巾，頂多也不過用點洋火柴而已。但是近年情形卻大不同了。中等人家用

這類的洋貨，那是很平常的事；就是佃農與雇農也要穿洋布衣裳，甚至乞丐身上也帶有洋貨的成分。洋貨普遍，就是土貨縮減；土貨縮減，便是手工業破產；手工業破產的結果，農民只能拿農產物去換用帝國主義的商品。這類商品又是由洋商買辦經手販賣的，經過無數曲折，才運到窮鄉僻壤附近的市場；到那時，價目已經是抬高許多了。農民拿農產物到市場去賣，只得到市價以下的價格；再拿出這樣換來的金錢，去購用帝國主義的商品，一出一進，都要受中間人兩重的剝削。這樣一來，農民終年辛苦所得，除了吃點粗飯以外，其餘都要變成金錢，直接或間接的送到帝國主義者的錢袋裏。

(二)農民副業的衰退　本來紡紗、織布、養蠶、採茶等項，都是農民的副業，很可以貼補農家的家用。但自洋貨侵入，產業革命發動以後，農村婦女紡紗的工作，差不多完全廢止了；織布也改用洋紗。並且因爲機器布傾銷之故，婦女辛苦所織出來的布，不能與之競爭，這項副業也逐漸停止了。只有絲茶兩項，還可維持；但是他們的光景也大不如前了。絲茶本爲中國出口貨的大宗。如茶一項，在光緒末年，出口常在二

百萬擔以上，後來印度茶、錫蘭茶、日本茶起而競爭，出口額便逐漸減少，近年以來，甚至有大批印度茶與錫蘭茶的輸入。其次如絲一項，在五六十年前，殆佔全世界絲業之半額，但到後來，東則見奪於日本，西則見奪於意大利，生絲在出口貿易上的位置，已遠不及以前的重要。副業衰退，也是農村破落的原因。

（四）農村生活的提高　近數十年來，農產物的價格，雖比前漸次加高，但加高的速度，遠不如帝國主義的製造品。這兩者的距離，在交通比較便利的大都市附近的農村還小，在窮鄉僻壤的農村更大。農民拿低價的農產物，換用高價的製造品，結果生活當然愈覺痛苦。

（五）農村金融的困難　農民每年要進貢大宗金錢給外國的及本國的資本家，農村金融當然困難。加以軍閥官僚的剝削，土豪地主的搾取，農民那能不入枯魚之肆呢？

農村崩潰第二方面的原因在政治的黑暗。統治階級的剝削，古來也是有的，但決沒有像近幾十年這樣厲害。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屢戰屢敗之後，我們不得不

承認帝國主義者所提出的賠款，不得不向帝國主義者借款。這賠款與借款是統治階級開銷的，卻要農民來償還。到了辛亥革命以後，君主政治雖已經推翻，但民主政治尚未成立，帝國主義者又從中搬弄，於是有軍閥的統治與割據。各軍閥爲鞏固及擴充勢力起見，更不得不向農民加緊搜括，搜括的辦法最要者有下列各種辦法：

（一）苛捐雜稅　名目繁多，不勝枚舉，這些都是直接間接取之於農民的。

（二）預征錢糧　有些省分，如四川，現已預征至民國六十年。最奇怪的，甲軍閥預征錢糧之後，乙軍閥如起而代之，他並不承認前任軍閥預征的有效，必得從新征收起來，所以農民往往有一年繳納錢糧兩三次之多。

（三）勒種鴉片及抽鴉片稅　軍閥的勢力，有好些是靠鴉片維持的。有些省分竟勒逼農民栽種鴉片。所謂煙苗捐、煙燈捐、吸戶捐、種種奇怪的捐稅，無不應有盡有。好好的農田，不種五穀種鴉片，以致糧食缺乏，農民飽於鴉片而餓死於糧食，真是天下奇事。

（四）濫發紙幣　發行軍用票，省庫券，或銀行券，甚至於公債，也是軍閥籌款的

妙法。這類紙幣，沒有基金，只是强迫人民使用，否則軍法從事。軍閥以之散布市面，商民以之流通鄉村。

（五）戰事的犧牲　軍閥混戰，連年不息，最受痛苦的，莫過於軍閥括了錢之後，不知止足，還要擴張地盤，增加勢力，與他軍閥衝突，使農民受戰事的犧牲。戰區以內的農民，田園被踐踏，屋宇被焚燬，男人被拉夫，婦女被奸淫，食物牲畜被搶掠，父母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向日的崇疇千里，頓成爲弔古戰場。每一次戰爭的損失，直接間接，無慮萬萬，而大部分都落在農民的肩上。

（六）土匪的掠奪　因爲政治腐敗，內亂時起，人民不能聊生，於是挺而走險，加入爲匪者，愈趨愈多。到如今，沒有一省無土匪。崇山峻嶺，窮鄉僻壤，便是土匪最好的藏身所在。農村社會，人口不能集中，土匪一來，不能抵抗，結果只有被其蹂躪。軍閥的軍隊，本來就是沒有紀律，沒有訓練的，與土匪並無什麼差別。以之剿匪，倖而戰勝，不過以暴易暴，設如不勝，徒遭兵禍。農民不死於軍閥之手，便死於土匪之手，雙方夾攻，痛苦益深。

(七)土豪劣紳的剝削　劣紳有許多是無業的上等流氓，有些本身兼有土豪的資格。他們勾結地方官長，魚肉鄉下老百姓。如政府有什麼捐款要農民擔負的時候，縣官總是要他們去派捐，他們便可從中上下其手，掏入腰包。至於土豪，雖然也受統治階級的搾取，但是他們的資產比較雄厚，還不至影響於他們的生存，而且他們更可以利用這些原因，來加緊對於農民的剝削，把那些負擔，轉嫁到農民的身上。

農民在重重剝削之下，每年的虧欠與賠累，乃是必然的結果，而尤以佃農爲最苦。我們在鄉下常常看見種過二三十畝田的人家，一到秋收之後，穀倉中差不多就不能剩下什麼。他們大約從夏歷十月的時候起，就要向富戶借錢用，借米吃。借錢的月息，照例是百分之二三十，借米的月息還要多一點，有田的多半拿田契作抵押。到了春二三月，又要向富戶借吃米，辦穀種，辦農具，利息比較更重。到了五六月青黃不接的時候，又要向富戶借債米吃，這時候的利息，往往是對本對利。這樣一來，等到秋收的時候，除了償清積欠，自然沒有飯吃了。自己有田的自耕農或半自耕農，便不得不把田算給土豪地主。自己沒有田的佃戶，要想繼續做佃戶，恐怕只有賣兒女來還

眼的方法；否則溜之大吉，或做游民乞丐。

最後還有天災。真是巧得很，『禍不單行，』近數十年來，不知甚的，天災人禍，一齊降臨。旱災、水災、蝗災等等，相繼而至。在太平時候，政府或許想方法去賑濟，這年頭，兵荒馬亂，各人自救之不暇，誰還來援之以手？至於軍閥官僚，他們是殺人不眨眼的『好漢，』那裏還有什麼同情心，來顧這些事情。

以上是中國農村經濟破產的主因。此外如農村文化的落後，耕種方法的不良，交通的阻礙等等，也是很有關係；但這些情形，不是中西接觸以後才發生的，所以不去討論。

有了這些崩潰的原因，於是有下列崩潰的現象。

第一是土地的兼併　農民因爲剝削重重，生活艱難，不能保持自耕自食的地位，不得不把自己的田土賣給他人家。中農降爲小農，小農降爲佃農。在資本主義比較發達的地方，如江浙兩省，因爲土地投資的關係，這種趨勢，更是顯著。

第二是農業人口的減少　農民不能聊生的結果，有一部份跑往都市做工；有

一部份將其肉血，獻於軍閥；被募當兵，棄鋤荷槍；有一部份流爲土匪，打家刧舍；又有一很大部份，因爲天災人禍，不能生活，逐漸死亡。故農村的人口，自然只有一天一天減少。我們雖然沒有什麼可靠的統計可以證明，但若我們回到內地的家鄉問問父老的情形，他們沒有不緬懷昔日的繁榮，而嘆惜於近來的凋落。更看那田園荒蕪，更看那破垣殘壁，更看那死的死，走的走，你能否認這種趨勢嗎？

第三是荒地面積的增加　農業人口減少，壯者散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田園自然要荒蕪起來。近年因爲共產與剿共的騷擾，內地更不能安居樂業。江西有些地方，簡直是十室九空！

第四是進口糧食的增加　據海關報告，一九二七年，米穀進口爲一〇七、三二三、二四四兩，小麥爲七、〇五五、六六七兩；麵粉爲二一、三〇六、三三八兩。以農立國，竟輸入這麼多糧食，這非證明農村的崩潰如何？這類糧食的進口現正在速度的增加，這非證明農村還正在速度的崩潰如何？

(四) 勞資的離異

在家庭手工業之下:

(一)雇主與雇工的關係是很密切的。雇主對於雇工,有如父兄對於子弟。資本很少,規模很小,工人不多,老板也常在一塊工作;所以彼此之間,沒有什麼隔膜,也沒有什麼顯著的階級區別。

(二)從前生活程度不高,工人的慾望容易滿足,所以工資很低也不發生什麼問題。

(三)手工業不用機器,沒有什麼危險,所以工人的生命頗爲安全。

(四)至於勤儉能幹的工人,如工作年數較久,稍有積蓄,便可獨立營業,不必終身寄人籬下,作人家的雇工。

自從產業革命發生,工廠制度介紹進來之後,新式工人的情形,便大不同了。

(一)雇主只供給資本自己並不作工;雇工只出賣勞力,與雇主完全隔絕,而周

旋於中間的，只有所謂工頭者，於是勞資兩方，漸相離異，而至於互相對峙。工人要加工資，廠主要減工資；工人要減少工作時間，廠主要增加工作時間；工人要改良待遇，廠主不願改良待遇；兩方利益，處處相反，衝突糾紛，時常發生。手工業下雇主與雇工間的諧和關係便完全沒有了。

(二)現在生活程度比從前高了幾倍，新式工人的工資雖較手工業時代爲多，然生活仍不能維持，至於慾望之難滿足，更不必說了。

(三)工人在廠內工作，天天與無情的機器相接觸，生命沒有以前安全。

(四)新式工業非大資本不辦，所有資本都集中在少數資本家之手，一般工人無論如何勤儉能幹，很少有出頭希望，只有終日做人家的牛馬。於是雇主與雇工間的隔絕，一天一天的懸殊，而階級的觀念也愈演而愈烈。

因爲中國境內有外國資本家與中國資本家，所以中國的工人所受的待遇，也格外慘痛。那班外國資本家，利用中國的便宜勞工，根據不平等條約所取得的權利，紛紛到中國來開辦工廠，雇用中國工人，替他們創造剩餘價值。他們對這班工人的

待遇，完全使用宰割殖民地的法律與舉動。其次，中國的工業資本家，因爲剛剛出世，就碰到了外國資本家的競爭，不但得不着本國政府的援助，反要受苛捐雜稅內戰種種的打擊。他們失之於此，便不能不加緊工人的剝削，以圖得一點餘利。因此在本國資本家之下作工的工人，勞動條件甚至反有不及在外國資本家之下作工的工人。

中國工人一面迫於生活的困難，不得不要求經濟地位的改善；一面受了外國資本家的壓迫，不能不從事反抗帝國主義的運動；再一面鑒於本國政治的腐敗，及自身所受此種腐敗政治的痛苦，不能不設法解除。因此，中國勞工運動的性質不但是經濟的，並且是政治的。

中國的產業勞動者，自從滿淸末年，就已經隨着產業革命而發生了。及到歐戰發生，國內的新式產業特別發達，而此等產業勞動者也跟着增加起來。

聚集這麼許多人於工廠之中，同一樣的環境，同一樣的利害，自然容易組織起來。加以五四運動之後，內得思想的解放，外有共產主義的輸入，於是工會的組織，有

如雨後春筍。

民國十五年國民黨北伐，因爲聯俄容共兩大政策的結果，凡國民黨勢力所到的地方，也是共產黨勢力所到的地方。那時候，全國各工會，差不多完全在赤色國際指導之下進行，聲勢浩大。民國十六年，國共分家之後，凡帶有赤色性質的工會，相繼改組或取消，於是勞工運動不但改變了方向，並且暫時受了一下打擊。

第九章　中西接觸後社會上的變化

(一)　大家庭的崩潰

『國之本在家，』所以大家庭制度，無疑的是我們中國社會的柱石。大家庭制度一有變化，其他有關聯的思想或制度，也不能不隨之轉變。

自中西接觸以後，國際帝國主義逐漸的壓倒了家庭手工業制度，衝破了農村自給經濟，於是向來在家種田做工的人，因爲受了經濟的逼迫，不能不分途謀生。老大在家繼承父業，老二或跑往甲城工廠做工，老三或在乙城裏面一家公司內做一個職員。老大的家眷，因爲種田的關係不消說，還須在祖宗三代的故鄉居住。老二的事情，如果穩當，便須把家眷帶出來。三嫂子的丈夫既然是公司的職員，自然可以跟着老三在城內成家立業。於是，數世同居的大家庭制度，便如此這般的逐漸起了分

化作用。如果這家人家的老太爺或老太太還存在，那麼他或她只見子女的外出，不見子女的歸來。『倚門而望，』這時代的老人家們，不免怦怦心痛罷！

不但經濟制度起了變化，舊思想也早已保不住了。維持大家庭制度的孔家學說，婚姻制度，貞操觀念，喪葬禮節，受了西方文明的影響，失卻了向來的權威。青年學生，在都市的學校裏面，受了新思潮的播動，首先樹起家庭革命的旗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替他訂了婚約，他認爲是舊式的婚姻，不能承認。他在外面看見許多年輕美貌的女學生，比較家鄉的黃臉姑娘，多麼迷人，自然是擁護自由戀愛的思想，與心愛的人兒實行戀愛。戀愛成熟的結果，進一步用新式結婚的儀節，成立小家庭，那是很自然的。新夫人不一定是同鄉，而思想習慣又不免『摩登，』當然不能與家鄉的父母兄嫂同居。如是大家庭制度，只好一天一天的瓦解。

這種趨勢特別在大都市，如上海、天津、北平、廣州等處，最爲明顯。因爲大都市是國際資本主義的主要根據地，工商業的中心點，交通便利，與西方文化最容易接觸。因此，大都市裏面，大家庭天天少，小家庭天天多。你不信，你看上海弄堂房子的建築，

便知小家庭制度的盛行了。

鄉村裏面因爲交通不便，難受外面的影響，同時因爲耕地的關係，不能隨便搬移，大家庭制度崩潰的速度，比較慢些。但是內亂頻仍，軍閥剝削，官吏貪污，天災流行，農民無以聊生，只有散之四方；散之四方的結果，也只有促成大家庭制度的分化。

這種趨勢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用不着我們去贊成，反對也是無益的，且讓我們看這種變化的結果如何。

顯而易見的，在政治方面，中國以前的政府，基礎在於大家庭。社會之所以能夠相安無事，共同生活，全靠這種家政府的維繫。所謂『家齊而後國治』者在此。現在家庭的範圍縮小了，家長無法約束他的子弟了，而同時現代國家的組織與政府的運用，又是外來的產物，不能一蹴而就。在此青黃不接時代，於是社會只有愈加紛亂了。

在道德方面，我們以前的標準，都是以大家庭爲主要根據。現在大家庭制度既然站不住了，那麼有關聯的倫理道德，當然也要逐漸失掉作用。什麼『三綱，』什麼

『五常』在從前是天經地義，在現在是迂腐之談；不但青年學生不受其約束，就是稍爲受過新式教育的人們，也不能接受了。同時，西方社會的道德標準，如爲公、愛國、互助、合作等等，又不能馬上養成。舊的不要，新的未成，結果也只有增加社會的紛亂。

（二）階級的變化

我們以前的社會，分做士農工商；而其實，士是統治階級——不事生產的階級，農工商是被統治階級——生產階級。『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也就是因爲士是統治階級的緣故。

不過從中西接觸以後，情形便慢慢的不同了。不但階級的地位有轉移，並且有新的階級發生了。第一是在華的外國資本家。外國的經濟侵略，不限於間接的方法而已，並且打進門來直接投資。有些經營大商業，在中國設立商店，將本國的剩餘商品，大批運來中國推銷。有些經營大工業，挾其剩餘的資本，利用中國的勞工與原料，靠着不平等條約的保護，在中國設立工廠。有些拿大大小小的輪船，在中國內河沿

海，橫行直撞，把中國的航業大部分搶了過去。有些在中國開辦銀行，操縱中國的金融。甚至於有些在中國辦報，辦航空事業等等。這些外國人在中國都是發大財的。你看上海天津各大商埠，大多數坐汽車的是誰，穿華貴洋裝的是誰，住好洋房的是誰，便可明白了。這些外國資本家，挾其雄厚的資本本國政府的勢力，在中國形成了一個太上統治階級。中國的軍閥官僚政客見到他們，也只有作揖打拱。

跟着洋大人而起的一個新興階級，便是買辦階級。因爲洋大人（外國資本家）在中國有許多不便：第一是言語不通，第二是習慣不同，第三是對中國情形不熟悉，所以要搾取中國人，還非要中國人做中間人不可。這班人站在洋商與華商中間，以洋商的名義與華商交易，而取得傭金。他們的利害是與洋商一致的。洋商賺錢愈多，他們的利益愈大。中西接觸之後，外國資本家在中國的勢力，一天一天大，買辦階級的勢力也隨之一天一天大。他們現在是大都市裏面華人中最闊的一個階級。他們雖然仰洋大人的鼻息，以洋大人的利害爲利害，但中國的工商界，甚而至於軍閥政客，還要仰他們的鼻息呢。

在從前手工業時代，我們沒有什麼大資本家；就是有，勢力也不大。自與外國通商之後，對外貿易一天一天的增加，外國製造品的輸入，與原料品的輸出，一來一往，川流不息，於是促成了商業資本家的出現。他們販賣洋貨，不遺餘力。大都市裏面，各大公司商店，那裏看不見洋貨？資本的雄厚，規模的宏大，自然非手工業時代的商人所可比擬。若你到上海的永安先施兩百貨公司參觀，便可見一斑了。不但商業上有這種重大變化，工業也復如此。帝國主義推動了中國工業革命的結果，新式工業漸漸發展，新式工廠年年增加，於是工業資本家也跟着多了起來；在紡織業，特別顯著。這些工商資本家，都是中西接觸以後的新興階級。在我們以前的社會，他們的地位是卑下的；在現在，他們卻一天一天重要，可惜他們受外國資本家的壓迫，不能自由發展；否則更有可觀了。至於以資本投入銀行或經營銀行業的可稱爲財政資本家，他們一面勾結政府，一面剝削平民，其勢力在近年以來有長足的進步；到現在可以支配工商業了。

這些資本家究竟是從那裏來的呢？大體說來，（自然也有例外）不外是軍閥，

官僚，富商，地主四個成分。軍閥官僚所搜括的，與富商地主所搾取的匯成了資本；他們自己於是也做了某銀行或某公司的董事長或董事——資本家。這些資本家與洋大人，買辦，及當權的軍閥官僚統合形成了今日中國社會的統治階級。

談到『士』的階級，最可憐。以前『士』是統治階級，爲各階級之首。自中西接觸後，他們的地位漸漸喪失了。一方面因爲政治上的變化，形成了軍閥政治，武人擠掉了文人的領導地位。另一方面，新式的資本家及買辦階級因爲有錢的關係，在社會上很佔勢力。講權勢，既比不上軍人；講財力，又比不上資本家與買辦，於是智識階級（士）只有一部分依附軍閥謀生，做官僚，做政客；一部分依附外國資本家謀生，做買辦，做職員；還有一部分在各大中學混飯吃，過其『餓不死，吃不飽』的生活。其中有專門智識的，如律師，如會計師，如醫生，在都市中，因爲社會關係複雜，人事接觸密切的結果，形成了所謂自由職業，既不屬於資本階級，也不屬於勞働階級。

工業革命的結果，不但產生了資本階級，幷且同時產生了勞工階級。勞工的人數，隨着新工業的發展而增加，新開一工廠，便新吸收一批工人。其中人數比較最多

的工業部門，恐怕要算紗廠、鐵路、航業、礦山等項。這些工人的地位，與以前手工業時代的工人不同。

（一）以前的工人與雇主接近，并且雇主也常在一塊工作，階級的界限不嚴，彼此常能保持親密的關係。現在的工人，與資本家差不多見不到面，利害又是相反，階級的對峙自然日益尖銳，更談不到什麼感情了。

（二）以前的工人因爲生活程度不高，慾望容易滿足。現在，不但生活程度增加了幾倍，慾望也因城市生活的複雜，而難於滿足。

（三）以前的工人因爲是手工業，用不着機器，沒有什麼危險。現在的工人，天天同機器在一塊，稍不留心，你的手或足便會被切掉。至於工作的環境，難合衛生，更不必說了。

（四）以前的工人，如果勤儉聰明，稍爲有點積蓄，便可獨自營業，不必終身做他人的雇工。現在的工人，在新式工業之下，因爲工廠制度與機器製造，需要鉅大的資本，絕對沒有希望升做雇主。這班工人天天被外國的或本國的資本家所搾取，除了

出賣血汗，維持粗衣粗食的生計外，還能有什麼打算？

然而工人還沒有農民那樣苦。農民的壓迫是多層的：上面有土豪，劣紳，奸商；又上面有貪官污吏；再上面有軍閥政客；更上面有帝國主義者。在都市，文化比較高點，消息比較靈通，團結比較容易，所以極惡毒的壓迫，還有反抗的餘地；並且保護比較周密，生命比較安全。至於在內地，農民真是孤苦無告，只有任一切壓迫階級的宰割，到了內戰更是被犧牲的羔羊。因此農村的荒涼，成了全國普遍的現象。

農村崩潰所驅出來的失業分子，城市的工廠不能完全容納，爲衣食所迫，於是有許多變做匪，有許多變做兵，還有許多變做娼妓，乞丐等等。

（三）　教育制度的改革

西洋文化早已隨着商人，教士，及國旗而來。耶穌教徒明末先後來中國的不少，最著名的有意大利的利瑪竇（matteo Ricci），西班牙的龐迪我（Diego de Pantoa），日爾曼的湯若望（Joannes Adam Schall von Bell）等。他們輸入的曆算智識，種下

了不少新教育的種子。我國學者如徐文定、李光庵等都受了他們很大的影響。特別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條約以後，教士東來傳教的更多。他們傳教的手段，便是辦教會學校。教會學校的功罪，我們姑置不論，然對於我們的教育，有不小的影響，那是無疑義的了。

後來因爲屢次戰敗，交涉很多，利權外溢，爲富國强兵着想，於是有同文館，機器學堂，水師學堂，電報學堂，礦業工程學堂，軍醫學堂等等的設立，以造就各種專門實用人才。這些學堂，對於教育的改革當然也有密切關係。

到了中日戰後，清廷大受刺激，變法維新運動，因之而起；興學校，廢八股，遣學生出洋留學，變更科舉制度，翻譯外國書籍，廣設報館，都是所謂新政。但不久守舊派得勢，一切改革都被推翻。等到釀成義和團之變，與八國聯軍之役，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纔知中國不能不效法西洋，毅然復下興學之詔：

『上諭：人才爲庶政之本，作育人才端在修明學術。……近日士子或空疏無用，或浮薄寡實。今欲痛除此弊，自非敬教勸學，無由感發興起。除京師已設大

學堂，應行切實整頓外，着將各省所有書院，於省城，均改設大學堂；各府廳直隸州，均改設中學堂；各州縣均改設小學堂。並多設蒙養學堂。其教法當以四書五經綱常大義爲主；以歷代史鑑及中外政治藝學爲輔。務使心術端正，文行交修，博通時務，講求實用；庶幾植基立本，成德達材，方副朕圖治作人之至意。……」

這是新式教育第一次的正式宣言。

日俄之戰，日本勝利，歸功於學校教育，我國當然更受感動，於是完全把科舉制度廢除，而留學之風大開，往東洋求學者多至兩萬人左右。新式教育，更根深蒂固矣。此後數十年間的新式教育，其間雖有許多變化，要而言之，不外：

(一)學校制度代替了私塾教育；

(二)由私立學校制趨向國立學校制；

(三)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排斥了四書五經；

(四)由男女分校到男女同學。還有一點，就是在清末，所謂新教育的基本思想，是儒家傳統的君主政治思想，而以西洋的實利主義爲輔；到民國，基本思想是民主

主義，同時也以實利主義爲輔。迨至國民黨專政，實行所謂黨化教育，思想定於一尊，像以前尊孔一樣，又必以三民主義爲出發點，於是又是一個局面了。

我們的教育制度雖然與從前大不相同，但是並沒有發生很大的良好影響。一部分的原因，自然要歸咎於辦學的人；但是大部分的原因，還是因爲政治環境的黑暗。第一是軍閥窮兵黷武，擴張地盤，把一切的收入，幾乎完全用到培植自己的軍力上去，不願拿點出來做教育經費，以致教員不安心於教，學生不安心於學，維持原狀還不可能，那裏能夠談到進步。第二是政治上的黑暗勢力，時常干涉教育：或是任用不學無術的私人做校長或教員；或是壓迫學術的自由，不讓教學的人自由研究；或是利用教員學生，植黨營私。於是學校裏的卑汚，不下於政治界的垃圾。這樣的地方，製造出來的學生，還有什麼大的希望？

不僅如此，舊教育的遺毒還沒有消滅。我們從前的教育，目的完全爲做官的。子弟讀書的志願在此，父兄鄉長的希望在此，政府科舉取士的辦法也在此。凡是讀書的都是預備做官的；做不了官的，纔去教書。所以從前讀書人的出路只有兩條，第一

是考中科舉之後做官；第二是考不中，或是考中了而沒有做官，便去教書。沒有第三條路可走。若要讀書人去種田，經商，或做工，他認爲這是下賤的事業，等於女人失節，寧願餓死，不願幹。

現在學校出來的學生，對於這種讀書爲做官的心理，還沒有打破，尤以在內地爲甚。由小學以至於大學，都是如此。他們以爲小學畢業，便是以前的秀才；中學畢業，便是以前的舉人；大學畢業，便是以前的進士；若是外國留過學，便是以前的進士翰林之類；得了博士，便自以爲是洋狀元了。社會之所公認，鄉長之所期望，父兄之所指靠，自己之所志願，都是做官。所以許多留學生回國，好像華僑在美國一樣，只有兩條出路，不是洗衣，便是開飯店；留學生回來，不是做官，便是當教員。做官是本來的目的，若是沒有親戚朋友的援引，而做官不成，那麼只有像以前的讀書人去教私塾一樣，去大學教書。當教員是不得已的退步辦法，猶之以前的讀書人把當私塾老師爲退步的辦法一樣。若是官運亨通，於是馬上脫離教書生活，去做官發財，以實現原來的志願。學校不過是一個旅館，官場纔是歸宿之處！

我並不是絕對反對做官；其實爲國家服務去做官，爲做事去做官，爲實現主張去做官，我不但不反對，而且絕對贊成；我所反對的，是普通一般爲做官而做官的心理。

我並不是看輕教書事業；其實教書在目前還是比較清高的事業，神聖的責任。我所反對的，乃是把教書看做求官不到的退步辦法。（現在也有一部分人寧願教書，不願做官，這是要聲明的。）

我並不是把做官心理，完全歸罪在學生身上，其實青年總是心地最純潔的。這是一方面由於過去社會的遺傳，一方面由於現在社會的無出路。

（四）留學運動與學生運動

在閉關時代，誰也想不到以我們這樣一個文明古國，要去學東西洋那班後生小子的文物制度。但是優勝劣敗，天演公例，自己不行，只有跟着別人家去跑。

中國第一個留學生是容閎。他於一八四七年往美，看見美國社會的進步，故於

一八五四年回國之後，便首先提議派遣留美學生。因爲曾國藩丁汝昌的贊助，這個提議居然得到政府的許可，從一八七二年至一八七五年共計派了一百二十人留美。後來政府怕了這班青年完全洋化，便於一八八一年把他們撤回了。留學運動不免受一個很大的打擊。

中日之戰，日本戰勝；日俄之戰，日本又戰勝。同時中國，剛敗於日本，又敗於八國聯軍，自然不能不佩服西洋文明——至少西洋的物質文明。日本既然變法維新學西洋自强了，我們又難道不能以日本做個榜樣？於是留學運動，盛極一時；尤以留日學生爲最多，其原因大概如下：

(一)日本連戰皆勝，是變法自强的好榜樣；

(二)日本距離不遠，容易來往；

(三)日本生活程度很低，留學比較容易；

(四)日本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與我們比較接近，容易學習。

這麼許多留學生聚集在日本，一面受了外國文明的刺激，一面脫離了家庭的

牽纏，同時是血氣方剛的青年，看見滿淸的腐敗，那有不氣憤塡胸的道理。所以當時民主革命與君主立憲兩派都是以留日學生爲基本材料。

後來（尤其是民國成立以後：）

（一）因爲留日學生在社會上沒有顯著的成績，西洋留學生的價值，漸爲社會所尊重；

（二）因爲日本侵略中國太利害，一班青年因爲厭惡日本，而不願去留學；

（三）因爲一班青年不滿意間接從日本手裏去研究西洋文明，想直接去學習；

（四）因爲國內學校對於英語一科，極爲注重，留學英美在語言文字上有相當準備；

（五）因爲美國退回庚子賠款一部分，創立淸華學校，預備留美，每年都有一批送去。於是留學之風，轉而趨向歐美。

這班青年受了西洋文明的洗禮，對於中國社會政治自然不滿，回來以後又大半散布在各大學校裏面教書。剛好採行新式教育的結果，聚了無數十百千的學生

在一塊，在思想方面容易互相交換暗示，在行爲方面容易組織起來，集中力量。於是學校有如火藥庫，學生有如火藥，外國回來教書的留學生有如引子，只要星星之火，一經燃着，便可燎原。

辛亥革命主持其事者是留學生，附和贊助最烈者是國內學生。他們希望滿清推翻，民國成立，中國馬上可以富强起來。誰知國事愈鬧愈糟，先則有袁世凱的稱帝，繼則有張勳的復辟，再則有軍閥的混戰，南與南爭，北與北鬬，紛紛擾擾，每況愈下，加上歐洲大戰的刺激，日本二十一條的壓迫，一般青年，實在是煩悶已極，不免躍躍欲試。

剛好陳獨秀胡適之等起來提倡新文化運動，一面破壞舊的思想與制度，一面主張白話文學。青年的思想，得到這種空前的解放，行動只待時機的來到。

學生運動暴發的先聲，是紀念歐戰停止的那一天。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深秋天氣，有兩萬多的男女學生，集合在北平的天安門前開會紀念並大舉遊行，這是學生空前的運動，也是羣衆運動的萌芽。

我們熱烈的紀念歐戰停止，原以爲公理戰勝了强權，世界永久的和平能建立在人道與正義的基礎上面；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或國家能根據威爾遜總統的宣言，解除帝國主義的束縛而我國所受不平等條約的壓迫，也得推翻。不料巴黎和會不顧公理，竟於四月三十日以德國前在山東的權利，轉給了日本。消息傳來，全國震動，埋伏已久的學生運動，遂於五月四日爆發。北平學生在該日遊行示威，表示反對之後，並搗毁了曹汝霖的住宅，毆傷了駐日公使章宗祥。軍警趕到拘捕了三十名左右的學生，政府想加以懲罰，各校學生便罷課表示反抗，各地團體也通電援助。政府看見輿論憤激，恐起大變，便將已捕的學生釋放，同時明令獎慰曹章陸三人，敷衍面子；並暗中逼教育總長及北京大學校長辭職以爲釜底抽薪之計。詎料學生聽見之下，更加憤慨，因爲第一政府沒有答應拒絕簽約，第二對於賣國賊反而明令嘉獎，第三逼迫教育總長及北大校長辭識，第四不設法營救留日被捕學生，認爲非罷課表示反對不可。於是北平各校，相繼取一致行動，並組織學生會以資團結。各地聞風而起，空氣佈滿全國。學生罷課之後，或遊街演講，或散發傳單，以與政府相抗。到六月三日，

北京政府復行高壓手段，拘捕演講學生。誰知愈來愈多，拘不勝拘。加之外地風起援助，商界罷市抗議，結果政府不能不表示退讓：一面釋放被捕學生；一面罷免曹章陸三人；凡爾賽和平條約也沒有簽字。初期的學生運動便大告成功。

初期的學生運動，因爲動機純粹，目的簡單，完全爲愛國心所驅使，不但社會上表示同情，在步伐上也是一致。成功之後，發生了下列三種影響：

(一)在學生本身方面，認識了自己勢力的偉大，以爲政府都可懾服，何況其他，於是逐漸離開學生的本分，而積極從事於各種運動。自此以後，凡有外交問題發生，學生無不干預；即關於學校行政，也要求參加；以致風潮時起，權威掃地，一直至國民黨專政爲止。

(二)社會上看見學生的勢力偉大，於是羣起利用。小的利用去爭校長教員的地位，大的利用學生去爭取政權。國民黨共產黨在『五四』以後，對於此事，更特別注意，在各校裏面且有黨團之設立。自是以後，學生運動目標趨於紛歧，行動也不能一致。

（三）我們以前的政治活動，只是少數士大夫階級玩的把戲；就是戊戌政變，及辛亥革命，也沒有大批『阿斗』的參加。五四運動表現了人民對於權威不客氣的反抗。學生小子，乳臭未乾，竟敢燒部長的房子，在部長頭上動土；商人罷市，工人罷工，鬧得全國天翻地覆，政府終於罷免曹章陸，這不能不說是一大變局。這種變局，指示了民衆組織的可能，表現了民衆參政的能力。後來國民黨共產黨之所以能夠組成大黨，做各種民衆運動，匯成一九二六年起的國民革命大潮流，把北洋軍閥打得跑的跑，降的降，我們又不能不說是五四運動的影響。

（五）　白話文學運動

我們早先說過，中國文學的艱難，作文沒有一定的文法，發音沒有拼音的制度，識字又沒有字母，而且言文分開，非普通人所能了解。所以我們以前的教育，只有少數人能夠享受。讀書的人，一生精力，都葬送在磨練幾句文章上面。至於真實的智識，則不遑研究。

學過洋文的人，不管是英文、法文、德文、或意大利文，一定覺得洋文比中文便利。第一個分別便是洋文言文相符；第二個分別便是洋文有拼音制度；第三個分別是洋文有字母；第四個分別便是洋文的內容充滿人生的意義，不像中文的內容限於傳統思想。

我們若不想拋棄我們的國文，我們沒有方法採用字母制度。至於拼音，以前曾有人提倡注音字母，不過沒有很大的成功。我們若是要改良中國文學，只有兩方面可以下手：一是言文合一，一是充實內容。

胡適之陳獨秀都是留學生，對於西洋文學都有相當的認識，自然不滿意中國文學。所以陳獨秀辦新青年的時候，便覺得中國文學有改革的必要。但是因爲他比較對於西洋文學沒有胡適之認識的清切，所以只知道打先鋒，大聲疾呼文學改革的需要。至於具體辦法，他便沒有多少研究。胡適之中英文學都有根底，而對於這個問題，研究有素。所以文學革命的政策，只有他能夠集其大成。

文學革命的內容，如我們所說，只有從兩方面下手。從言文合一方面，他們主張

拋棄文言，改用白話。從內容方面，他們主張；(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用俗字俗語；(五)須講文法(以上爲形式的方面)(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模倣古人；(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爲內容的方面)

在大家都感覺到中國文字艱難的時候，忽然有人出來提倡文學革命，自然是極受歡迎。並且那時正是新文化運動開始的時候，一般人的思想，都想解放，盡量發洩出來，若是中國文學不改革，不但有許多人不能應用文言去發表他們的意思，就是發表以後也很少人可以看懂。因此種種，白話運動自然風行。

白話運動的風行，還有一個最大原因，便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一方面是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影響，他方面普遍了白話運動及新文化運動。因爲有了五四運動，學生階級纔覺悟過來，而從事各種運動，而得到白話給予以發表意見，宣傳主張的利害工具。所以五四以後的出版物有如雨後春筍，不勝其數。這些出版物，都是用白話寫的，因爲白話比較容易。由是，白話運動隨着學生運動與新文化運動進展。

白話運動的影響如何呢？

(一)因爲打破了文言的權威，所以隨着打破了文言所包含的傳統思想制度的權威。我們以前說過，中國的文素來是載『道』用的，而所謂『道』又不外乎傳統思想。像蚌一樣，文言好比蚌的殼，傳統思想好比蚌的肉；若是你將蚌殼打破，你自然會連帶打傷裏面的肉。所以白話運動雖與新文化運動純爲二事，但是白話運動在破壞舊文化上面，的確給予新文化運動一個很大的幫助。

(二)因爲白話運動給了我們一種比較容易傳達思想的工具，所以解放了許多受文言壓迫的人們。智識與思想的傳播交換，更廣更快。我們看五四以後所出的雜誌，數目驚人，便知白話的功用的浩大了。

(三)白話又給教育一個大的貢獻。我們以前的教育因爲文言的關係，教授非常繁難。現在有了白話，學生容易進益，讀三四年書差不多便可寫白話信，這是多麼一個利具！因爲發現這種利具，所以平民教育運動，得了一個很大刺激，而勇猛向前進展。

（六）社會標準的紛亂

新文化運動只注重消極方面的破壞，沒有注重積極方面的建設。從事新文化運動的人，雖然對於舊的東西很勇敢的進攻；對於新文化的本身，卻很少具體的貢獻。其在思想上的意義，與辛亥革命在政治上的意義倒很相同。辛亥革命運動只知推翻滿清，沒有充分準備推翻以後的辦法，所以滿清一倒，民主政治並不能實現，中國的政治更趨於紛亂。新文化運動也是一樣，雖摔碎了不少傳統的思想與制度，但是對於新文化卻缺乏之有系統的建設。結果，社會失卻舊日所賴以維繫的東西；解放了的民族精力，無處歸宿，而發生很大的紛亂，不能收拾。

不消說，舊倫理舊道德標準範圍我們不住了。忠君則無君可忠。孝父母則於小家庭的實行有礙。講貞操，則不能自由戀愛。諸如此類，都可以證明舊的標準，已經不能維繫人心。

在風俗習慣日用起居上，更可看出顯明的變化。大菜在通商口埠是流行了。洋

裝在城市到處可以看見。有錢的人非住洋房不可。有馬路當然要有汽車相配。電影、留聲機、無線電、跑狗、跑馬、都是新的把戲，成了時髦的嗜好。所謂女人的美，如曲線、如燙髮、如畫眉、如染指、如長統絲襪、如高跟底鞋、都不是原來我們的標準。結婚喪葬，中樂鑼鼓之外，加入西樂，也是中西參合的結果。外面穿馬褂長袍，裏面穿西式襯衣及洋褲皮鞋，也是應有的現象。至於冰結凌、巧格糖、咖啡、紅茶、牛乳之屬，不與西洋交通，我們也不知享受。火車、輪船、飛機、電話、電報、電燈、以至於抽水馬桶，無一不是西洋文明之賜。

於是，我們的嗜好，慢慢變了；我們的風俗習慣也慢慢變了；我們的觀念與標準又安得而不變？以前我們坐紅木椅子，現在我們要坐沙發。以前我們沒有什麼耶穌聖誕，現在有一部分人每年到十二月二十四日要照例熱鬧一番。以前誰高興去看賽球，現在卻有成千成萬的球迷。以前以多生子女爲榮幸，現在的青年卻要夫人保持容貌的美爲第一義。以前弟子認老師神聖不可侵犯，現在學生對先生普通不打招呼。

如果完全的洋化，未始沒有一定的標準。但是幾千年的文化，那裏這麼容易完全取消。舊的東西雖然在動搖，在崩潰，卻仍然掙扎着。在沒有產出一種新文化以前，只有成功現在這種不中不西、又中又西、中西混雜的現象。穿西裝的先生，可以扶乩。摩登的太太可以在觀音娘娘面前跪拜求子。連號稱革命之前輩，可以發起時輪金剛法會。那麼研究無線電的人信鬼，也是勢所必然的了。

這樣的一個社會，安得而不矛盾？安得而不紛亂？

第十章　中西接觸後思想上的變化

在中西沒有接觸以前，中國人的思想總不外受孔老佛三教的支配，尤以正統派的孔教爲甚。中西接觸以後，受了西方文明的影響，於是發生劇烈的變化。這種變化，經過下列幾個時期：第一是輕視西方文明的時期；第二是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時期；第三是維新革命的時期；第四是新文化運動的時期；第五是講主義的時期；第六是變化莫測的時期。

（一）輕視西洋文明

當西洋人初來中國的時候，我們以爲又是什麼蠻夷民族來向我們歸順稱藩。他們派代表來要求通商，我們便認爲他們不能製造好的東西，要向我們購買。他們的使臣帶些東西來做進見禮物，我們便要他們插上『朝貢』的旗子。如果他們的

使臣要覲見我們的皇帝，還非叩頭不可。最能代表我們當初輕視西洋國家的態度的，要算一七九三年乾隆皇帝交英使馬加特尼帶回去給英王的那一個勅諭。

那個勅諭說得好：你佩服我們天國的文明，想要來學一點，但是我們的文物制度，與你們相差太多，即使你派來的人能夠學會，也不能移植到你英國去。……你的使臣也知道我們什麼都有，無論你英國製的東西如何新奇巧妙，我們並不需要。因此，我對於你要求派遣使臣駐京一事，認爲有違我們的常法，並且於你國也無益處。我已經向你派來的使臣詳細說明，叫他好好回國。你英王須尊重我的意思，並且永久對我要忠誠；那麼可享太平之福。

這是多麼神氣！天朝的皇帝！中國的聲威！

第二個回文更利害，乾隆皇帝對喬治第三的苦求通商，簡直像大人教訓小孩子一般。原文這樣說道：

『……以上所論各條，原因爾使臣之妄說，爾國王或未深悉天朝禮制，並非有意妄干。朕於入貢諸邦，誠心向化者，無不加之體卹，用示懷柔，如有懇求之事，若於體

制無妨，無不曲從所請，況爾國王僻處重洋，輸誠納貢，朕之錫予優嘉，倍於他國。今爾使臣所懇各條，不但於天朝之法則攸關，卽爲爾國王謀，亦俱爲無益難行之事。玆再明白曉諭，爾國王當仰體朕心，永遠遵奉，共享太平之福。若經此次詳諭後，爾國王或誤聽臣下之言，任從夷商將貨船駛至浙江天津地方，欲求上岸交易，天朝法制森嚴，各處守土文武各遵功令，爾船隻到彼，未免使爾國夷商往返徒勞，勿謂言之不豫也。其懔遵毋違，特此再諭。』

上面那兩個勅諭，很可以代表我們當初對於西洋的態度：一是認爲自己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國家；二是看不起西洋各國，以爲他們還是蠻夷之屬。

(二) 中學爲體西學爲用

因爲我們輕視西洋人，所以對於他們的東來，沒有明瞭其意義的嚴重，絲毫不知準備，以至一八四二年鴉片一戰，我們敗了，才驚奇他們的利害，非普通蠻夷可比。但是寃孽初次見面，我們究竟不明瞭西洋文化的底細怎樣；並且鴉片之戰，我們並

沒有傾全國之力與英國拚命，所以一方面我們雖然減少了輕視西洋的心理，然同時我們還沒有失掉自驕自滿的信念。

事實是不可避免的，我們中國想要關起門來，也是不可能的。由鴉片之戰，經一八五八年至一八六〇年英法兩次聯軍之戰，一八八五年中法之戰，我們戰無不敗，敗無不喪權辱國，相形之下，於是由驚奇的心理，到認識西洋槍砲兵艦的利害。當時在政治上最有力量，社會上最有聲望的人物，像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便努力提倡所謂『洋務。』而『洋務』中最重要的是：

一八六一年　北京設同文館，附屬於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聘西人爲教習，教授英、法、德、俄四國語言文字，分天文化學，算學，格致，醫學各科目。

一八六三年　設外國語言文字學館於上海。

一八六五年　設江南機器製造局於上海。

一八六六年　奏設輪船製造廠於福建。

一八六七年　江南機器製造局內添設翻譯館。

一八七〇年　設機器製造局於天津。

一八七二年　挑選第一批學生，派容閎指導赴美留學；請開煤鐵鑛，設招商輪船局。

一八七三年　籌建鐵甲兵艦；請設洋學局於各省，分格致、化學、電學、礮法、兵法、火輪、機器、輿圖、測算諸門；派通曉時務大員主持，並於考試功令稍加變通，另開洋務進取一格。

一八七六年　派武弁赴德學習水陸軍械技術；又派福建船政生出洋留學。

一八八〇年　購置鐵甲兵艦，設水師學堂於天津；設南北洋電報局奏請建設鐵路。

一八八一年　設開平鑛務商局。

一八八二年　築旅順軍港船塢；設商辦織布局於上海。

一八八五年　設武備學堂於天津。

這些『洋務，』都是曾左李三人所創辦，尤以李創辦的爲最多，他如郭嵩燾曾

紀澤薛福成諸人，也是鼓吹『洋務』有力的分子。他們都認定西洋所長的是物質科學，所以當時翻譯的書，也是偏重在這方面。這種崇拜西洋物質文明的心理，至中日之戰以後，更加利害。

但是這班人受中國傳統思想的毒極深，他們腦筋裏面充滿了古先聖王之道，不能洗脫，因此對於中國文化的本體，毫不懷疑，仍以爲最高無上。爲調和這種思想上的衝突起見，張之洞於是提出了『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口號。他於一八九八年在他的勸學篇序裏面痛切說道：

『圖救時者言新學，慮害者守舊學，莫衷於一。舊者因噎而食廢，新者多歧而羊亡；舊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則無應敵制變之術；不知本，則有非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則舊者愈病新，新者愈厭舊，交相爲瘉，而恢詭傾危，亂名改作之流，遂雜出其說，以蕩衆心。學者搖搖，中無所主，邪說暴行，橫流天下。敵既至，無與戰；敵未至，無與安。吾恐中國之禍，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內矣。』

然則他的辦法又是怎樣？他在勸學篇下，設學第三論學堂之五要時，首先便曰：

『新舊兼學。四書五經，中國史學，政書地圖為舊學。西政西藝西史為新學。舊學為體，新學為用，不使偏廢。』

（三）政治改造之路——維新與革命

其實西學之所以能用，自有其根本精神，張之洞只知枝枝節節去學人家的皮毛，而不知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是一物的兩面，不能分開。沒有物質文明，精神文明無所寄託；沒有精神文明，物質文明無由產生。自曾國藩至張之洞，都沒有了解西洋文明的根本，只看見人家的堅甲利兵，於是以為可以不改變中國文明的基礎，而可以把『西學為用』；好像一個腐敗官僚，穿上一套洋裝，自以為革新了一樣的可笑。無怪梁啓超批評李鴻章所謂『洋務』道：

『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內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民，知有洋務而不知有國務，……以為吾中國之政教風俗無一不優於他國，所不及者，惟鎗耳、礮耳、船耳、機器耳，吾但學此，而洋務之能事畢矣。』

因此，辦洋務及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結果，還免不了中日戰爭的慘敗，敗於變法維新的小日本。這是多麼大的一個教訓！於是先知先覺之士，認識徒學西洋的槍砲兵船，而不改變中國的腐敗政治，不足以有爲；乃進一步而採用西洋的政治制度與思想，來改造中國的局面。西洋的民主政治潮流，也早已源源隨着商人，教士，國旗來了。

雖然同是走上了政治改造之路，但是這其間，因爲各人的見解不同，於是有君主立憲的康有爲梁啓超派，及民主革命的孫中山派。戊戌政變便是君主立憲的運動。一八九八年六月至八月，革新的詔書，不下有數十百起，最重要的，如廢八股取士之制，改試時務策論，開辦京師大學堂及各種學堂，獎勵著書製器及捐款興學，變更兵制，學習洋操，裁汰冗兵、整頓水師、開辦銀行、設立礦務鐵路等局，振興農工商諸實業，設立農工商局商會，删改各衙門例則，裁汰冗員，誥誡因循，廣開言路等等。先後如放聯珠砲，把頑固的守舊派嚇住了。他們看見新政的設施，不但與他們的傳統思想衝突，並且於他們的地位不利，於是有的借端設詞，多方阻撓；有的虛與委蛇，表面搪

塞；有的冷眼觀察，不加批評；更有的阿附慈禧，以『變亂祖制，』『用夷變夏』的罪狀來反攻。結果，德宗被幽於瀛臺了，六君子被殺了，康梁新黨都跑了，慈禧又垂簾聽政了，戊戌政變於是曇花一現。

君主立憲派的失敗，證明利用虛君的和平方法，已經此路不通，只有用武力去推翻滿清帝制。民主革命的運動，於是繼長增高，到辛亥畢竟把愛新覺羅的統治打倒。

從事民主革命運動的人，以爲民國一成立，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誰知『真命天子』推倒之後，政治一天一天紛亂，人民一天一天痛苦，政治改造之路，越走入牛角裏越走不出來，於是思想上又不能不起一個大的波瀾。

（四）新文化運動與思想紛亂

辛亥革命雖然在政治上沒有成功，在思想上的確是一個很大的刺激。君主制度在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是我們全個社會組織的象徵，一旦我們把這種象徵打

倒了，所有舊社會的思想與制度，都失却以前那種權威。我們逐漸的減少對於他們的尊嚴，以前大家認爲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多要懷疑起來。這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一個原因。

民國成立以來，軍閥專權，政客搗亂，兼之一九一四年歐戰爆發，接着日本向我提出二十一條亡國條件，接着又是洪憲運動，接着又是雲南起義，接着又是張勳復辟，接着又是解散國會，接着又是西南護法，接着又是南與南戰，北與北爭，無處不使我們失望，也無處不使我們神經深受刺激。一般人原來希望君主立憲成功，效法英日，使中國能躋於富强之域，但是不幸失敗了；一般人又以爲只要民主革命成功，一切都可以迎刃而解，然而不幸又失敗了。政治的黑暗與人民的痛苦，較之前清，有過無不及。在這種情形之下，人民對於政治改造之路，失卻了信心，大家對於政治，便發生了一種厭惡的觀念。一部分智識階級領袖，受了這種環境的暗示，認爲政治改造，乃是上層的解決；若是根本問題不能解決，上層運動必無成功，按之戊戌政變與辛亥革命的故事，可以明白；於是他們改變一個方向，從改造社會革新思想入手。這是

新文化運動的第二個原因。

前清派遣的留學生，一來因爲人數不多，二來因爲受傳統思想的毒太深，所以嚴復諸人的思想，還是守舊，不能打開新的局面。到了前清末年，民國初年的時候，因爲政府的提倡，與維新的空氣，留學之風，盛極一時。先是流往日本，因爲日本很近，並且有同種同文的關係。後來歐風美雨，愈來愈急，爲尋本探源，直接追求西洋文明計，不能不留學西洋。這些西洋留學生，年紀較輕，受傳統思想的毒較淺，對於西洋文化容易接受。他們親眼看見西洋社會的進步，與其文化的高深，回到國內，相形之下，中國文化未免見絀，於是改造之心，油然而生。這是新文化運動的第三個原因。

這種新文化運動，到了一九一七年便漸露頭角。新青年等雜誌一出，便風行一時。一般社會的心理，因爲上面各種關係，早就想另找出路，自然趨之若鶩。不過當時新思潮所影響的範圍，限於學生階級，對於全個社會，還不能撼動。歐戰告終，五四運動爆發，勢如燎原，蔓延全國，挾新文化運動以俱馳，開我國歷史上一新紀元。

上面已經說過，我們的思想已經由輕視西洋文明的時期，到『中學爲體西學

爲用』的時期；新文化運動，把我們更推上前一步，對於中國的傳統文化，根本發生懷疑。胡適之反對用文藝復興，主張用重新估價去形容這種運動，的確比較適當。這種運動最重要的意義，便是把我們固有的思想與制度，加以重新估價：凡是不合現代生活的，便施行攻擊。因爲我們中國的傳統思想與制度，都是封建時代所遺留的產物，所以這種運動，差不多完全用力在破壞方面。攻擊孔教，攻擊禮教，攻擊文言文學，攻擊家庭制度，攻擊婚姻制度，攻擊喪葬制度，攻擊男女不平等的關係，舉凡我們中國以前社會的基礎，無不加以搖動，於是舊的倫理、道德、制度、思想逐漸崩潰。

新文化運動的人物，雖然對於舊的思想與制度深懷不滿，一致進攻，但是對於新文化並沒有具體的系統的貢獻。他們偏重在消極的破壞，沒有注意積極的建設。他們知道舊的思想與制度不適合現代生活，但是不知道（至少不充分的知道）拿什麼新文化去代替。這種運動，與其謂之爲新文化運動，不如謂之爲破壞舊文化運動。新文化的產生，還有待於今後的創造。

因爲這種運動，只有破壞的事實，沒有建設的成績，其意義與辛亥革命在政治

上相差不多。辛亥革命破壞了君主政體，但沒有建立民主政治。當時民主革命派，也只知道推翻滿清，至於推翻以後如何建設民主國家的具體計劃，他們並沒有充分準備。所以滿清一倒，政治日趨紛亂。新文化運動確是摔碎了許多傳統的思想與制度，但是沒有新的去代替，結果社會失掉舊日所賴以維持的東西，日趨於紛亂；思想更是五花八門，複雜萬分。從舊思想與制度裏面解放出來的精力，有如青春時候，萬物爭榮，其現象正如春秋戰國時代。在那時，你可看見無數的學會，無數的雜誌，無數的譯著，好不熱鬧！雖然大家的目的在改造社會，反抗舊勢力，但是思潮的路線，卻極不一致。有的談社會主義，如陳獨秀李守常等；有的談無政府主義，如張繼吳稚暉等；有的談新村運動，如周作人等；有的談哲學，如胡適的實驗哲學，梁漱冥的印度哲學；有的談人生觀，如張君勱與丁在君的論戰；有的談宗教，如屠孝實梁漱冥等的演講。真是無奇不有，不過這個時代有兩個根本出發點，幾乎是各種新思想所不爭的事實：一是德謨克拉西（民主）；一是賽恩斯（科學）。如果全個新文化運動有內容，這兩位德賽先生便是牠的內容；如果新文化運動破壞了中國的舊文化，這兩位德

賽先生便是牠的工具。

（五）　主義時代

都是要改造社會，但是怎樣去改造，各種零亂的思想，並不曾提出系統的主張，及其實現的方法。而政治更加紛亂，軍閥更加混戰，人民的生活愈覺不安，遇着這種現實，不能不在政治上找解決。如果政治問題不能解決，零零碎碎的幹法是不會成功的。你去辦教育，你的學校或者要被軍隊駐紮，你的經費或者要被軍閥拿去，你的思想或者要被長官干涉。你若去辦實業，苛捐雜稅，已經使你不能支持；一受內戰打擊，那能不馬上倒閉。因此，站在時代前面的人，又不能不回過頭來拿出主義來做政治運動。

新青年原來以陳獨秀胡適兩人爲中堅，因爲談到政治運動，兩人的思想便不同了。陳獨秀一派走入共產主義之路，與李守常等發行嚮導周報，組織共產黨，從階級的觀點出發，主張階級革命，階級專政。胡適一派，主張好人政府，發行努力周報，打

算加入實際政治活動，去謀改良。

少年中國學會是專門以上學校的有爲青年所組織的，原來目的在改造社會；因爲談到政治運動，也分裂爲兩派：一派加入共產黨，信奉共產主義；一派信仰國家主義，組織青年黨，發行醒獅週報，從國家的觀點出發。主張『內除國賊，外抗强權。』

國民黨呢？孫中山經過累次的失敗，一面看見俄國革命的成功，一面受了新文化運動的刺激，便決心改組國民黨，完成三民主義的理論系統。

國民黨改組，決定聯俄容共兩大政策，於是三民主義便與共產主義難分難解，孫中山自己也說『民生主義卽共產主義』。到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這兩種滙合的潮流，更加隨着反帝運動，隨處奔放。接着又是孫中山之死，接着又是北京『三一八』之變，革命的高潮，已經是沛然來到。一九二六年國民革命軍，便乘這高潮北伐起來，把北洋軍閥打得落花流水。國共的勢力，於是由珠江流域，伸到長江流域。

在這個時期，思想界非常顯明，各有立場，『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是讀孫中山的遺囑，便是馬克思列寧的信徒，或是喊着『內除外抗』的國家主義者。這是主

義時代，口號時代，標語時代。

（六）中國何處去

『九一八』日本在瀋陽一砲，把中國的歷史，又劃分了一個時期，思想改變了方向，派別正在重新劃分門戶。

日本進攻，進攻，繼續不斷的進攻，佔南滿、佔北滿、打上海、取熱河、深入，深入到平津附近。一年半載，失掉國土十分之一，人口四千多萬，喪權辱國，古今中外所絕無而僅有。

上海停戰協定簽字以後，民氣潛默了，沉毅了，悶鬱了，思想急變了，變到『莫可測』的道上去。

『是最好的時候，是最壞的時候，是智慧的時候，是愚蠢的時候，是信仰的時候，是懷疑的時候，是光明的時候，是黑暗的時候，是希望的時候，是失望的時候，什麼東西都在我們面前，沒有一點東西在我們前面，我們是走向天堂，我們是走向地獄，

——總而言之，像現在這個時代……』（譯 Charles Dickens, A Tale of Two Cities 開首數語）。